

九、逃亡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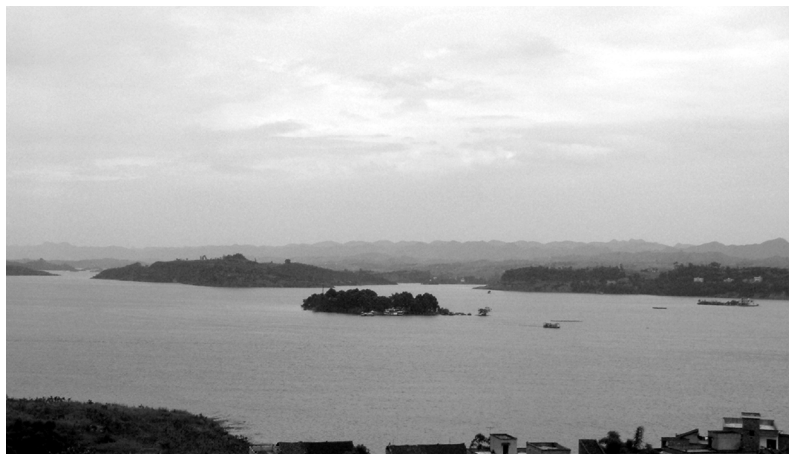
当长寿湖没有高墙铁网，刺刀哨兵，然而，600多名劳改分子中，鲜有逃亡者。20年漫长岁月，纵然大悲大苦、九死一生、沉湖上吊，亦不越雷池半步！

听了李文书的经历，我于是明白：“毛泽东时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极其独特的时代。整个国家在这个时代里被整合成一块无孔无缝的大铁板。

“分子”们纵然逃出长寿湖又怎样？面对的，是一个960万平方公里的大监狱！

不过，采访到两个“胆大包天”者：

- 1、 谭显殷
- 2、 李文书



李文书曾独自一人劳动的地方长寿湖猪儿岛——湖中小岛（谭松摄）

一个长寿湖逃亡者的自述

谭显殷

1957年重庆市团市委宣传部长

1928年生



解放前，我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书时，摆在面前有三条路：一、科学救国；二、追随国民党；三、跟共产党走。我选择了最后一条路，这在当时是最艰辛最危险的一条路。为什么？很简单，为了民主和自由。我认为国民党专制腐败，中国的希望寄于大力呼喊民主和自由的中国共产党身上。

我出生于四川万县高粱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0岁那年，父亲贫病交加上吊自杀。父亲虽然穷，但有点文化，他让我上了小学。12岁那年，有一个也姓谭的地主打算送他12岁的儿子到重庆读书，他不放心，想找个陪伴。

我当时在那个乡坝头有点小“名气”——鬼机灵。我点子多，上树掏鸟蛋，下河捉鱼，我总比其他娃儿能干，连同姐姐抬水（她走前，我走后），我都悄悄把桶绳往她那边移一节而让她不发现。我还敢打架，嘴巴能说。那个姓谭的地主认为，要陪太子攻书，我是个上等人选。他找到我妈，我妈娃儿一大堆，身边多一个少一个无所谓。于是，我在1941年12月来到了重庆。

我同地主的儿子一块考最著名的南开中学，考下来，我中了，他落榜了。他转而考入差一些的广益中学，后来考入农学院，成了一个农业专家。

我在南开读了五年，解放前南开是一所非常优秀的学校，校长张伯苓的办学思想和方式方法至今令我由衷赞叹——那是培养有独立思想自由意志的地方。



谭显殷在南开中学，1947

1947年1月（南开读高中时），我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六一社”，后转入“新民主主义青年社”，专门从事学生运动工作，并担任地下社支部书记。我活跃得很，演进步剧，发挺进报，组织游行示威，反饥饿，反独裁，反内战。由于我太投入，很快上了黑名单，我只得弃校出逃。那几个月日子艰辛得很，没钱，没住处，不敢找组织和朋友，东躲西藏，饱一顿饿一顿，不幸又拉肚子，天天跑到面馆里找师傅求面汤喝。这个时候正遇到暑假，我翻进一所学校的学生宿舍悄悄住下来。快开学时，学生要回来，又得逃。正在这时学校贴出布告招生，我走投无路，便去考。一考，考中了——南开中学已给我打下了五年的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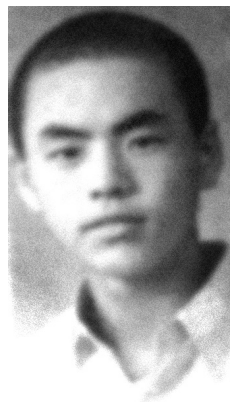
高中功底。这所大学就是政阳法学院。

这时已经是 1948 年下半年了，川东地下党很活跃，国民党抓得也凶，我几乎没敢在学校的宿舍里睡过觉。这一年多，死里逃生的经历就多了，但我天生机灵，次次逢凶化吉。有一次在七星岗，几个特务逼上来，只差十几米都让我胜利逃脱。

解放后，我担任了南岸区团区委书记，区党委宣传科长等职。在任时我同部下、少先部部长裴秀娟结了婚，她是一个羞涩娴淑的姑娘。1956 年，我调到团市委担任宣传部长。

1957 年反右，我是团市委常委，反右领导小组成员。随着运动对人的批判和处理，我开始感到反感。说几句话，提一条意见，怎么就成了坏人？这不是明显的以言定罪吗？这不是明显的对起码民主的破坏吗？

我这个人有极强的民主、自由、人权观点，在南开中学读书时，摆在我面前有三条路：一、科学救国；二、追随国民党；三、跟共产党走。我选择了最后一条路，这在当时是最艰辛最危险的一条路。为什么？很简单，为了民主和自由。同那个时代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我非常爱国，一心渴盼祖国富强。我读到《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读到新华日报的文章，共产党呼喊的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很让我激动，我觉得自己应当为这一个目标奋斗。那时，我认为国民党专制腐败，中国的希望在大力呼喊民主和自由的中国共产党身上。



大学时的谭显彪

反右整人，扼杀民主，堵塞言路，与当年共产党大声疾呼的东西背道而驰，与我冒生命危险追求的东西背道而驰，它本能地引起我强烈反感！

我不同意划康中清（市团校教研室负责人，1959 年死于长寿湖）为右派，对划黎民苏为右派有看法。对重庆日报右派贾唯英表示同情，等等。

我这个人关不住话，心里想什么就要直说出来。1957 年 8 月，我对南岸区委宣传科科长陈适情（他是我的好朋友）谈了我对反右的看法，对以言定罪，以言整人的反感。陈适情在对其他人摆谈时，谈了我的观点。有一个姓张的人把陈适情的话整理成材料告密，陈适情马上被打成右派，天天挨斗。陈是一个很单纯很善良的青年，他经受不住，突然失踪了。人们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他独自站在区委下面长江边的一块礁石上，我估计他投了河，至今没有他的任何消息。

那份告密材料也转到了团市委，成了我的罪状之一：同情右派，否定团市委的反右斗争，与团市委常委离心离德（后来定为与党“离心离德”）。

说到这儿，我还说一件与党委“离心离德”的事。

有一次，在团市委常委会上讨论要处理某人某人时，副书记 XXX 突然说：我们要吸取江北区委（也许是一个大厂的党委，我记不清了）的经验，常委会所有成员要团结一致。

这个“经验”是这样的：该党委布置反右工作，策划让某人来揭发斗争某人。第二天开斗争会，被整的人十分痛苦，大呼冤枉。有一个年轻的女秘书（她头天参加了党委会）受到良心的压力，忍不住站起来揭发党委，说这是头天策划的阴谋。党委书记带头起来

说她撒谎，其他党委成员一个个附和，一致认定女秘书撒谎。女秘书孤家寡人，没办法，结果她自己被打成了右派。

要我们学习这个“经验”，就是说，大家要警惕团市委中“女秘书”之类的人，一旦我们的布置策划被某个“女秘书”揭发，大家要向江北那个党委学习，全体否认。

我不知道我在他们眼中算不算“女秘书”，但我对这事极其反感。这肯定又是同党离心离德。

（44年过去了，不知江北那帮党委人士是否还健在，他们在面对自己孙儿天真目光的时候，他们在面对自己生命最后一抹夕阳的时候，是否还想起那位女秘书，是否会有一丝良心的不安。）

团市委还有一个干部叫旷忠炽，领导反复动员他给党提意见，他老兄就是不敢。最后领导冒火了，警告他：你不提意见本身就是对党有意见，你必须交待。旷忠炽被逼得没法，关在屋里想了一天一夜，终于想了一条他认为最保险、最万无一失的意见——针对伙食团的炊事员。他说：伙食团卖红苕可以剥了皮卖，皮可以喂猪，也不算浪费。

没有划他右派，划的右倾，罪名是“对粮食政策不满，恶毒攻击党的粮食政策。”他被下放到北碚劳动，后来的情况我不了解了，因为没过多久就轮到我头上。

（据黎民苏提供，旷忠炽现仍住在北碚。）

我的第二条罪状是“反对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7年5月，全国第三次团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是四川省团员代表大会选举出席“三大”的代表，重庆共四人，廖伯康、于克书、刘文权、我。在会上，我感到“三大”发扬民主不够（又是“民主”），例如，我们去时，收集了很多团员的意见，但根本没人听，小组会开了几天，连记录本都不发。我在四川省代表团的小组会上发言，认为“三大”缺乏民主，结束时，我引用鲁迅的一句话：这是一个“无声的会议”。

我被划为“反党分子”，开除党籍、撤职、降级、降薪，下放长寿湖劳动改造。

我是属于清醒得很早的人，反右一开始，我就觉得不对劲，以言定罪整人，我更反感，到我本人当了“反党分子”，我便彻底清醒了——这个党堕落了，这个党与民主自由为敌。

到长寿湖后，我被分到捕鱼队，这是农场里最好最实惠的劳动单位。这得感谢罗广斌，即小说《红岩》的作者，他是团市委统战部部长，下放下来当副场长，在团市委时我们俩是好朋友。他有心照顾我，问我会不会游泳，我说，我从小就是水中的好手。他说，那好，你到捕鱼队去。

我在长寿湖，一开始就没有心理负担，我心里明白得很，反右肯定错了，共产党肯定错了，我谭显殷没错！不敢公开反抗，我就把我小时候的鬼机灵和解放前地下斗争的



谭显殷出席团三大时留影

本领施展出来同他们斗。我是团市委打的职务最高的右派，我告诉团市委这帮难兄难弟，如曹贞干、高志长、黎民苏、李甫杰等，咱们一定要抱成一团，决不要互相揭发，互相斗，谁要是去“汇报”，大家群体攻击他，孤立他。那时我已经看清了共产党的整人术：老是挑动一些人整另一些人，让人们内部互相起哄，他坐收渔翁之利。我告诉他们，咱们要活得轻松，要少挨整，一定要团结，要想办法同他们斗，不要咱们自己内部斗。我们这帮人抱成一团，少吃了不少苦。

大饥荒那几年，我对难兄难弟说：私人的东西咱们绝对不要动，公家的东西，能吃则吃，能偷则偷，湖里的鱼，不能吃？国家财产？屁！咱们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大多送到那些官员的私人餐桌上，我们劳动者反而不得食？饿死？休想！

那几年的故事就多了。

1961年的一天，我去赶场，突然有人扯我的裤腿，我回头一看，是一个瘦骨嶙嶙的小女孩。她大约八、九岁，脸像张白纸，一双眼睛又大又圆，里面全是哀求。“叔叔，求求你，带我走吧。”她的声音像一只小猫。我问她，“你妈妈呢？”“饿死了。”她说话有气无力。“爸爸呢？”“也死了。叔叔，我跟你走吧，我会洗衣服，我帮你洗衣服。”

我心里一酸，把她抱起来，我一下子想起自己的女儿，我产生了强烈的冲动，收养她！喂她点小鱼她就能活下来。旁边一个右派说：老谭，放她走，我们哪个敢收留她呀。

我一下清醒了。

我把她放下来，掏出五角钱和二两粮票塞到她手里，对她说：“你到前面食店去吃碗面”。她一把抱住我的腿，抬起头，睁着像猫一样哀哀的眼睛望着我。

我转身逃亡一样地走了，她还在后面叫：“我会洗衣服，叔叔，不白吃饭……”我不敢回头，眼泪夺眶而出。

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



“我想起那一幕就难过”（2009年6月）

1960年，饿归饿，阶级斗争抓得紧，那一年春节前，上面宣布，长寿湖所有右派分子不准回家探亲。这对我们是一个沉重打击，“分子”们一年到头累死累活，眼巴巴就盼望那几天假。我打鱼时，捞到小参子鱼，总是细细剖了，晒在船蓬上，晒干后春节带回家。每剖一条小鱼，都让人想起家，想起妻子儿女。听说不准探亲，右派们一个个垂头丧气，我望着那一包小干鱼，发呆。

捕鱼队队长金践之是摘帽右派，我的好朋友，他虽然没成家，但有个母亲，他挂念得很。春节一天天临近了，金践之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他对其他右派说，有一些事必须要到狮子滩去，由他同我去办，两、三天就回来。金践之是队长，有点权。

当天晚上，天黑之后，我同金践之各自挑一担年货溜到湖边，上了早已准备好的船。从飞龙划到狮子滩，要整整6小时，我们俩憋足了劲，拼命划。天，黑沉沉的，静得很，只有桡橹吱吱呀呀的声音和哗哗的水声。划到狮子滩，已经是下半夜，我同金践之弃船

登岸，挑起担子飞走。从狮子滩到长寿县江边，有60多里路，我们必须在上午一早乘上到重庆的船。

那一阵好走！大约凌晨5点左右，我们俩实在来不起了，爬上一个山坡，看见一堆谷草，倒下去就睡。金践之突然坐起来说：“不能睡，不能睡！东西遭偷了就惨了。”我顾不得了，呼呼入睡。金践之硬挺着，坚决不闭眼，一心一意守着年货。那年货我记得是几个老南瓜，十多斤红苕干，一包小干鱼，还有些包谷……

1962年下半年，我调回重庆，身体好好的，精神也没垮。我回来后，带妻儿老小去照了一张全家福。那张照片上，就我一个人最神气，完全不像是“释放”归来。当然，家里遭得很惨……

裴秀娟（谭显殷之妻）：老谭1958年去长寿湖后，几年里，家里死了三个人。那时，上面三个老的，下面三个小的，经济很紧张。1958年我父亲得病，无钱医治而死，1960年小女儿饿死，1962年我妈妈上吊自杀。

我最难过的是我妈妈。

饥荒年家里不准烧火，只准吃集体食堂。食堂在江边，我家在半山腰，我妈是小脚，身体又差，不管刮风下雨，每顿饭都要下一大坡去打饭。饭只有二两，吃完饭爬坡回来，累不说，又饿了。

有一次我下班，正好看见她爬坡回来。她右手支一根竹杆，左手拿一个碗，目光呆滞，我想起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妈妈和祥林嫂一模一样。

我妈是个非常贤惠的女人，她每天都要留一口粮食，哪怕一个小土豆给她的孙儿。她身体垮了，脱肛，直肠垂落在肛门外，每次都要用热毛巾捂住肠子，慢慢把它托回去。她觉得自己活着是个拖累，便萌生了死意。1962年7月28日下午，她吊死在木床挂蚊帐的横栏上。那个横栏很细，她吊上去竟然没断——只有五十多斤了，皮包骨。

我抱着她的身子大哭，她头一天说过她想吃一片扣肉——那是她在人世的最后愿望。（裴秀娟满眼含泪。）

谭显殷：1967年，我又被抓回长寿湖，算是“二进宫”吧。

1962年我回来后，在南岸海棠溪一个油毛毡棚子里卖菜。1967年2月22日，一帮人突然闯进家来，叫我马上收拾东西到长寿湖办学习班。

凭多年的经验，我知道来者不善。一个月前，罗广斌也是突然被带走，没几天就传来消息：罗广斌畏罪跳楼自杀。我去参加了罗广斌的葬礼，他妻子胡蜀钦亲口告诉我，她绝不相信罗广斌是自杀，她了解罗。还有，罗死之前的一天还带信叫她送牙膏等生活用品。说不清了，这事至今都没有定论。

我预感到我很可能要步罗广斌的后尘，文革来势凶猛，打人、杀人、死人的事天天发生。要轮到谭显殷头上了？！

但是，我很镇静，我悄悄对妻子交待了三点：一、如果我死了，不要相信我是“畏



裴秀娟 1956年留影

罪自杀”，我绝不自杀。二、三个娃儿要抚养成人。三、我母亲要养老送终。

我强调第一点，就是为了避免像罗广斌那样死了说不清楚。

在解押去长寿湖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次为什么抓我？他们要达到什么目的？被他们整死还是找机会逃跑？当然逃跑！怎么逃跑？

与我同时被抓的还有一个叫陈孟汀的右派，他当年是延安抗大的教员，一个老革命，很有理论水平，也很顽强。到狮子滩时，我们俩趁解押人员不注意，悄悄约定，如果我们两人中有一个死了，另一个要负责把情况告诉对方家庭。我俩还交换了一张纸条，上面写了各自的家庭地址，还特别注明：我不是畏罪自杀。

当天下午到了同心岛。一上岛，正遇上一群右派在打捞尸体——一个叫李思强的人在前几天的批斗会后跳了湖。我认识李思强，1956年他从团市委宣传部长的位置上调到市委宣传部，我接他的班，他是我的前任。看见他肿胀的尸体，我心里噗咚一跳：我这次来要步他的后尘？

第一次审问下来我就明白为什么抓我了——为了罗广斌。

罗广斌写了《红岩》，算个名人，整死了有点不好说，于是想整一个“反党集团”出来，罗广斌属于这个反党集团，既然是坏人，那就死有余辜。

他们原定抓四个人，除我和老陈外，还有作协的李南力和孙静轩。李南力被抓后，半夜逃脱，当夜在储奇门江边躲了一夜，第二天过江往贵州方向逃得无影无踪。成都的孙静轩正同造反派打得火热，抓捕的人没敢下手，结果只把我和陈孟汀抓来。



罗广斌，狱中红旗的制作者之一，1948

《红岩》作者罗光斌 1959
年任长寿湖渔场副场长

他们要我写揭发罗广斌的材料，我写了一份交上去。审我的人一看，气势汹汹的说：“你这哪里是揭发材料，你还在为他涂脂抹粉！”我说：“审判员同志，你们是要我按照我了解的情况写呢，还是按你们的特殊需要写？如果是后者，我做不到。”

我特别强调了“特殊需要”几个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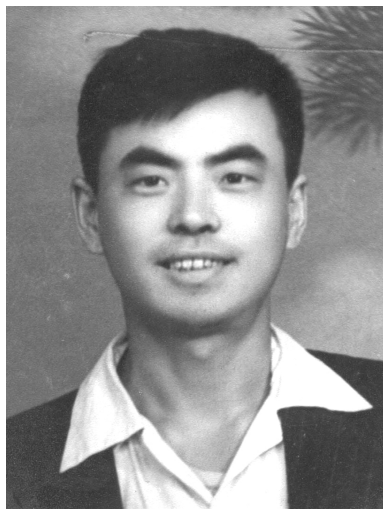
这一下惹得其中一个人跳起来，他一拍桌子，厉声说：“你口硬，谭显殷！我听说过你这个人，刁！但是你还不晓得我，你还没认清此时此地，我要整得你血红血歹！你休想回去！”

这是暗指要我死在这儿？

“认清此时与此地”这是白公馆、渣滓洞里的语言，当年我要是被国民党抓进去，就该听到这句话，现在，它出自一个共产党监管干部之口。

这个人叫孙重，长寿湖监管右派的主任。

斗我的大会，声势很凶猛，但没怎么打人，我只挨了几脚。这得托李思强的福，他



谭显殷 34岁

的死让那帮人收了点手。

会上宣读揭发我的材料，是我一个右派朋友写的。他写道：1960年的一天，我和谭显殷夜里从狮子滩划船到三台，我在船尾，谭在船头，谭显殷望着夜空，面色凝重，意味深长地说：“天，快要亮了吧？”我说：“不会吧，还没听到鸡叫。”谭显殷恨恨地说：“大跃进以来鸡都死光了。”

下面一片喊打喊杀，我立马挨了几脚。

共产党的批斗会有一个特点，专门要点与被斗者相好的、关系亲密的朋友站起来揭发。

我那帮难兄难弟一个也跑不脱。高志长被点起来揭发我，他憋了半天，揭发说：有一次我和几个人到谭显殷家里去，他端出一盘黄豆招待我们，他说，对不起了弟兄们，只有点黄豆招待。谭显殷说这种话，分明是对社会主义不满，认为社会主义缺吃少穿……

第二天上坡劳动，高志长看见我，眨了一下眼，点了点头，微微一笑，我明白他的意思：对不起了，老伙计，没办法。

一连斗了我一个月，白天强迫劳动，晚上斗争会。孙重放言：“谭显殷，你听清楚，落在我手里的人还没有不败下阵来的。”另一个“审判员”郑修成要温和些，他说：“你跳出来吧，揭发，你不是主要的。”他想分化我，我暗自好笑。他又说：“我还没见到像你这样顽固的人，居然一个都不揭发，还不认错。”我回答：“什么是错，什么是对，我们两个认识不一样。”

斗陈孟汀，他也是个“老顽固”，绝不认罪。

其实岛上这些人斗，我挺得住，担心的是红卫兵进岛，这些杀红了眼的年轻人，无理可讲，我和老陈这点顽强和斗争经验，是秀才遇到兵。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天天冥思苦想逃跑的方法、路线，两个月过去了，无机可乘。同心岛上有一个叫马鞍山的地方，我观察到，在马鞍山脚一个水沱里，晚上有时停有一条小船。我打上了那条船的主意，脑子里详细制定了个逃跑计划。我要往与重庆相反的方向逃，还得带上陈孟汀。陈年龄比较大了，又不会划船游泳，还有，他是在延安平安环境成长的，我是重庆地下斗争出身，比他有办法。我如果一个人跑了，他肯定更受罪。

我悄悄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他很担心，说到处是水，难度大，风险也大。我让他放心，说我自有办法。老陈同意了。

我暗暗作准备，先托曹贞干买来一对电池，又向詹光借了一个电筒。连续好多天，我白天观察山势地形，记方位，半夜起来看，进行校对，晚上看了，白天又校对。有人看管我俩，但看得不紧，看管的人也是“分子”，其中一个就是金践之，我告诉他我要跑，金践之不动声色，暗中助我一臂之力。

逃那天晚上，还斗了一场陈孟汀，批斗会结束后，回到工棚已是半夜十二点。

一点左右，我开始哼哼，声音由小到大：“肚子痛哟，唉哟，肚子痛哟。”我一边



在延安时的陈孟汀

哼，一边看反应。没人理，这些人白天劳动，晚上开斗争会，累得早进入梦乡。我轻轻下床，对着门栓冲了泡尿（免得它响），然后悄悄开门溜出去。我摸到老陈住的地方，按计划拉动从窗里伸出的一根细麻绳，然后伏在地上等。不一会儿，老陈夹着一个包袱，猫一样地溜出来。我们俩弯着腰，轻手轻脚往湖边走，没有月亮，但路熟，不一会儿，我们就到了船边。

上了船，才发现没有橈片！这一惊非同小可。老陈慌了，说，趁还没被发现，赶快溜回去。

我想了想说，不，你趴在船上别动，我去想办法。我返身往山坡上摸，打算找一根插四季豆的竹杆。我在茅草丛中钻，生怕遇到豺狗和蛇，为了逃命，顾不得了。

我找到一根竹杆，又拔了两根备用，然后返回船上。我在船尾一边划一边辨认方向，长寿湖到处是水湾水沱，稍不注意就要迷路。船走得太慢，我于是叫老陈趴在船头用崽子划。

整整划了两个多小时，我全身都被汗水打湿了，包括裤腰带。

我们在垫江县的地界弃船上岸，沿着一条小路往垫江的白家粮仓走。1959年我在捕鱼队时往那个方向走过一次，记得翻上坡有一棵黄桷树，过了八年，又是夜晚，我一路担心，怕走错路。

四下伸手不见五指，那把电筒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走一段我就关掉电筒，蹲下来借天空的背景看山形，还好，我找到了记忆中的黄桷树。从黄桷树到白家场有15里，走到白家场天还没亮，我们不敢停留，急匆匆又往严家场赶。我们两个的鞋子都走烂了，脚打起了泡，我们干脆把鞋扔了，赤脚走。走到严家场是早上八点钟，铺子开门了，我们各花两块五买了一双胶鞋，然后坐到馆子吃早饭。

我要了四两烧酒，炒了一大盘鳝鱼，还有两个蒸笼，一钵汤。嘿，那个鳝鱼才叫好，四角钱满满一大盘，店老板说，当地黄鳝8分钱一斤。

如此便宜的上等货，怎能不吃！

老陈十分着急，四下张望，生怕有人追上来，他气急败坏地对我说：“你这个人就是贪杯！这个时候了还要品酒！快点吃，吃了走！走！”



谭显殷、陈孟汀1967年逃跑地同心岛马鞍山



陈孟汀，平反后任四川外语学院院长，1992年去世

我胸有成竹地对他说，我算好了，他们起床后发现不见人，还得找一下，八点钟出工还不见我们，才会断定我们逃了。汇报上去，再打电话到狮子滩，折腾下来至少半个多小时。还有，他们主要的拦截方向肯定是通往重庆的公路码头，不会想到我们反方向逃跑，我们有时间好好吃顿饭。

事后证明，我的判断都是正确的。

吃完饭，上路，这一走，又走了30多里，走到高峰场。一个饭店的招待员说，下午有一辆过路班车到垫江县城。

实在走不动了，两个多月的连续劳动和批斗，一夜的紧张奔命，把我们累垮了。

下午四点来了一辆客车，我们搭上车，天黑前到了垫江县城。

县城里一片喊打喊杀声，高音喇叭吼得震天响，火药味很浓。誓死保卫毛主席的两派正在为一个共同的目标打斗得难分难解。

我一看这阵势，心中暗喜，对老陈说，放心放心，今晚不会有事，他们打得越热闹我们越安全。

我们找了一个不起眼的鸡毛店住下来。我带得有菜站的工作证，店主把我们当成重庆来的客人，热情迎到楼上住。

当天晚上，我还溜出去看了一眼垫江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

第二天一早，乘车继续往北，到了梁平，住一晚又乘车到大竹，从大竹又到邻水，最后回到重庆。

我们绕了一个大圈子，让那些在狮子滩，在长寿码头，在朝天门追捕的人白忙一通。

我同老陈在市中区分手，各自回了一趟家。第二天，老陈逃往北京，我逃往成都，我在成都呆了近一年，确信没危险了才回到重庆。

1979年，大形势让我“重新做了人”。市委组织部的人找我谈话，问我这些年怎么过来的。我说，四年鱼贩子，一年流浪汉，十六年菜贩子。他说，算不错嘛，活出来了嘛。我说：“是呀是呀，托共产党的福，我还健在。”

“改正”后，我进入市委宣传部，后担任了副部长、高等教育办公室主任，又干了十年。

八十年代初，平反冤假错案，改革开放，我很振奋，以为共产党有希望了，那些年，我没日没夜的干。八十年代后期，我又觉得不对劲——以权谋私、官倒捞钱愈演愈烈，但真正给我当头一棒，让我“痛醒”的是“六·四”的枪声！

我年轻时就是专搞学生运动的，追求民主自由，反对独裁专制是学生运动的主旋律，也是我青年时代生命意义所在，1989年我老了，但当年的精神和追求仍在。

我没料到共产党会对学生动用坦克机枪！

我年轻时加入的这场革命是历史的一个大错误，一个大悲剧。

九十年代初，我担任市人大教科文副主任，到专县去视察教育。不少地方拖欠教师工资，有一个学校的教师半年多没领到钱，一位教师的儿子因长期营养不良，夜夜尿床。我听得火冒三丈，指着那些官员的鼻子说：“我告诉你们，当年国民党撤离大陆，都是发了钱才走的，没有欠教师一分钱……”

但是，我已经老了，上几步楼就喘气，医生检查，说我共有九种病。



我坚信，中国一定要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2009年6月）

不过，我儿子年轻，精力好，他民主、自由、人权的意识很强。“六·四”镇压之后，他情绪极其低沉，我安慰他说：“这个政权现在是靠刺刀来维持，但是，一个靠刺刀维持的政权能走多远呢？”

噢，我又错了，现在12年过去了，一切如旧。看来，争民主自由的路还很漫长。但是我很乐观，我坚信中国一定要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我年轻时的追求——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一定会实现。只是我看不到了。

采访时间：2001年4月18日 地点：重庆市渝中区

采访后记

两年前，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叫《历史的先声》，该书收集了共产党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反对一党专政，呼唤民主自由的社论、文章。下面是部分这类文章的标题：

一党独裁，遍地是灾！《新华日报》1946年3月30日社论
谁使中国不能安定？专制政府！《新华日报》1946年5月17日社论
三三制：一党专政的天敌 《解放日报》1945年12月7日
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民主的正轨：毫无保留条件地还政于民 《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社论
人民真有发言权的国家才是真民国 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19周年大会演说词 1944年3月12日
不能因国民程度不高而拒绝民主 《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社论
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实行民选吗？《新华日报》1946年1月24日
有人民自由才有国家自由《新华日报》1944年5月16日社论
论英美的民主精神《新华日报》1944年3月30日
只有民主才能保证创作自由《新华日报》1946年6月12日
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
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新华日报》1946年1月11日创刊八周年纪念文章
为笔的解放而斗争——“九一”记者节所感《新华日报》1945年9月1日时评
切实保障人民权利 《解放日报》1941年5月26日
学校要做民主的堡垒《新华日报》1946年2月6日社论
……
只看这些标题，就让人热血沸腾！
只看这些标题，就知道这个党和领袖伟大光荣正确。
只看这些标题，就明白谭显殷为什么要冒生命危险跟它走。



被共产党匆匆忙忙查禁的书

裴秀娟（1946年在重庆女子师范学校加入共产党领导的地下社）对我说：“那个时候国民党没有喊民主自由，只有共产党在喊，喊得声声入耳，声声入心。我以为中国只有共产党代表民主自由，只有共产党追求民主自由，所以就跟共产党走了。”



裴秀娟：那时只有共产党在喊民主自由。

下面是随手摘录的几段“语录”：

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应在所有领域贯彻民主。（毛泽东 1944年6月12日答中外记者团。《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从前有人说过一句话，说是“有饭大家吃”。我想这可以比喻新民主主义，既然“有饭大家吃”，就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毛泽东在1940年2月20日在延安召开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的讲话。）

我们不想像苏联那样趋于极端——没收地主的土地……政治方面，在我们既不要求也不计划无产阶级专政一点上，我们也和他们不同的，我们也不主张一个最沮丧的个人创造性的集体主义——实际上，我们是鼓励竞争与私人企业的……讲到政府——像你晓得的一样——我们信仰与实行民主政治，采用‘三三制’，限制任何一党专政的可能性，像今天国民党所实行的那种情形。（1944年毛泽东与福尔曼的谈话。）

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污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是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与目的外，没有其它的利益与目的。（《刘少奇选集》上卷172页。）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民主还是独裁就看有无言论自由；言论出版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

文明国在宪法中不仅保证人民思想、信仰、言论、出版之自由，而且明文宣告放弃检查制度和禁止采用检查制度。（《新华日报》1926年2月18日专论。）

记者和同胞应当一致奋起，挽救新闻界的危机，挽救全民族的危机，反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法西斯化新闻统治政策，并向国民党当局要求立即开放言论出版自由、保证记者的人权和言论自由权。（《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社论）

选举权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必须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码的政治权利。民主国家主权在民；人民是主人翁，官吏是公仆，代议士是人民的代表，好像是监督和管理仆役的管家，如果人民没有选举权，不能选举官吏和代议士，则这个国家绝不是民主国家，绝不是民国国家了。（《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社论。）

对青年应有民主态度——不可强加污蔑、动用武力。对青年千万不应以武力对付，并保障其身体、言论、集会、结社等基本自由。（《新华日报》1945年12月11日。）

近年来，很多大专学校中有“民主墙”的设置，这是一个好现象，但假如只有在这一堵墙上才有民主，那就不能不使人有民主太少之感了！民主墙的精神应该发扬，使整个学校、每一个学校都成为民主的堡垒。（《新华日报》1946年2月6日社论。）

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忠于它对人民的诺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纲领中的每一条文与每一句话都是兑现的。我们绝不空谈保障人权……禁止不经过法定手续来逮捕、审问、处罚任何人……人民不仅有集会、结社的自由，还有有武装自己的权力，我们不怕人民的组织与活动，只怕他们不能积极动员起来。（《解放日报》1941年5月26日。）



谭松与《历史的先声》
一书的编者笑蜀合影

我从小天天被灌输一句话：“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现在，我越读《历史的先声》，越觉得这句话正确。

只是，这本收集共产党光荣历史的书，被共产党急急忙忙查禁了，查得非常迅速，非常彻底。（我是从网上千辛万苦才找到它。）

我没有四十年代谭显殷、裴秀娟的那种幸运，但是，我愿意继承他们当年的那种追求。

补记：谭显殷于2012年7月17日去世，他儿子为父亲写了这篇文章：

在莲花山公墓前

重庆南岸区莲花山公墓。

天，有些阴沉，偶尔，洒落几滴稀疏细雨。正是金桂花开时节，墓地里，千株金桂齐放，秋风习习，芳香阵阵。

下午三点半，一块墓地的石板被打开，一个褐红色的骨灰盒安放墓中。

没有爆竹、没有乐音，只有三束鲜花、两枚徽章、一排红烛。

泥土徐徐洒落，香烟袅袅飘升……

亲友们逐一在墓前默哀、鞠躬。

逝者当年的校友和战友尹凌女士捧上几枚缝在一块绸布上的徽章，一枚是他们当年（1949年前）的南开校徽，一枚是他们当年（1949年前）参加革命时地下社的徽章。徽章被放置在骨灰盒上，伴亡灵永存。

逝者地下社的战友、生前知己，重庆大学教授罗信群女士在女儿的搀扶下，面对墓碑泣不成声，站立不稳。

墓碑前，她与尹凌女士敬献的丝绸挽联在秋风中微微飘动。

82岁的廖带方先生专程从巴南赶来，独自徒步爬上莲花山，在老友墓前深深鞠躬。

……

唯一的官方人士是南岸区统战部部长。他坚持前来的原因之一是逝者曾经为南岸区

作出过“革命贡献”。

南岸，重庆市长江南岸，一块充填了亡灵主要人生岁月的土地。

激情、豪情、友情、爱情、亲情；
告密、批斗、惊恐、屈辱、悲愤。

1949年底，21岁的他受党的指派，怀着建立“新中国”的万丈豪情，踏上了这块土地。

参加工作队餐风宿露，创建团区委上下奔波……

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天空仿佛是那么明亮；一个青年的未来前景仿佛是那么宽广！
燃烧的革命激情，甜美的青春情爱……

然而，1957年，一场来自北京的六月寒雪、一封发自南岸区委的告密信件，点金为土，终结了虚幻的明朗天空和真实的青年梦想。

29岁的他，踏上了劳改之路，家虽未破，人却将亡（1960年和1962年）。南岸，成了他在流放之地一个爱恨交织兼朝思暮想的地方。

四年半后，他终于又回到故地。但是，迎候他的，早已不是燃烧着激情的天空，而是江边一个破烂的菜棚。

山城夏天毒辣的酷热、长江冬天刺骨的寒风，交替打磨坐在菜摊前的帅气“菜贩”。

三天两头的“认罪交待”、长年累月的“政治运动”，比夏天的酷热、冬季的寒风更加摧折男儿身心。

从家门伸延到大街的“打倒”标语、从湖岸到江边的亡命逃亡……

从33岁到50岁，一个男人最宝贵的年华，在南岸江边那个破烂菜棚里化作苍烟流泉。

他等到了他冤屈的“改正”，这是他有生之年的大幸；他没盼到他当年追求的实现，这是他死不瞑目的大憾。

墓地的石板合上了，他从此长眠在这块他曾燃烧激情也曾饱受屈辱的土地。

这是一块让人魂牵梦萦的土地！

墓地山头的后面，便是那著名的黄山。抗战八年，陪都重庆，从领袖到民众，铁血壮志，浩气凌云！多少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足踏长江嘉陵，出生入死，慷慨悲歌……

他长眠此地，也是一种安慰和幸运。

墓碑旁的桂花，秋风里暗暗吐出缕缕幽香。

碑石上的遗像，默默注视着脚下滚滚长江。

那目光，深沉而忧郁，仿佛含蕴着深切的期盼……



晚年谭显殷夫妇（2007年10月）



一个长寿湖逃亡者的经历

李文书

1957年重庆市话剧团演员

1936年生



一，初登人生舞台

我是四川邻水县人，家里在县城开了个照相馆。我从小喜欢画画，初中毕业那年，1954年，我已经画了几百幅，我的美术老师冯宗祥认为我有天赋，专门带我到重庆报考美术学院附中。

附中看了我的作品，非常满意，老师高兴得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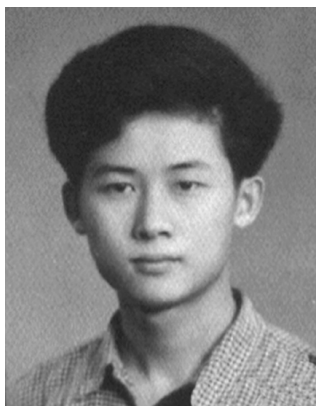
报考前，市教育局突然定了个“区域限制”——只有户口在成都、重庆、昆明、贵阳、拉萨五个城市的学生才能报考！

我人生路上遭遇的打击难以计数，这是第一个。我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这个“新社会”不自由。旧社会读书考学都没有区域限制，怎么新社会要限制呢？我们反复唱的那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里不是明明白白写着“（共产党）实行了民主好处多”吗？

“新社会”的这个“区域限制”不知限制了多少区域外的天才！

冯老师垂头丧气，带我在市中区游荡。他安慰我说，他有个朋友在国泰电影院，找他商量把我的户口从邻水转过来，变成重庆人，明年再考。

在国泰电影院附近，我们看见西南人民艺术剧院演员训练班招生，冯老师说，去考一下试试。



李文书在邻水读书时

我在初中很活跃，经常上台表演，还会拉手风琴，但我一心想搞美术。老师再三劝我：去试一下嘛。

260个人报考，只收5个，我无心当演员，所以不紧张，初试、复试，一考就中！

我不去，招生的人不干，扣住我的学生证（报名时交给他的）。这个时候，老师和我身上都没钱了，没钱住店，冯老师要回去了。演训班非常热情地留我，保证供我吃住。

为了生存，我留了下来。

我这辈子，总是命运推着我走，我个人把握不住。

演员训练班偏偏设在美术学院内，勾得我心猿意马，

我一边学表演，一边暗恋美术，有空就去看美院学生画画，现在的著名画家江碧波、马一平都是同我一块报考的，他们比我幸运，户口在“区域”内。

演训班学习两年，每周一个作品表演，连续四次不合格就要被淘汰，我完全可以主动被淘汰，改学美术，但那个时候的人很老实，我没想到可以钻这个空子，也没有人给我指路。

我们1956年6月毕业，毕业演出选定的剧目是反映农业高级社政治运动的剧本《处处是春天》。我扮演的是一个家庭十分贫困的农村孩子。毕业演出一炮打响。《重庆日报》登载了我们的演出，剧评家王大虎（注：1957年被划为极右，1963年病逝。详见本书《一个将门后代的遭遇》）专门评论了我，那个时候，一上报受赞扬就算有了点名气。

但是我不在乎，我心大得很，前面的世界宽广得很。

毕业后我分到了话剧团，参加了话剧《同甘共苦》的演出。《同甘共苦》，讲的是一个革命老干部进城后抛弃了老区的妻子孩子，另寻新欢建立了新家。但是，他在老区的妻子孩子理解原谅了他。我伴演的就是农村妻子生的孩子。这个戏于一九五七年元月上演，周恩来、贺龙在李井泉、任白戈陪同下观看了演出。剧终，周、贺、李、任上台



毕业演出话剧《处处是春天》（正中为李文书）

与演职员见面并留影。合影时贺老总招手要我到他跟前去留影，我不去。这时我身边的同事就推我：“贺老总叫你啦！快去！”我还是不去。贺老总甚至周恩来都向我招手叫我过去，剧院领导上前来拉我，我仍然一动不动，硬要同扮演奶奶的演员站在一起。当时周、贺并不在意，然而剧院上上下下很当回事，特别是那些马屁精们，有的说我傻，有的说我这种表现是对中央首长没有感情。到了反右批我时，更是上纲上线，说这是对中央领导有深仇大恨，是反对共产党的具体表现。其实，我只是不爱出这种政治风头，更不爱在大官面前献媚卖乖。说实话，那时我还幼稚无知，对共党高层领导人还是很热爱的。

二，被“阳谋”绞杀的初恋

我分到话剧团不到一年，鸣放开始了，人们给当官的提了不少意见，什么任人唯亲、独断专行、耍干女儿——搞年轻女人，等等。我一看，哇，怎么这么污？！



李文书（右三）演出后与贺龙（左一）、周恩来（左三）、李井泉（右五）合影

这些事放到现在来看是小菜一碟，比如眼下当官的包二奶已经是普遍现象，但那个时候我对共产党很热爱，认为共产党先进、优秀，共产党内不应该有这种人。

我画了幅漫画《我所欲也》，指名点姓讽刺院长。我把他画成个罗汉，肥头大耳，舒舒服服躺着，旁边有人给他打扇，有人给他挠痒，有人给他掏耳朵。罗汉肥大的左手心上站着一位苗条淑女，脖子上带着干女儿的项链。院长则把一项项“党员”、“先进”、“优秀”的帽子赐给这些人。

这幅漫画我画得惟妙惟肖，充分展示了我的绘画才能，是我分到话剧团后的第一幅公开作品。

我漫画讽刺的院领导，后来继续搞年轻漂亮的女演员和女学员，并同另一位领导争风吃醋，两人为此大出打手，互相揭发，丑事闹得人人兼知。



李文书摘帽后留影

“我有意穿上肩头打补丁的衣服，侧身向右看，既突出了补丁，又突出了‘右’。”

反右一开始，就把我划成反党小集团，成员有右派李正、范国瑞等。

但是没划我右派，一位领导找我谈话，要我写检查，认错。我不干。他前后找了我三次，问：“写不写？”“不写！”“写不写？”“不写！”“不写就划你右派！”“划就划，当右派有啥不得了！”

我那时还是个毛头小伙子，不知道中共政治运动的利害，更不知道这会毁了我的一生。

1957年11月，我被划为右派，下放南桐农村劳动。

我并不害怕劳动，人年轻，力气好，又活泼，农民们都喜欢我，我1959年就摘了帽。

在当右派前，我有20来个朋友，每个月通一次信，

当了右派，我主动给他们写信说我是右派了，今后不再往来。

那几年，只有一个人不怕，坚持同我通信。

这个人叫王铮铮，是我邻水中学的同学。我在歌剧团时，她来报考，我给她手风琴伴奏，她考上了四川音乐学院附中，我到附中去看过她，她的同学说，哟，王铮铮耍了个帅小伙。她高兴得很。我当右派之后，她一直同我通信。



李文书初恋情人王铮铮

一天，我收到一封信，沉甸甸的，打开一看，是她寄来的，里面还装了两颗上海大白兔奶糖，这是当时最好的高级糖。当我把长长几页读完后，才理解了这两颗奶油太妃糖的含意。她爱我！她把几年前就萌动的对我的爱恋之情毫无保留地表达出来。我被感动了，流泪了。当人们把右派视为敌人，纷纷背离而去时，居然有这么一位小同学小姑娘向我表白爱情！

1960年，她附中毕业，成绩非常优秀，但是，学校党委告诉她，必须同右派分子划清界线，否则不准升音乐学院。她给我来了封信，问我怎么办，我没给她回信，直接给她学校的党委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我决心与该校学生王铮铮断绝一切关系，从此不再往来。从此我真的不再给她写信，

后来我出去流浪了，她找不到我，给我哥哥写信，哥哥也不知道我的下落，我们就此断了音讯，直到十六年之后。

三，在长寿湖的经历

我的麻烦主要出在长寿湖。

大跃进时，重庆市委的领导冒出个念头——把长寿湖搞得像西湖，渔场为此组织了一个美术组，要求从美术的角度把长寿湖设计得比西湖还美。右派中有的是美术人才，如四川美协的国画家杨鸿坤、岑学恭，西南美术学院美术系主任吕琳，四川美协漫画家高龙生等等。我是摘帽右派，被派去当副组长。

在美术组里，我同顶头上司苏新一——渔场狮子滩区的书记——发生了矛盾。

这些画家都是半老头子，身体又不好，苏新认为，搞设计也得参加劳动，劳动改造思想雷打不动。我是副组长，为他们说话，同苏新发生争执。苏新骂我“你不要以为你摘了帽，告诉你，摘了帽也还是右派！”

紧接着，大跃进变成了大饥荒，到处死人，还搞啥“超西湖”？美术组撤销了。

在长寿湖有一件事我终身难忘。那是1960年的一个夜晚，我划船从新滩回来，结果在路上迷了路。



“我1959年在小河边的一块岩石下往上爬，当时没多想什么含义，到文革批斗我时就说我把反右比作陷井，要从陷井里爬出来。其实，鸣放反右就是毛泽东给知识分子设下的陷井呀。”

长寿湖到处是水沱水湾，我左转右转像陷入了迷宫。到夜半时分，就在我一筹莫展胡乱瞎划时，忽见远处有一微弱灯光。我赶紧对着光点划了过去。上岸一看，灯光来自沼泽带以上洼地中的一户农家，孤零零地立在湖边，四周杳无人烟。我上去拍门，一个男人打开门，很惊讶地望着我。我告诉他我迷了路，他让我进了门。在油灯下我惊喜地发现，他的小屋里还有不少粮食！在那个“大饥荒”年，很难看到一户人家有这么多的粮食。我在那儿住了一夜，也吃了他一顿。

第二天他送我上船，并给我指路。我问他：“我咋个叫你呢？”他说随便我。他笑得那样厚道，笑得那样憨直，我大声高叫：“我叫你憨哥，要不要得？”他笑着说：“要得，小兄弟，你把路记好哟，饿了糟了（“糟”——重庆方言，意思是想吃肉了）就朝我这里跑。”

我们在笑声中告别。我一路里想着憨哥，这个壮实的单身汉，为什么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这与世隔绝的地方呢？

由狮子滩大坝向东去有个云集镇，那天，我第一次去云集。

这镇很一般，一条破街冷冷清清，看见的人几乎都是黄皮寡瘦的饿殍鬼。走到场口，我看见一个15岁左右的女孩，领着两个同她一样奄奄一息的小孩在讨饭。三姐妹个个骨瘦如柴，瞪着一双讨吃的大眼睛。我看他们的样子十分悲惨，便上问她们是哪儿的。女孩告诉我，她们家在丰都县黄草山，那里已经有几个村全家死绝，死尸无人埋，满山遍野飘浮着恶臭，而且已经有活人吃死人肉。女孩说，她们家死得就剩下她们三姐妹，她把爸爸埋了后就带着两个妹妹出来讨饭，希望给点吃的，希望有人收留。大姐还说她是农业中学学畜牧的，养猪养牛接生配种她都能干。

但是，那个年代哪儿讨得到饭？

我看他们姐妹三人也会饿死，于是产生了强烈的救她们一命的冲动。

我想到了那个隐蔽湖湾里的单身汉憨哥。

到了憨哥处已是下午，我已饿得同三姐妹差不多了，来不及说明来意就叫憨哥赶快把吃的拿出来。吃完饭我才把她们的情况给憨哥说了，说得憨哥两眼发红，我也流泪了。



李文书在长寿湖犁田（1961年）

“憨大哥，救救我们吧，我们三姐妹不会白吃你的饭，我们都会干活，三妹也会打猪草放牛放羊……”大姐拉着两个妹妹一下子跪在憨哥和我面前，苦苦哀求。憨哥起身走出大门外，望着远山久久无语。

屋子一片死寂，只有三姐妹暗暗的抽泣。

半晌，憨哥转身走进屋，对我说：“你说呢？”

我知道这事儿成了，忙对三姐妹说：“你们今后叫他大叔、不叫大哥。”大姐急忙问：“大叔你收留我们吗？”这时憨哥面带微笑说：“按我家规举叫爸不叫叔，你们今后就叫我么爸。”

我如释重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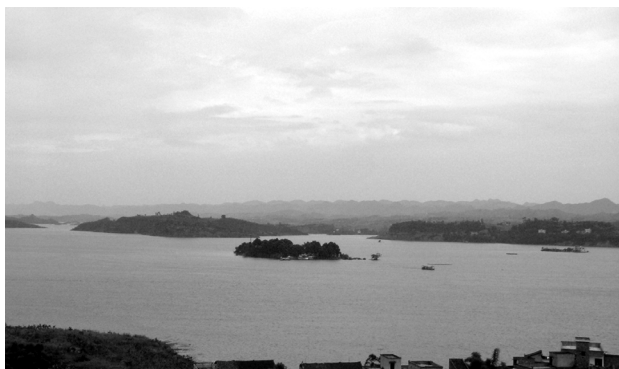
分别时，大姐送我上船，我特别叮嘱她不能把憨哥这一切说出去。

1961年冬，又搞了个小整风，传达了个文件，上面有毛主席的一封信，专门针对农村一些干部的大吃大喝和克扣群众口粮，文件说这是国民党作风。我看见场部小食堂经常大吃大喝，管食堂的一个姓李的小个子，同我关系好，他告诉我一些内幕。我忍不住了，又像1957年鸣放一样站出来说话，写大字报，还把苏新调戏一个姓王的女娃娃的事抖出来说，她是热带鱼研究所的，比我小一岁，是她亲口告诉我的。

那个小整风转眼又变成整人！大吃大喝的人一点事没有，我又遭了。毛泽东这个人，真的，捉鬼放鬼都是他。

苏新不出面，找了一个叫顾XX的摘帽右派当打手。

5月份搞“双抢”——抢收、抢播，通宵达旦地干。一天晚上12点，我还有一块麦子没割完，我准备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再割，结果一坐下去就睡着了。苏新、顾XX借机惩罚我，把我一个人放到猪儿岛，三顿饭划船送来。那两个月我每天和泥巴、荒草、星星、月亮作伴，我的孤独性格就是在猪儿岛形成的，从那一年起到现在，我都特别能忍受孤独。



湖心就是李文书独自劳动的小岛——猪儿岛（谭松摄）

他们还强迫我干重活，不完不准吃饭，1961年，每一口饭都是救命。我发现他们是要置我于死命。我悄悄跑回剧院，要求领导调我到别的地方去劳改，长寿湖太黑暗了。

在剧院发现，1957年我讽刺过的一个秘书已经当了副院长，此人最善于吹牛拍马，媚上压下，我的请求自然不会有结果。

回到长寿湖，苏新说我逃跑。这次动手打，他不动手，顾XX也不动手，顾找了一些孤儿来打我，我又跑回剧院，强烈要求换地方。剧院答复：忍一忍，明年调我回剧院。

长寿湖认为我第二次逃跑，惩罚更重，这一次不打，而是把劳动量加大，大得我根本完不成，完不成就不准吃饭。每天晚上，田里只剩我一个人在干活。苏新、顾XX要把我逼死的意图旁人都看得一清二楚。

我决定真的逃亡，等不到明年了，我很恐惧，第一次感到死的恐惧。

我把我的决定告诉了范国瑞、宋清涛，他们也明白，我不逃只有死路一条。但他们担心我跑不脱，范国瑞给了我几斤粮票，说“你要是被抓回来，肯定吊起打，你活得出来？”

在猪儿岛对面一个叫黄楠村的地方，住得有几家农民，我同他们关系很好，我决定先到农民家躲几天，等追捕的人收兵了再逃。

农民很好，收容了我，不怕受牵连，我在一个姓刘的农民家躲了三天三夜。

1961年9月，一个没有月亮的黑夜，我偷偷摸摸溜出门，开始了长达半年，纵横十余个省的逃亡之路。

姓刘的农民怕我迷路，也怕我被抓，他半夜起身陪我上路，还给我烙了几个饼子，我泪水流出来。那个时候，回龙乡靠近垫江一带，一个村一个村的人饿死光，几个饼子比现在的几两金子还贵重！



逃亡前躲藏的黄桷村

我们不敢走大路，摸黑走小路，一路上月黑星稀，没有狗叫，更没有鸡鸣，四下一片死寂。横扫中国的大饥荒已经到了第三个年头，借用毛泽东的诗，叫作“万户萧疏鬼唱歌。”从狮子滩到邻封镇短短七、八里，就在我走的这条小路上，就看见三具尸体。尸体都倒卧在黄桷树下。川东地区，路口、垭口总有一棵黄桷树供行人歇凉休息，这几个人走到这里，坐下来休息，倒下去就断了气。我在黑夜中看见那张枯干凹陷的脸，尤其是那白森森的牙齿，背脊阵阵发麻。我才22岁，已经感受到四周的世界像一个阴森森的大地狱。

“改正”后我把那天晚上的经历和感受写成一篇小说，本来要发表，批判白桦又撤下来，我拿给范国瑞等人看，他们看哭了。

在邻封，我同小刘分手，他叮嘱了我一番，一直目送我消失在黑夜中。

四，我的逃亡之路

我走到长寿县城天才亮，我不敢直往重庆走，往反方向，坐船下涪陵。到了涪陵，一看也是满目萧条，我在江边一个烂棚棚里蹲了整整一天，然后从涪陵坐船到重庆。

在重庆我没有钱，又没有家，只得回邻水。我渡过嘉陵江，到江陵厂找我一个朋友，他也没钱，给我几个馒头，我靠这几个馒头，走了两天才回到邻水。

老家只有一个哥哥，他因大炼钢铁又累又病，没得到医治，瘫痪了，家中娃儿多，生活十分困难。我吃了一个月，实在不忍心再吃下去。我听人说，北大荒日子好过，不缺粮吃，于是我决定跑北大荒。

临行时大哥将父亲留下的那部德国蔡斯相机交给我，说这是古玩在首都北京能卖钱，带上它救急用，也作为送别。那个年头一分别，还见不见得到，鬼都不晓得。

我到重庆后，把留在剧团的最后几件衣服拿到大阳沟卖了，买了张到北京的火车票。在北京永定门下车后，身上钱光了。北京查得严，不好混车，北大荒还远，怎么办？

我在永定门转来转去，走投无路，莫法，只得去找民政局。我老老实实说，重庆来的，要去北大荒。民政局把我当盲流收留，强制送我回重庆，我同一群盲流一起被送上火车。

到丰台时，我溜下车，钻出车站。在车站外我蹲在地上一筹莫展，逼迫痛下决心：卖相机！

我转来转去找买主，几个公安人员突然出现在面前，不由分说把我抓进派出所。

“相机从哪儿偷的？说！”照相机在当时属于贵重物品。

“是祖传的，我父亲开像馆。”

“祖传的？你是什么人？”

我老老实实交待，我是右派，活不下去了，想到北大荒。

他们一听说我是右派，不多问了，立马把我抓进看守所。

这一关就关了 20 多天。

放我出来时，派出所的人说，他们同剧团联系了，证实了我的身份，是右派，要押送我回重庆。

“相机呢？”我问。

“相机？你还想要相机？！”

我不敢多说，怕又被关，相机就这样被他们吞了。现在老百姓说，公安腐败黑暗，其实那个年代就腐败。

快到石家庄时，押送我那个人下了车，他一走，我赶紧溜下车。打死我，我也不回重庆，不回长寿湖。

在石家庄车站，我遇到两个河北熟卢县的农民，他们是叔侄两，倒腾点小生意。听说我的身世后，他们劝我不要去北大荒，跟他们去内蒙古，那边有粮食吃，人手缺，管得又不严，肯定能呆下来。我身上还有最后几块钱，他们叫我拿来买点杂货，比如大蒜，沿途倒卖，挣口饭吃。车票就不用买了，跟着他们，混。

我一无所有，不怕被骗，而且那个时候骗子少，人心不像现在这么坏。

我决定跟他们走。

从石家庄出发，经阳泉、榆次、太原、忻州、朔州、大同，一截一截的混车。这叔侄两是混车老手，各个车站地形熟，我跟着他们翻围墙，钻栅栏，爬车厢，进进出出上下下，如入无人之境，居然没被逮住一次。

到了内蒙，每过一个村子，他们都前前后后找人问：有个小伙子，愿意留下来干活，要不要？

每次答复都是：要是早来两个月，没问题，但现在中央刚刚下了文件，传达了，不准收留任何陌生人，尤其是没有证明的陌生人。

我们整整走了三个县，没有一个地方敢收留我。这个政府威力大得很，内蒙这个偏远的地方都管得严严实实。

叔侄两陪我走了一村又一村，没法了，他们要回家，问我怎么办？跟不跟他们回去？

人到了这个地步，心有些横了，血液里生出了些野性。我说，不回去，我再往草原深处走。

同叔侄两分手，我有些感伤，素昧平生，他们尽了力帮我。

天，冷了，越来越冷，我穿得单薄，衣服早卖得精光。茫茫大草原，风吹草低见牛羊，我很有些冲动，可惜，又冷又饿，骨子里那种绘画的艺术浪漫升华不起来。

我又混上火车——我已经很有“技术”——又到了北京。北京也冷，我坚持去看天安门，天安门在我心中很神圣。

那个天冷得很，寒风呼呼吹，我站在宽广气派的广场，哆哆嗦嗦。毛主席的巨像挂在正中，正慈祥亲切地望着我。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我突然觉得这一切都与我无关，我卑微得很，在这个地方没有立锥之地。

我也突然想到，我这种状况，不该往北大荒走，要流浪，也要往温暖的南方。

我主动找到收容所，这次我没说实话，更没说自己是右派，我告诉他们，我是湖南来的盲流。

在收容所住了几天，我同一大群盲流一起被送上南下的火车。整整一节罐罐车厢装盲流，里面各色各样的人，还有大学生。我同他们交谈，个个都有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让我大开眼界。

到了武汉，从车站转收容所，我又溜了——我想去看武汉长江大桥。大桥是新中国的骄傲，富强发达的象征，报纸、广播都这么说，来都来了，不看可惜。

我在武汉游荡了一天，饿着肚皮看大桥，那一天我只吃了一点糠饼，在大桥上，饿得清口水直流。

当天晚上我在江边一个码头上过了一夜，第二天扒火车混到了长沙。

我已经变“油”了，脸面、自尊顾不上了，在长沙我游荡了两天，实在讨不到东西吃，就又往收容所跑。车上的盲流曾经对我说过，云南比湖南好，不冷，容易找到吃的，所以，在长沙收容所我就说我是云南那边的人。然后，从长沙到衡阳，衡阳转桂林，桂林转柳州、柳州转贵阳，从收容所到收容所，每站都要到当地收容所住上三五天，为的是要凑够一节车箱人数。收容所不能让你白白吃，每天都要干体力活儿，比如担水、背柴禾、洗菜。记得在桂林时我特别动情，收容所在漓江边上，江水清得很，唤起我的美感，因此我争着干洗菜活儿，因为洗菜在漓江边，可以欣赏到漓江风光。我第一次见象鼻山，就是干洗菜活儿时看到的。我很想去游漓江，那里是画画的好地方，可惜我腰无半文。



桂林漓江风光（谭松摄）

这一路每天两餐饭虽然定量很少，但不至于饿死，盲流们把这饭叫作“吊命饭”。

在收容所，我“表演”得很好，我受过专业训练，又演过话剧，一路上跟盲流学几句当地土话毫不困难，收容所根本没看出破绽。我的表演才能在一个个收容所里派上了用场。

到贵阳时是半夜，我同十多个盲流逃了出来，第二天到了安顺，在这儿我遇到一个人——河南信阳的农民葛道纯，这个名字刻骨铭心，我至死不忘！

葛道纯不到三十岁，是河南信阳农民，家里有人饿死了，他一年前逃荒出来就在宣威修路。这次他回家看，仍然活不下去，于是又打算跑到云南宣威修公路。他对我说，宣威修公路不要证明，吃饭没问题，还有工钱。

我一听来了精神，这个大中国只要哪点能收留我，给口饭吃，我就去！干活，再苦

再累没问题。

当时，铁路只修到安顺，再往前只有走路。那些地方是黔西滇东北云贵高原海拔最高的山区。我们两从安顺出发，跋山涉水，一路上全是大山，爬了一山又一山，似乎永远爬不上顶。那些地方偏僻落后，人烟稀少，时值隆冬，山高坡陡，更是显得凄冷荒凉。不过，路上不见三面红旗飘扬，山上的农民还是有吃的，他们受“大跃进”的折腾小一些，没有遭到像李井泉（四川省委书记）那样整，日子比四川农民好过。我们一路上向他们讨吃的，他们至少丢几个干包谷，我们在火上噼噼啪啪烤起吃，睡的是山民屋前的玉米桔杆堆，哪里黑哪里睡。

这时已经是冬天，山雾弥漫，我成天在湿润的雾气笼罩下爬行，渐渐感到身体不适，发烧、流冷汗，不再感到饿，不想吃饭，连水都不想喝。我叫葛道纯走，别管我，他不干，他摸我的头说我感冒了。他坚持扶着我偏偏倒倒走到水城。

到了水城，我们去水城外一家诊所，医生也说是感冒，抓了三付中药，病不见好转。葛道纯要拿出他仅有的两块钱再看医生抓药，我坚决不同意。我不走了，葛道纯坚持要我走，他说：“宣威不远了，我扶你走。”

一出水城，哎哟，那个山大呀，抬头不见顶，只有满山遍野形象怪异灰白相间的花石头。爬在这样奇特的荒山野岭上，我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我身体在长寿湖就磨损了，流浪四个月，没吃几顿饱饭，加上病，实在拖不起。葛道纯20来岁，劳动汉子，身体好，他又扶又拖，一天只能走20多里。

几天后，我们来到一个山溪边，这儿海拔2000多米，空气稀薄。我已经三、四天没有大小便，汗也不出了，一滴都没有。葛道纯跑到山民家，为我熬包谷粥。我对他说，不费心了，我活不过去，我写封信，告诉家里我死在这儿，你今后寄给我哥哥，我只有他一个亲人。

然而葛道纯死活不愿意，他说就是背也要背着我往前走。“我晓得你这个病，有救。这条路我熟，前面有人家，坚持几天，我找人给你医。”他说。

云贵高原，一望无际，冬风吹得呜呜响，那个声音像是哭丧。

又走了一天多，我除了神智还清楚，全身像个死人。

我坚决不走了！我把信掏出来递给他。他不接，说：“除非你死了，我才会一个人走。”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他的表情，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张忠厚的脸！

四周的山，大呀，大得很，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觉得随时都有可能断气，但我不怕，不悔。不逃出来也要死，长寿湖死得更快，出来还见了天安门，大草原，游了祖国的大好河山。

天，近黄昏了，我断定我活不过当夜。正当这时，我们看见前面靠山顶的地方，有个苗寨。

葛道纯高兴得叫起来：“好了，好了，你有救了！”

道纯把我扶进山尖一幢独立的茅草屋，



贵州安顺山峦（谭松摄）

主人是个70多岁的孤老头，是个瞎子，同一个七、八岁的小孙子生活。

葛道纯对他说有个病人，你看一下。他摸了摸我的头和脉，问葛道纯：“你还有好多钱？”

葛说：“只有两块。”

老人说：“够了，你到对面宣威去买一块腊肉回来，要快！”

老人这个苗寨，正处在贵州水城与云南宣威交界的边界上，两省两县以深谷下的一条小溪为界。小溪对面就是云南宣威。“对面”说起近，但山大，一上一下得两三个小时。

然后，老人又把孙儿叫来，给他说了三个地方，让他去采三种药。

我已经站不起，倒在火塘边，老人把火塘烧得暖暖的。“你是中了大山上的瘴气，寒气出不来，要死人的。”老人说。

孙儿采药回来，老人逐根摸，他点头认可后，孙儿才把它们切了丢进一个大沙罐。葛道纯回来时，天早已黑尽了。黑腻腻的一块腊肉，也不洗，胡乱宰成几砣，丢进罐子里一起熬。

半夜时分，老人说：“行了，喝。”

一碗黑糊糊的汤端到面前。

我不喝，那些天我吃啥子都像是吃泥巴，吞不下。

老人说，就是刀子你也得吞。

我不相信他那个“药”，我认为自己必死。

他们强迫我喝了三次。

第二天早上，我开始出汗。那种汗，像浆糊，浸出来粘乎乎的，接着往外吐痰，整个呼吸道都在往外吐，痰浓得很，像稀泥巴。

我在老人的火塘边睡了两天三夜，身子轻松了。

我起床走出茅草棚外，借着夕阳余辉，看清楚了我来到了怎样的一块天地。

举目西望，层层叠叠的大山，像海水一浪高过一浪。再低头看脚下，是足有近千米高的深沟。一条古驿道弯弯曲曲下到山底跨过山溪，又弯弯曲曲爬上对面山巅，我想起葛道纯就是在这条道上往返买回老腊肉救了我一命，不由得抱住他不知说什么好。

他拍着我的背说：“没事儿没事儿，对面就是宣威，我们明天就能走到筑路队。”

可是，第二天早上，几个背枪的民兵闯进来，气势汹汹盘问：“干啥子的？”

我们都没有证明，那个年代也没得身份证，民兵断定我们不是好人，抓起来就把我们押送当地人民公社，紧接着又押回水城县城。

这次用枪押在背后！

我们沿着葛道纯扶着我千辛万苦走过的路往回走。他忍不住一次次回头往宣威那边眺望。

那边意味着工作、意味着吃饭。我心里很内疚，是我拖累了他，他已经走到宣威边上，实际上买腊肉时他已经踏上了宣威。

到了水城，他对我说，不要紧，我们找机会跑出来再走。

哪晓得这次看管得严，盘问得也严，我们只好如实招认。第二天葛道纯被单独提审，没想到这次提审他就没回来了。

水城，成了我们分手的地方，这一分手，至今音讯渺茫，彼此连地址都不知道。

几十年了，我忘不了这个人，一个河南的普通农民，生死之交呀！你要写，就照实写，不要管共产党高不高兴，但愿你能发表，他能够看到，他的模样口音至今在我脑子里都很清晰，他再老我都能一眼认出来，一旦有他的消息，再大的年岁我都要去找他。

1962年1月，我被押送到毕节看守所，在看守所关了20多天。

从苗寨出发，我就一直吐痰，天天吐那种又浓又稠，像泥土一样的痰，一直吐了一个月。在看守所，我身体还没完全恢复，但得劳动，不能白吃饭，幸亏劳动不重，比长寿湖轻得多，饭也比长寿湖吃得饱。

在毕节看守所过了春节，我被送到四川泸州。这个时候我已经没有自由，看管得紧，而且每到一地，必须劳动，泸州、重庆都如此。不过，我也不想再逃了，广阔天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往哪里逃？听天由命算了。

毕节看守所曾经同剧团联系过，核实了我的身份，但是剧团不要我，让我回长寿湖。所以到重庆之后，我只有呆在收容所。重庆收容所把我转到长寿县收容所，长寿县又把我送到长寿湖。

我转一大圈，历时半年，“游”了大半个中国，九生一死，又回到起点。
这是1962年2月。

五，难忘的憨哥和草山女

我踏上狮子滩熟悉的土地，又望见湖水时，眼睛里的光阴冷得很：要打要杀随便，生死已经无所谓。

嘿，我运气好，正遇上中央宽松政策：右派分子要恢复身体，恢复业务。据说刘少奇、陈毅等人认为把右派整过头了，人死多了，要“宽松”一下。

长寿湖所有右派都集中到同心岛搞“两恢复”，右派们高兴得很，以为苦日子快熬到头了。学习班书记陈锡元对我很“宽松”，只叫我把到了哪些地方写一下，没有斗，也没有打，劳动也很轻——洗牛皮菜。

我身体已经很差，陈锡元问我有啥想法，我说我想回邻水老家恢复身体，陈锡元同意了。我于当年4月回到邻水，与哥哥住在一起。

接下来我就找剧团，要“恢复业务”，剧团说，现在户口不好解决，由农村转城市户口最难办，是市委控制的，剧团没有权。没有户口就没有口粮，怎么生存？有人给我出主意，重庆进不了，可以去专县。正巧，当年招我进训练班的一个老师董春贵，因“右倾”被下放到宜宾文工团当团长，他一直很喜欢我，愿意冒风险接收，这样，我在1962年底到了宜宾。



长寿湖狮子山（李文书摄）

1962年上半年的那段“宽松”，让我死里逃生，下半年，毛泽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出来，右派们的日子又难过了。我刚好在那个空子里钻了出来。

这儿讲一下憨哥和那三姐妹。我离开长寿湖前去看望了他们。

憨哥一家四口对我的到来十分高兴，大妹子（我叫她“草山女”）高兴得异乎寻常，做了一顿非常丰盛的晚餐。

第二天，院坝里来了几位农民，他们赶来了一头母猪请草山女养的公猪为母猪配种。这猪配种很难，必须专业人士帮忙，这个人就是草山女。草山女十分专业地一手抓住阴茎头灌入阴道，慢慢地随着公猪摆动的节奏往里插，插到底，一直要等到公猪射完了精液她才能松手。最后，草山女像课堂上的老师对学生讲课一般对大家说：“猪的阴道和阴茎都很长，子宫很大，必须像我这样帮助牠们慢慢交配，今后生的猪儿才多。”



长寿湖右派劳动（李文书摄）

这就是草山女的学问，一个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农家女子。

这天晚上又是一桌丰盛晚宴，草山女频频举杯与我相碰，我终于醉了，醉得不省人事，不知怎么上的床、更不知睡到什么时候，惊醒时发现我光条条的身子上躺着一个光条条的女子，她抱着我狂热亲吻，手还在抚摸下身。

原来是草山女！

她很失望地哭泣着说：“李大哥，你咋个也跟么爸一样不像个男人。”

我恍然大悟，立即起身穿上衣裤，同时叫草山女也快穿上衣裤。我有点生气地（更准确地说是解地）问：“大妹子，怎么回事？你跟我说清楚。”

草山女穿好了衣裤，擦净了泪水，还是那样伤心。她告诉我，憨哥始终不愿意同她结婚，多次夜里主动去与他同房却被推出房门，她是想同了房生下孩子，他就不得不承认是夫妻了，就可与他生活一辈子。她很喜欢憨哥，不仅是因他收留了她们三姐妹，还是经过一年多的相处她真心实意爱上了他，觉得世上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憨么爸。所以，她最后采用了今晚与我同样的同床法来造成既成事实，然而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憨哥的两颗睾丸没了，被人阉割了！

从草山妹口里，我得知了憨哥的经历。

憨哥从小就在当地一个地主家当长工，同他一起当长工的还有一位小他两岁的小姑娘。他们一块干活一起吃饭。憨哥长到十七岁，他们俩就开始了恋情，情窦初开的妹子常常紧紧抱住憨哥不放。

可是，一年后，年近古稀的地主强行将刚满十六岁的妹子娶为小老婆。

憨哥气得要离开，妹子悄悄劝他不要走，并说老头子那东西不行了，活不了多久。

一年后妹子怀孕了，老头子当然清楚是谁干的。他暗中监视，他俩终于被老头子亲手抓获。

地主很残酷地杀死了妹子，同时又把憨哥阉割了。

解放后，那地主被镇压，他则独自留在了这儿。

狮子滩建坝后，土地被淹，农民们都迁走了，但是憨哥坚决不走，因为这里埋着他的小妹子和刚刚成形的儿子。他独自在这儿修了个小房，陪守着那已经淹没在水下的他情人的尸骨。他利用湖边水落后荒露的土地种粮食，饥荒年居然不缺吃的。

憨哥的故事讲完了，草山女又一把抱住我，说她早就喜欢我，想嫁给我，但又觉得太遥远够不着，于是只想给我生个孩子，由她和憨哥抚养成人，就当是她和憨哥生的，同时她也能同憨哥结婚堂堂正正成为一家人。可是，没想到我那东西也不中用了。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全身酸软倒在床上，朦胧中，听到草山女说我这不是病，是营养不良、身体虚弱、蛋白质极度缺乏，再吃几天好的就行了……

我不知不觉又睡着了。

第二天一大早，草山女端来四个荷包蛋，要我吃下，快速补上蛋白质。这是我来的第三天了，憨哥也给我谈起这事。他说我已经知道他的事了，草山女晚上陪我是他们商量决定的，一定要我成全他们。我仍然不知该怎么说，虽然我被整到这种地步，但道德底线还在，我还是拒绝了。

到了第五天，我打算走了，草山女挽留我再呆一天。就在这天晚上，她跪在床前恳求我答应，她是那样伤心，那样悲痛，我那根底线终于断了。

在草山女的安排下，我们一起洗了个热水澡，紧抱着睡了一觉，然后就……但是很遗憾呀，任她怎样折腾，我仍如阉人。

草山女失声哭起来：“李大哥呀！他们怎么把你也整成这个样子呀……”

我想，吃了这么几天高蛋白，又这样折腾来折腾去还是竖不起来，一定是病、是病！难道我真的成了阳痿，假阉人？还是我这几天想的都是工作调动的事，对这事儿没有激情？

管他的，没干成不是坏事儿。

第六天我不能不走，草山女再三挽留，我还是走了。

没想到这一走，至今我们音信杳无。



六十年代的长寿湖（陈华摄）

三十一年后，一九九三年三月，市文化局在长寿湖狮子滩召开创作会议，我被邀请参加。我借这个机会去找三十一年前的憨哥和草山女。我往大湖深处去，可是越往前走

越找不着路了，当年的麦田、油菜花、胡豆夹似乎都不见了。

到黄昏时，不能再往前走，只好放弃。

我想，也许草山女已经儿孙满堂，也许憨哥已经作古不在人世。

我最大的遗憾，是当年没问他们的真实姓名，以至现在无法打听查找。不过，憨哥和草山女永远留存在我的记忆里。

六，在话剧舞台和批斗台上

宜宾旧时称叙府，金沙江与岷江在这里汇合，城市就建在两江汇合的冲击平地上，背靠一座不大的山，名曰翠屏山。翠屏山郁郁葱葱，如同一道屏幕障挡住西下的夕阳，是城市的休闲胜地。

我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十八年，其中却有十六年半艰难坎坷，非常坎坷。

我到了宜宾文工团后不久便登台演出。1963年，我演的第一个角色是扮演《红岩》中的成刚。接着演《霓虹灯下的哨兵》、《南海长城》、《青年一代》。最成功的是演《青年一代》的主角林育生，我把这个角色演活了，演红了，前前后后，下工矿，走农村，演了近200场。我在宜宾大红大紫，每到一地演出，观众就挤在门口等我签名，演出完了又涌到后台要见演员，我走到街上，大人小孩都追着叫“林育生！林育生！”

我很早就享受了被“追星。”

1964年，文工团创作了一个话剧《山村里的斗争》，反映阶级斗争，里面有两个重要角色，一个老贫农，一个生产队长。剧的内容是：队长被一个地主的女儿诱惑，丧失了阶级立场，后来在老贫农忆苦思甜的教育下，幡然觉悟，回到正确的革命路线上。

队长不好演，几副面孔，演得不好就僵化，展示不出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这个角色我又把他演活了。老贫农由一个老右派谢明德扮演，他也演得十分生动。

我们到成都演出，大获成功，我又上了四川日报，省委宣传部专门请我们吃饭，住的也是豪华宾馆。

上面不知道，这场“阶级斗争”戏是靠一个老右派和一个小右派唱主角。那一年多，是我人生中最辉煌的日子。

可惜，我这个人的好运气一向不长。

1964年11月，搞“四清”运动，谢明德和我一老一小两个右派被抓出来批斗，斗之后把我下放到泸州劳动，谢明德被抓进监狱关了四个半月。

泸州文化局局长一见我，惊讶地说：“咦，你这个名演员怎么来了”？

“没办法，是右派。”



李文书扮演《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陈喜

“摘帽没有”？

“摘了。”

“摘了就好办。”

局长关照我，让我参加演出。泸州老百姓一见我，就呼叫：“哟，李文书又来了。”

六、七十年代，宜宾、泸州一带，社会上埋藏了很多有才华的人，这些人都是因各种各样政治原因被整、下放下来。在泸州，我结识了一大批社会“闲散”人员，三教九流都有，尤其是一帮抬工——抬从岷江漂来的原木。这帮人大多数都是被整的人，其中有北京、上海一些大学的学生，有出身不好不准读大学的青年，一个个都很优秀，有思想，有才华。我同他们打得火热。

我越接触这个社会，越感叹。



李文书在《青年一代》中扮演林育生

在泸州干到1966年上半年，文工团重新给我和谢明德安排了工作——到一个硫磺厂——一个劳改犯的厂干活。

我同谢不干，提出辞职，文化局的书记很左，干脆把我俩放到农村去劳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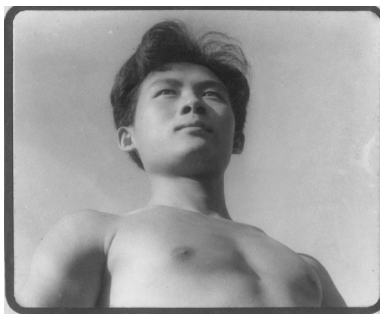
到农村不久，文革开始了，谢明德忧心忡忡地对我说：遭了，又来运动了，我们又遭整。

果然，我们俩很快被抓回去挨斗。

他们说谢明德是特务，我是企图投敌叛国。

他们要我交待：跑内蒙是企图叛逃苏联。我心中暗想，我那时还不晓得可以往苏联逃，更不晓得苏联变修了。否则，我肯定往那边逃。

我在批斗大会上交待我的逃难（“叛国”）经历，我是演员，讲的又是亲身经历，一番“交待”，把下面不少人感动得眼泪汪汪。主持会的书记也听入了神，突然，他显得不对劲，赶紧站起来，挥着手叫：“干啥？！干啥？！他这是在放毒！你们还哭？！”



“那一年多，是我人生中最辉煌的日子。”在宜宾留影

文革中两派打闹起来时，我感情倾向于造反派，那些当官的太坏，该打。造反派找我画几幅漫画讽刺当官的，我一激动，忘了自己的身份，拿起笔就画，这一画，又把我扯进了监狱。

抓我那天的批斗会，很富戏剧性，有人已经给我报信，说会场上要抓我。当时抓人的程序是：主持人突然高声点名：“把XX分子揪出来示众。”被点名者立马被两个打手左右倒扭胳膊，揪头发，弯腰，像喷气式飞机一样被推上台。我一进会场就发现不对劲，

左右两个人监视着我，那架式随时准备扭我胳膊。我暗想，我李文书也曾经是个“公众

人物”，绝不出这个丑。

我紧紧盯着主持人的嘴。他点名抓了一个人上去，我估计马上就要轮到我了，我突然站起来，跟着那个被抓的人大步走上台，高声说：“我是李文书，自己来了！”

下面一阵哄笑。

接下来捆绑游街。大街小巷的人都认识我，有的人喊，李文书，莫怕，硬起！（那时还没“雄起”的叫法）

我进监牢，坦然得很，当年收容所、派出所、看守所，进进出出，早已习惯，唯一不习惯的是牢房里人太多，晚上睡觉某一个人翻身，全体都得翻。

这次坐牢，时间不长，一个把月，反“二月逆流”，造反派得势，他们敲锣打鼓把我从监牢里接出来。



1962年宜宾文工团演出时

接下来我目睹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

宜宾、泸州是全国武斗最惨烈的地区之一，两派从钢钎、棍棒发展到坦克、大炮、高射机枪。宜宾5·13武斗，造反派围住保皇派一个据点，突围的人，冲出一个杀一个，据点外保皇派的战友急红了眼，组织敢死队冲锋，他们兵分几路冲出来，不分青红皂白，见人杀人，在军分区门前呼喊解放军制止武斗的两个北大学生，就被他们顺便打死。那一仗打下来死伤几百人，真真血流成河。

还有武装攻打泸州，造反派兵分三路，每一路都有一百多辆卡车，浩浩荡荡杀奔泸州。泸州之战打了三天三夜，造反派攻占了全城，保皇派被挤到城外高坝兵工厂。

我被造反派叫去拉手风琴，慰问造反派。我一进泸州，惊得目瞪口呆，好端端一座城市被打成一片废墟，到处是弹孔，到处是血痕。医院里伤员一声声惨叫，停尸房尸体堆积如山，我们去慰问演出，唱的歌全是“打打打、杀杀杀，誓死保卫毛主席。”

泸州的惨烈让我彻底清醒了。

我最初赞成造反派，觉得该造那些当官的反。武斗时，发现两派呼喊同一种口号厮杀。我亲眼看见一派把钢钎杀进另一派的肉体，呼喊“忠于毛主席，冲啊，杀啊”，另一派也喊同一口号。在泸州，攻、守双方势不两立，杀得血流成河，但口号完全一样，都是“誓死保卫毛主席！头可断，血可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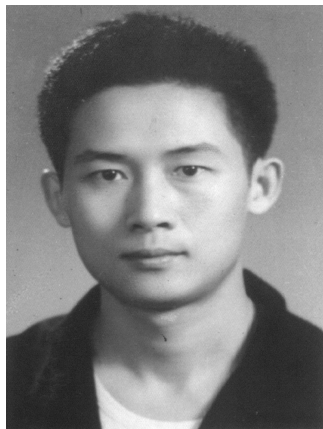
1964年在宜宾留影

我觉得不对劲，这场革命出了大问题，有人用貌似神圣的东西挑动老百姓互相仇杀。

保皇派的炮弹不断打来，我自己在“前线”慰问演出时也差点被机枪打中。我目睹战场上那一排排尸体，对这场革命已经非常反感。

1969年，江青有一个专整文艺界的讲话，要冲击文艺界的“三名三高”（即名人、高工资等）。我工资不高，30元，但说我是文艺黑线上的名人。

这次被抓出来斗是我挨得最惨的一次，又一次游街，跪在地上写检查，身体被整垮。我不承认反党，他们就打，拳打脚踢，其中一个重拳打在我脸上，给我留下了终身后遗症。我头当时就肿了，口腔里裂了一条口（缝了五针），这一重拳损伤了我的面部三叉神经，右脸从此抖动，右眼机械地不停地眨，我再也上不了舞台。记得1979年“改正”后，排演《于无声处》等反映伤痕文学的话剧，我有切身体会，很适合，非常想演，但已经无法上台。



李文书在文革时

（采访时，李文书的右脸和右眼不停地抖动，我最初以为是老人激动时的习惯动作。）

为啥下狠心打我？主要是说我翻案，不承认反党。

当时，我的确不承认。

现在我承认！

1979年宣布给我“改正”，我不签字。我说，当年我不反党，不反毛泽东思想，你们说我反党、反毛主席，打我右派。现在我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真正是右派，不用“改正”了。

所以，我不签字，至今都没有签。

七，那刻骨铭心的爱恋和婚姻

1969年，整个宜宾乱得一塌糊涂，只有派部队。于是，解放军13军进驻宜宾，对各个单位实行军管。

这一军管，导致了我人生路上又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我的婚姻，我的家庭毁在了“军管”上！

这得从五年前说起。

1963年，我戏演得红火，文工团里漂亮女孩多，喜欢我的漂亮女孩也多，其中最漂亮的一个叫张淑君，她是重庆姑娘，18岁，团里的舞蹈演员。

她爱上我，很多人心里不平衡，一朵鲜花，怎么找个右派？



李文书在《南海长城》中剧照

给她做工作的人多啊！有宣传部长，文化局书记，团里的领导，还有一些同事。

她坚定得很，非要同我好。1964年11月我挨斗，把她也弄来陪斗，说她划不清界线。从那时起，只要我挨批挨斗，必定把她弄到场，让她受教育，受刺激，想让她转变思想，转变立场，说穿了，转变感情。

张淑君年龄不大，意志很坚强，就像我们演那些革命剧里的女英雄，宁死不屈。

我下放泸州劳动一年半，她一心一意等我，还专

门来看我。这种等不容易呀，她漂亮，身边追求的人多，有的很有来头，条件比我好。我一回去，让她看到的就是我站在台上挨斗的狼狈。

1967年初，她不顾一切同我结了婚，我们的结合在宜宾几乎是家喻户晓，我俩都是舞台上的人物，如果不扯我右派这码事，真正的说得上郎才女貌，很多人羡慕，也有人嫉妒。为啥嫉妒？还是那个老话题：一个美人凭啥让一个右派娶走了。

不过宜宾好多人都佩服她，觉得她在那么大的压力下坚守，不容易。不过，在那个年代，她嫁给我，注定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结婚才20多天，按现在的说法，还在蜜月期，我就因为画漫画被抓进了监牢。她找到监狱，监狱答复她：“造反派可以放，他不能放。”原因是我是右派，是铁定的阶级敌人。

这事给她烙上的烙印很深。

结婚之后，我接二连三地被斗、打、抓、关、游街，她在动荡不安中生下大女儿李君。女儿生下来，只得送到重庆，托她父母喂养。

1969年底，我和“老右”谢明德等被下放到高县涪江劳动，半年之后，谢明德认罪好，放回去了。他们说我傲气，不服罪，继续劳动。到1971年初，传来消息，单位准备开除我公职，发回原籍。

正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宜宾军分区有个政委，叫徐怀旺（这个名字我也是刻骨铭心），军管之后，他分管宜宾文艺团体。这个人来后，很关心大家的生活，他看到宣传队（当时几个剧团合成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住宿条件和伙食状况后，直摇头，说，这怎么行，这是乞讨生活呀！他着手改善伙食，提高演出补助标准。多年来演员们听够了宣传部长、文化局长“要艰苦奋斗”之类的话，突然得到一点关心，大家高兴得很，感激得很。

这个人说话也很有水平。

我们团里有个五十年代就得过金奖的演员刘文元，他初中时在山西参加过阎锡山的“同志会”，解放后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徐政委来后，在大会上说：“我在山西呆过，了解那个同志会，不算什么，刘文元一个十多岁的初中娃娃，还不懂事，什么历史反革命？”

徐政委这些话，在那个“极左”年代，大得人心，大家觉得他懂政策，有水平。

一天，徐政委来看排演《红色娘子军》，当“大红枣儿甜又香”群舞刚起，他就被台上的张淑君吸引，忙问身边舞蹈队队长：“为什么不让她（张淑君）跳白毛女？”

队长答道：“她男人是右派。”

“右派可以离婚嘛。”徐政委说。

“她不干，结婚前好多领导都给她做过工作，还让她陪斗，没用。”

“哦……”徐政委哼了一声。



李文书结婚前

没人料到一个堂堂大政委会亲自找一个小演员作工作，动员她离婚！

一天，他来到宣传队住地，一头栽进女生集体宿舍，找到张淑君单独面对面说了一大串话，中心意思两个字：“离婚”。

这事碰巧被人在窗外听到，传出来，大家很惊讶，徐政委是很懂政策的人，怎么一下子“左”起来，要动员一个年轻女人同右派丈夫划清界线？而且还亲自出马？

我远在农村五七干校，毫不知情，张淑君写信没提这事，是创作《山村里的斗争》那个女才子冒了风险告诉我的。

一天，我正在写毛主席语录，一辆小汽车开来，钻出一个军人，他说：“你是谁呀？字写得不错呀。”

我说，我叫李文书。

不一会，有人来叫我开会，会场上，我才知道那个军人就是徐政委。

“谁是李文书，请站起来。”徐政委客客气气地说。

我不起来，我已经晓得他找张淑君的事。

大家着急，生怕对不起徐政委，政委亲临干校，让他们受宠若惊。

“起来，李文书！”

我不动。一个军代表走过来把我拉起来。

他操普通话，我也操普通话，盯着他朗朗地说：“我就是李文书，李文书就是我，什么事？！”

“你在宜宾很有点名气，我听说你有一个外号叫小天才。”

“那是吹的。”

“是呀，吹得太高，摔得越痛，不过你不要灰心，你那个事不算什么，1957年你才十几岁嘛，一个娃娃，而且你已经摘了帽，你在这儿好好干，今后还可以回去工作，重上舞台。”

话，说得很温和，也入理。

但是，我一直回不去，干校只剩五个人了，我还是回不去，不仅回不去，还传出话要开除我公职。我心里又冒出流浪时那种“发横”的情绪，我拒不劳动，每天出去画画，我不能演戏了，今后要有口饭吃，得有本领。

那一年多打下了我画画的基础，否则我不会有今天。

1971年底，又是在最寒冷的日子，我接到张淑君的信，她提出离婚！

1972年初，春节，我赶回宜宾。同她的那场对话我记忆犹新。

她说：“文书，斗你、打你、关你，我都没离开你，所有痛苦我都承受下来，事后想起，每次都怕，现在有两个娃儿，再来一次，我怕受不了。”

我说：“对右派这件事，我绝对不服，肯定整错了，今后一定会平反，我才30出头，熬得过，一定能看到那一天。”

“我压力大得很，娃娃一天天长大，团里又说要开除你。”

我安慰她说：“我会找到工作，能挣到钱，能养家。”

当时张淑君只有 20 多元工资。

她问：“你能不能保证不再被抓进去，不再挨斗挨打？”

我迟疑了一下说：“我不敢保证。”

她哭起来，哽咽咽地说：“我，我怕影响孩子，你看到了，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活得好累、好惨。读书、工作、婚姻，一辈子受影响。”

我一下子说不出话来。

我的两个女儿，长得非常漂亮，带上街，陌生人都要夸几句，熟识的人，一定要抱抱。

我叹一声：“是不是徐政委反复给你作工作？”

“他只作了那一次，后来没有再来。他说右派是一辈子的事，要为娃娃着想。徐政委这么好的干部都劝我离婚，他懂政策……”

我的心又横了。我问：“你想好没得？”

她说：“我想好了。”

“那好，我们离！”

写好离婚申请，我们俩签了字，找文工团领导批，不批，让去找军代表，军代表也不批。嘿，怪了！我说：“你们政委不是动员她离婚吗？不是要她同右派分子划清界线吗？”军代表说：“我不晓得。”

我心里明白是什么原因。我们婚姻是宜宾一段家喻户晓的佳话，大家谈起，对我们两个人都佩服，对张淑君的人格、气节更是敬佩，尤其是我挨斗时她陪斗，站在批斗台上，花容月貌，面不改色。

文工团领导和军代表不想惹别人说闲话。

我决定去找徐政委批，而且要公开找。

一天，宜宾所有文艺团体开大会，我埋伏在外面，看见徐政委进会场，我大步跟上去。我没资格参加那次会，大家见我进去，知道有好戏。

徐政委骤然见我，怔了一下，说：“你不是李文书吗？”

“是呀，我们在干校见过一面。我回来同张淑君办离婚，他们不签字，请你签。”

“我怎么能管你们的私事呢？”

我一听这话来了情绪：“你不管？你去作张淑君工作，叫她同我离婚，你去过没有？当着大家说。”

我完全是审问的口气，当时，没有哪个敢这样对徐政委说话。会场上鸦雀无声。

我接着说：“张淑君一向是很坚强的，挨斗陪斗，跟我风风雨雨，那么多领导都没说服她。你来了，你很能干，在座的人都说你好，张淑君也说你很好。我们上次见面，你说我这个小右派不算什么，说得入情入理。但是，你背地里一锄头挖下去，把张淑君的‘堤坝’挖垮了。你会挖，用孩子的终身前途去挖一个母亲的心，只一锄头，张淑君就崩溃了。我不晓得你是两面派，还是把我们当儿戏，我们小老百姓，离婚大事，不敢当儿戏……”

我在会场上用标准的普通话，滔滔不绝地诉说，像是我最后一次登台演出。

我豁出去了，面对一个可以置我于死地的军分区政委，毫无惧色。我厉声问：“你到底签不签？”

徐政委下不了台，但是他很沉着，他对军代表说：“你们去办这件事。”意思是叫他们签。

军代表把我劝出会场。

同张淑君离婚对我打击非常沉重，但是，我也不想挽回。张淑君跟着我，没过上几天好日子，从1964年起，她一直提心吊胆，我不是被下放，两地分离，就是挨斗，抓她陪斗，我是男人，经过磨难，不怕，她是女人、母亲……

去派出所办手续那天，下着迷迷濛濛的春雨，我们俩共同打一把大红油纸伞，难分难舍地走进了派出所。

派出所的人问：“你们俩来干啥？”我说：“办离婚。”民警笑起来：“开啥子玩笑，看你们两个亲亲热热的。”他也晓得我们这段婚姻。我们把手续给他看，他看到领导批的离婚原因是“感情破裂”。

他傻眼了。

办完手续我同她分手，离开了这个家。

（李文书停下来，眼含泪光。他背过去抓起一个桔子，抖抖索索地剥开。）

八，“舞台”悲剧的落幕

两个女儿都判给了张淑君，为的是不背右派父亲的名。女儿送到重庆，由她父母抚养。离婚后我独自回到五七农场。

1972年4月，团里把我调回城，没有开除我，据说是林彪事件之后，高压暂时松缓，我又逃脱一难。

我住在文工团单身宿舍，与张淑君同一个单位，我回邻水探亲，路过重庆就住在她父母家。这样别别扭扭过了一年多，张淑君想复婚了，我当即表示同意。

这个时候单位派她到成都观看舞蹈表演。在成都，她遇到当年舞蹈班一个姓蒋的同学，蒋听说她离了婚，拼命追她，并表示要离了婚娶她。

张淑君动摇了，她告诉了我，我没勉强她。

但是，蒋一直离不了婚，这一拖，就拖到了1976年。

一天，张淑君找到我，说，徐政委托人来说，想同她结婚。

这个徐政委，前两年死了老婆。文工团舞蹈队队长，也是张淑君舞校的同学，一心想嫁给他，她主动登堂入室，投怀送抱。徐政委也愿意接纳，她是党员，年轻，漂亮，又爱他。但是，她老公坚决不离婚，扬言要把她拖老。

两年之后，徐政委见没有希望，便找上了张淑君。

张淑君告诉我，徐政委亲自找她父母作工作，发动他们逼她就范。张淑君说，她妈



离婚后的李文书独自在农场作画
(1975年)

来信，要她明天回重庆办婚事嫁给徐政委，徐政委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就等她回去，如果她还不同意，就把两个女儿交给她自己抚养，妈不再管了。张淑君要我拿主意。

我很冷静地问她：“你怎么想的？”

“我不愿意！”她很肯定地回答。

“那好，”我也非常肯定地对她说，“你到重庆去把女儿接来，我们带，同时，我们把复婚的风声放出去，看他徐怀旺还敢不敢再逼婚。”

张淑君同意了，表现得很坚定，第二天她就乘火车去了重庆。

谁知这一去就没了消息。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

20多天，徐政委和张淑君双双回到宜宾——一个新郎，一个新娘！

我惊得目瞪口呆，整个宜宾街头也轰动了。

我结交的那帮抬工愤愤不平，他们提着杠子来找我，他们叫喊说：“你发句话，我们冲进军分区，打他个狗日的！”

我拦住他们，我说：“我和张淑君没复婚，他是合法的。”

徐政委同张淑君结婚时已经60多岁，张淑君还不到30岁，他们俩不敢一起上街，上街就有人喊：“六十几比二十几，老头子，占便宜。”

那段时间闹得我也不敢上街，人们见我就问：“怎么回事？”

我也不晓得是怎么回事，她回重庆的前夜我们谈得好好的，她又表现得那么坚定，怎么一下子就变了，我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我希望能同张淑君亲自谈谈，解开这个谜，并且至少要回一个女儿。

可我一直没见到张淑君，后来他们俩在宜宾呆不下去，被迫去了成都。

但是，在他们走之前，发生了一件事。

那是1976年底，我去金沙江劳动。那几天我心情特别不宁，烦躁不安，我临摹苏联画家的一幅风景画——一片灌木丛，灌木丛中一朵白花。我画得心烦意乱，画好之后我说，这幅画像一座坟墓。

地委书记来了，他找到文工团带队的，悄悄地说什么，其他人没听见，我听见了，那几个字，太敏感“……张淑君……她娃儿在重庆死了……”

我一听，转身就往公路上跑。我拦下一辆车，正好司机是熟人，他拉着我飞快往宜宾赶。

赶到宜宾，我才知道大女儿已经去世三天。

我没回文工团，跑到杂技团一个朋友家里，倒头睡了三天三夜！

老丈人赶到宜宾来，我们在铁路旁相遇，他一见到我，扑通一声跪下去，失声痛哭……

（李文书第二次讲不下去，泪水夺眶而出。他背过身去，喝水、服药。不愿意我看到他的眼泪。约十分钟后，他才继续讲述。）



饱经沧桑的李文书

我把他带到宿舍，他告诉了我张淑君的婚姻和女儿的死。

约两年前，徐政委向张淑君求婚被拒绝后，亲自到重庆找到她父母（他们是普通工人），直截了当地请求他们把淑君嫁给他。理由很简单，我是右派。他说，右派始终是右派，摘了帽也是摘帽右派，一辈子改不了。这两个娃娃这么漂亮、聪明，让家庭出身毁了她们的前途，可惜了。父母虽然离了婚，但仍然要受影响，今后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注定抬不起头，只有张淑君嫁给了他，把女儿带过去跟了他改名换姓，才有光明的前途。同时，淑君全家在政治上经济上会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开始，淑君父母认为政委年纪太大，没同意。后来徐政委不断来做工作，淑君的妈就有些动摇了。甚至，他还向淑君妈下跪，要她答应把女儿嫁给他，不答应就一直跪着不起来。最后徐政委出主意，用君儿和青儿（我的两个女儿）的名义写了那封信，逼淑君回来。我同张淑君要接走娃娃——要是接走就好了。老人接到信，急了。那天晚上，老丈人拖着两个娃娃到火车站接张淑君，他们几乎要给张淑君跪下，他们恳求张淑君说：“我们求你了，为了这两个娃娃……”淑君一下火车知道了这些事，心头一急就晕倒了。他们马上将她扶进政委等在外面的车，拉到婚姻登记处去登记结婚，淑君连家门都没进……

老人说到这里哽咽了，再说不下去。

那么，大女儿是怎么死的呢？

那天，她们四个小朋友在教室外的走廊上玩“修马路”的游戏（就是用单脚跳着将小石子踢进画在地上的大方格里）。这个走廊一面紧贴教室，一面是一米多高的坎，坎下堆放着乱石。走廊没有保险护栏，只有一根圆木连在房柱之间，很低。大女儿玩过了就坐在圆木上两个小孩的中间，看另一小孩“修马路”，谁知这个小孩脚没站稳，一下子扑向坐在圆木上的三个小孩，不偏不歪正好扑向大女儿。没有防范的大女儿向后一仰，摔倒在坎下，后脑砸在石头上，头骨粉碎性破裂。送医院急救，已经无力回天！

女儿去世时，她妈妈新婚才一个多月，她刚刚把名字从李君改为徐树君。

我一直觉得，女儿不改姓不会遭这个灾，不改姓不会遭这个灾。她同几个女同学坐在一起，刚巧撞在她身上。

我女儿是个小美人，左邻右舍都非常喜欢她，她从小跟外婆外公长大，她的死，给两位老人极大的刺激，丈母娘从此神经错乱，成天疯疯癫癫呼唤：“君儿你到哪里去了呀……”

张淑君其实很痛苦，女儿死后，她门都不出，班也不上了。



不幸遇难的大女儿（一周岁留影）

1984年，我到成都写剧本，朋友说，张淑君想见我。

我们在锦江宾馆见了面，她告诉我，小女儿考上大学就来见我，女儿一旦参加工作她就同徐怀旺离婚。

1986年，我见到了二女儿李青，她考上了四川外语学院。

1990年，女儿毕业参加了工作，就在当年，张淑君与徐怀旺离了婚。

她至今一个人，我已经同初恋的情人王铮铮结婚。张淑君比我还要不幸，精神上很苦。

采访时间：2002年1月12日 地点：重庆市歌剧院

采访后记

我在市歌剧团家属院底楼一间只有8、9平方米的小屋里找到李文书。

小屋里没有床，只有一张破旧的沙发，那是他睡觉的地方。沙发旁，支着一个大画架，下面杂乱地摆着一些颜料和画笔。唯一的一张小木桌上，张开一个装盒饭的白色饭盒，几个空啤酒瓶倒在门后。

——又一个白永康？！

不过，他有一个家，妻子就是他当年的初恋情人王铮铮——几十年风雨之后他们又走到一起。

但是，长寿湖的流放，十余省的流浪，五、七千校的独居，已培养了他忍受孤独、忍受贫困的耐力。

实际上，他已经变得喜欢这份孤独，喜欢这份孤独中的自由。为了这份自由，也为了他酷爱的绘画，他经常离开王铮铮，在这间“创作室”里一住就是月余。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但是，那些年，绘画只给我带来灾难，现在人都老了，它才给我带来好处。我觉得，人生最大的快乐就是能够自由自在、一心一意干他最喜欢干的事。我注定躲不开这场悲剧，因为我从小就有一种独立不羁、自由自在的性格，这个社会不容我这种性格。”

李文书从早上9点开始讲他的经历，一直讲到下午6点（包括吃中饭）。

他目光炯炯有神，思维记忆异常清晰，尤其是那深沉厚重的男中音，回肠荡气，牵引着我的心，在他几十年悲欢离合的波峰浪谷中回旋起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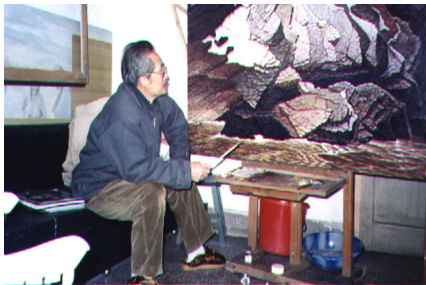
其间，他两次语音哽咽，泪光闪烁。

看得出，他是一个拒绝眼泪的硬汉子，然而，情到深处，身不由己。

他不愿让我看到他的悲痛，在两次泪水快涌出时，他倏地站起来，背过身去，喝水、默默伫立。



李文书油画《古老的歌》2001年



在小屋作画（2002年，谭松摄）

我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地等他。小屋里笼罩着一种庄严的寂静，悲愤的寂静。

从小屋里出来，夜幕正降临，快过春节了，解放碑华灯溢彩，喜气洋洋。

我站在街头，朝那个著名的但已被高楼挤压得惨不忍睹的碑望去。

那是八年抗战，无数同胞血肉之躯铸造的一座“精神堡垒。”那里面原来刻有罗斯福总统赠给重庆市民的一段珍贵赠言：

“我谨以美国人民的名义，向重庆市赠送这一书卷，以表达我们对英勇的重庆市男女老幼的赞美之情。

在空袭的恐怖中，甚至在这种恐怖尚未为全世界所知悉的日子里，重庆市及其人民一直表现出沉着和不可征服的气概。你们的这种表现，自豪地证明了恐怖手段决不能摧折决心为自由战斗的人民的意志。你们对自由事业的忠贞不渝，必将激起未来一代又一代人的勇气。”

1950年，《抗战胜利纪功碑》被改名为《人民解放纪念碑》，罗斯福总统那段珍贵的赠言也被铲去了。

“空袭恐怖”早已过去了，新的恐怖“尚未为全世界所知悉”，我有“决心为自由战斗的意志”吗？我每读一遍罗斯福总统60年前的赠言，我这个“未来一代”的重庆人，只感到深深的惭愧……

性格独立不羁，天性热爱自由的李文书，在这个被改了名的碑下注定找不到位置，注定只有去流放，只有去流浪。

……

突然，从那碑顶，势不可挡地传出《东方红》乐曲（它每小时播一次）。我一惊，向那已变得十分矮小的碑身投去一瞥，赶紧转身，背对着它，向冷风扑面的夜空走去……



《栅栏》 116×89cm 1994 96.12展于北京中国美术馆 李文书作



补记：

李文书于2015年清明前去世，终年79岁。他去世前将自己一生的经历写成了长达十六万字的书（他取名《黑皮书》），并请我为该书修改、配图和编排。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仔细阅读和修改，又一次被他惊心动魄的经历深深打动。修改完后，他要我为他的书写一篇文字，下面就是我为此写下的：

一个强烈的冲动

十年前，2002年1月，在市歌剧团一间破旧狭窄的小屋里，我第一次见到李文书，那一天，他向我讲述了他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

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六点，他富有磁性的浑厚的男中音，牵引着我的心，在他悲欢离合九死一生的波峰浪谷中起伏翻腾。其间，他两度哽咽失语，泪流满面。一是讲到他被

迫离婚时，二是讲到他女儿不幸遇难时。他是个硬汉子，不愿我看到他的眼泪，他转过身，默默伫立。

我也默默无语，任何安慰的语言都苍白无力。小屋里笼罩着悲绝的沉寂。

当晚在回家的路上，我疲惫万分，身心仿佛不堪重负。第二天，在写他的经历时，我数次停笔，心胸隐隐作痛。

我作为旁听者尚且如此，当事人这些年又是何等感受？

可是，没想到近十年后，他以一种比较超脱的心态和语气，一点一滴写下了他完整的人生，其内容，从当初我记录的约二万字扩充到十六万字。

我整整读了一天，又是从早到晚。

虽然我对他人生的主要经历已经十分熟悉，但《黑皮书》仍然如十年前一样，回肠荡气，牵引着我的心，在他悲欢离合的波峰浪谷中起伏翻腾。

半年后，受他嘱托，为《黑皮书》作修改和编排。这一次，逐字逐句细细读、改，又细细品尝那一幕幕让我心灵不堪其苦的沉重。

在看似“超脱”的文字背后，我看到那个年代癫狂的社会舞台和生活戏剧，也看到了一个“演员”悲凉的命运抗争和情爱吟唱。改完，我产生一个强烈的冲动：如果我是一个导演，如果我有创作自由，我一定要将《黑皮书》搬上银幕和舞台，让千千万万的人、让识字和不识字的人、让说中文和说外文的人，看到这片东方土地上的一段千古绝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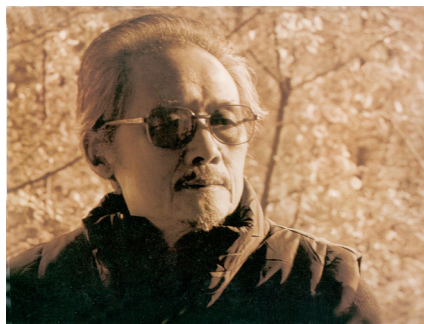
可惜，我不是导演。更不幸的是，眼下仍然看不到李文书六十年前就渴慕的言论和创作自由。

庆幸的是，李文书用他在独特年代的血色人生，为我们留下了一个独特而弥足珍贵的剧本——《黑皮书》，他在他的黄昏暮年，忍着挖掘旧伤的痛楚，一点一滴完成了他的“舞台”使命。

由此，我不禁产生一种渴望，一种呼喊的渴望——

——我们民族的后来者们、那已出生和未出生的同胞们，当那一天自由的阳光终于照耀着这片浸润着无数父兄前辈鲜血的土地时，你们能够翻开这本血肉文本，用你们的才华、良知和奉献，让世人听到、看到一个已逝去的、黑色舞台上的血红演出。

如此，让李文书和李文书式的悲剧，永远不要再在神州大地上上演。



“我一生的命运，就像我画的这幅油画”——李文书（2002年）

其他逃亡者简况

1、莫德仲——1962年下放长寿湖劳动的学生。文革初期，莫感到自己会被整，恐惧中逃往国外。在中缅边境时，莫德仲被抓获并被押送回长寿湖批斗，然后被逮捕入狱（判刑多少年不清楚）。莫刑满后留在劳改农场，并与当地一位农家妇女结了婚，生有一子。

莫在长寿湖劳动时，一位名叫兰春蓉的姑娘（也是下放劳动的学生）爱上了他，但不久兰就去了美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兰从美国回来（她已加入美国籍，并已结婚），她千辛万苦找到莫德仲，表示愿意离婚嫁给莫。经过协商，莫与妻子离了婚，带上儿子，同兰一块去了美国。

2、高明辉——长寿湖另一个逃亡者。详见本书第十四章。

（大约6年前，高明辉回重庆参加长寿湖幸存右派一年一度的聚会，在会上，高当着众难友的面诉说自己的遭遇，失声痛哭。

2002年6月，幸存右派们重返长寿湖聚会，邀请了高，高未能来，但他给主办者李宁熙写了一封信，言辞十分感人。李将信转交给了我，我把信带回了重庆。十多天后，我被抓获，高明辉的那封信，落入了重庆市国家安全局之手。）

一名被无辜打死的右派

1967年，在重庆南岸区涂山人民公社新兴大队莲花山生产队劳动改造的右派石洪志（原重庆南桐矿区干部）挑粪途径重庆11中学，学校的一群红卫兵拦下他喝问：“你是哪一派的？”（意指重庆“8.15”派或“反到底”派。）不知所措的石洪志慌乱中回答：“我是右派。”红卫兵听说他是右派，当场将他打死，然后将尸体扔进了11中校园的水塘。

十、国家干部

他们，曾是无限忠于共产党的好干部：

- 1、李普杰 2、高志长 3、黎民苏 4、曹贞干
5、姚 谷 6、陈忠笃 7、赵子生 8、杨光瑜
9、陈初蓉 10、詹一之 11、刘 康 12、罗报群



长寿湖右派主要劳改地——同心岛（谭松摄）

牛比右派宝贵

李普杰

1957年重庆市团委学校工作部副部长



解放前我为什么参加革命，因为对国家民族的利益看得很重，对呼喊民主自由的共产党很有好感，认为共产党救国救民，代表中国的未来。我加入了地下党领导的“六一社”（共青团），并担任清华中学支部的负责人。

解放后，我进入重庆市团委，负责中学共青团的工作，那个时候我肯干得很。

1956年，团市委召开第三届代表大会，响应胡耀邦书记“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会上有一位团干部说，向科学进军团干部应当带头，但是干部们工作太忙，星期天都在干。因此，希望团市委领导考虑给一定时间让团干部学知识、学技术。

这个发言引起下面强烈反响，不少代表纷纷要求发言。这本是一个非常普通非常正常的事，但团市委领导认为乱了规矩，坚决不准代表发言。我们几个中干支持代表的正当要求。组织部副部长曹贞干说：“根据团的章程，团代表有权在会上发言。”我也表示支持。就这么一件小事，我们几个中干被认为不同领导站在一边，也就是反领导。不过，当时是1956年，还有点民主空气。“不同领导站在一边”还没上升到“反党”的高度。但领导已经暗暗记在心了。

1957年来了，领导翻出1956年的旧事，上纲定性为“反党事件”，把我们几个中干一个个打成右派。

这是1957年10月。

在这之前，我一直在积极参加反右运动，在各中学参与将一些教师划成右派，并且在批斗会上批判别人。那时的年轻人相当听话，共产党说某人是坏人，便认定他是坏人，毫不怀疑。

现在轮到说我是坏人了。

斗我，我想不通，觉得自己仅仅是看法与领导不同，哪是反党？连续斗，天天斗，同事、领导、朋友都说我有错、有罪。我渐渐觉得我真的错了，因为我认为党肯定是不不会错的。

在宣布开除我党籍的会上，我真心诚意认了错，我伤心得很，流了泪，一边检讨自己的罪行，一边表示一定好好改造，争取重新入党。

“重新入党”刚一出口，轰地一声惹翻了天，会上立马吼起来：“好哇，你一个右派分子还想入党？！说明你根本没有认罪服法！”还有的说：“对顽固不化的右派分子李普杰必须加重处罚！”

我是真的渴望回到党的怀抱，结果让我罪加一等——政治上判为监督劳动；经济上

降为最低线，18元生活费。

1958年3月，我半夜起来，扛着行李步行到朝天门上船前往长寿湖，团市委派了人押送我们。

到长寿湖后，我马上感到了“加重处罚”的分量和在右派中的“等级。”由于我是监督劳动，被派去做最苦最脏的活。我身体瘦弱，才100斤，但非要我挑200斤的泥巴。下雪的冬天，强迫我赤脚去将冻硬了的板泥踩成泥浆。几天下来，我双脚又痒又痛，鲜血长流，折磨得我通夜通夜睡不着。农民看见后问为啥不用牛，有人回答：“牛比右派宝贵。”

最折磨人的还不是劳动，是精神压力。我是真心拥护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党在我心中神圣得很哪，哪里动过一丝反对它的念头？把我同国民党、地主、反革命、坏分子等划为一堆，我想不通，苦恼得很。

还有，我不忍心妻子受我株连，她是个孤儿，只我一个亲人。我当右派后，她不愿同我离婚，被赶出团市委，下放到巴县一个乡镇。

1959年底，她给我做了件棉背心寄给我，组织上发现后马上批判她，说她丧失立场，强迫她离婚。她顶不住了，只好离。离婚时她表示，只要我一摘帽，马上就同我复婚。

委屈、劳动、尤其是对妻子的负罪感，差点把我压垮！长寿湖最初那两年是我一生中最为艰难的两年！

为了改变命运、为了家，我拼命劳动。我们中一位叫康中清的右派（原市团校教研室主任）就是离婚后拼命劳动，1959年底累死的。那时不少右派对家庭都有一种负罪感，心头沉甸甸的。重庆四女中的教师右派李春阳，摘帽后留渔场，每月有一斤肉，他从来舍不得吃，把肉细细熬成油，一年积一大瓶送回家。他每次熬肉那眼神柔和得很，我印象很深。



李普杰与夫人王惠 1955年合影

在长寿湖，白天是劳动，晚上就是开会。所谓开会就是揭发、批斗。今天你又说了什么话，是什么意思。比如，我们挑粪时，政法学院右派练冰吾说，这个粪坑的名称过去叫茅尸，就是农民叫它茅尸，现在又叫厕所，还有人叫它东池。开会时就有人揭发：这个练冰吾，用厕所的名称“茅尸”、“厕所”、“东池”来侮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毛泽东）。

这下就不得了，就上纲上线，是个反革命言论。练冰吾还差点为这事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抓走。

有一个当了组长的右派，老是揭发其他右派说了什么，开会时批斗整人。大家心中气闷，你整我们，我们也要考虑整你，于是也留心他说了什么，有一个次在坡上劳动时，他说：“噢，这两天怎么《红旗》（一本党办杂志）没有来呀？”其他右派抓住了他的这句话，也给他上上纲上线，

说：“孙X很反动，说这几天没有看到红旗了，说红旗倒了。”实际上他是说《红旗》

杂志没有来，这就要拿来批斗他一天。开会斗他，他不承认，不承认第二天晚上又来斗。

我思想发生变化是因为大跃进、人民公社。我亲眼目睹一个好端端的农村被政策彻底整垮！上面鼓励说假话、谎话、瞎指挥、强迫蛮干。红苕没人挖，秧没人插，强迫农民去炼钢。紧接着饿死大量的人。我震惊了！当初冤枉我、批斗我、划右派等等都没有动摇我对党的信心，但是大跃进、饿死人让我清醒过来，我产生了怀疑，对社会主义产生了动摇。我开始觉得，这个党、这个国家肯定出了问题，而且是大问题。我对党的幻想、迷信，一下子坍塌了。

——这个我学生时代追求的党其实并不值得我爱。

认识到这点，嘿，我一下子轻松了！不可思议！我心理上、精神上的沉重负担一下子消除。

1962年，我摘了帽，但转眼又变成“摘帽右派李普杰”，仍然在长寿湖劳动，唯一的变化是妻子在我“摘帽”后同我复了婚。

虽然我对又变成“摘帽右派”极其不满，但我不再像最初几年那样痛不欲生。我一直到1979年才回重庆，整整在长寿湖“改造”21年。

当年我很气很恨整我的人，后来我认识到这是整个体制出了错、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出了错。整我的人后来也被整。1957年不是我遭殃就会是另一个人遭殃，不是这次被整就会是下一次被整，这个体制、这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党本身是一部整人机器。“反右”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

采访时间：2001年4月11日 地点：重庆市渝中区

采访后记

李普杰应算我正式采访的第一个人。他目光善良柔和，心境也比较宁静。往日的苦难从他嘴里缓缓流出来，把我深深地感染。由于我刚刚开始采访，经验不足，没有录音机，也担心不停地笔录引起他的不安，因此漏掉了好些内容。

采访中，李普杰多次提到对妻子的负疚，几个月后，我见到了他妻子王惠——在对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幸存者的采访中相遇。我细细听了她的故事，下面是她讲叙的主要部分：

我是梁平县人，家中的独女，10岁那年父亲病逝，剩下我和母亲。1942年6月17日（旧历五月初四）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那天县城赶场，妈妈进城进货，中午时分，日本飞机突然飞到县城上空。我只跑了100多米，炸弹就落下来。我慌忙蹲到一垛土墙后面，两颗炸弹在我身后60多米的方爆炸，我吓得要死，但没有受伤。日机飞走后，我听人们在叫：“首大嫂遭了！首大嫂遭了！”我浑身一震，大哭起来：“妈妈！妈妈！”人们把我拉住，不要我去看，说惨得很。

妈妈是在进货回来的路上遇难的。当时她正经过县立小学，日机来得快，她跑到一棵树下躲藏。炸弹扔下来，弹片从她肚子和腿上划过，两条腿切断了，肠子吊在树上。

转眼之间，我失去了唯一的亲人。乡下的舅舅赶来掩埋了妈妈，把我带到乡下，那时我才12岁，刚刚小学毕业。

失去妈妈后的那些日子，我一直不敢去回想。多年来，我只要一看到电视上的战争场面和战争造成的孤儿，心中就特别难受，眼泪忍不住就要出来。

难怪李普杰心灵上如此沉重。

2001年8月，重庆连晴高温，我奔波于山城大街小巷，采访60年前重庆大轰炸的幸存者、受害者。100多位耄耋老人，泪流满面，悲愤凄怆，在我面前展示出尸体加尸体的恐怖、鲜血复鲜血的惨烈……

中华民族八年铁血苦难；数千万无辜生命灰飞烟灭！

然而，尘埃落定之后，升起一轮血红毒辣的太阳！

70多名长寿湖老人，声音哽咽，悲愤苍凉，在我面前展示出另一种腥红。

镇反、反右、饥荒、文革……

四十年代家破人亡，五十年代人亡家破、六十年代倾家荡产，七十年代荡产倾家，是我采访的一些老人的人生脚印。

——是否，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百年沧桑？

王惠先为被日机炸死的母亲啼哭，后为被打为右派的丈夫啼哭，泪水一淌数十年，一生的大半，也就去了。

2002年6月12日，在重返飞龙岛的路上，李普杰指着一个湖湾说：“有一个叫乔明鑫的右派（19）60年死在那儿，他吃了大量的马桑果中毒，我划船送他到狮子滩，划到那儿的时候，他睁开眼问我：‘我的伙食退没得？’我说退了。他又说：‘你要把我的粮票捡好。’说完他就断气了。”

李普杰十分伤心，泪水涌出来。

（谭松摄）



十三岁的“集团军司令”

高志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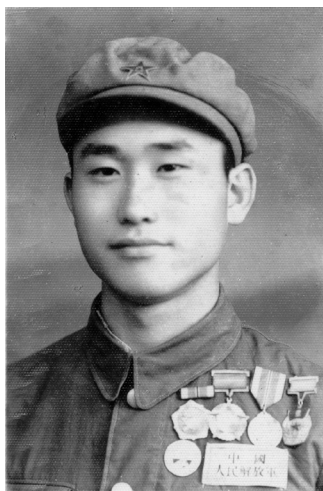
1957年重庆市团校干部



我1936年生于河北保定，6岁那年随父亲（他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到重庆。父亲任中美合作所内务组组长。你想象中美合作所的军官一个个穷凶极恶，贪污腐化？不！我父亲是个很正直的军人，他管的物资堆积如山，绝不准我们动一个指头。我小时特别喜欢骑自行车，仓库里有的是，我提出借一辆来骑骑，他劈头给我一顿臭骂。1948年， he被抓到白公馆关了大半年。为啥？有人假公济私搞物资，父亲看不惯，公开大骂。有一次甚至掏出手枪要动武，对方官比他大，后台也硬，父亲只有蹲班房。他是共产党快打到重庆时才释放的。

1949年5月，我在小龙坎中正中学读初一。一天正在上课，父亲到教室来找我，他很客气地对老师说，他有点急事，很抱歉。

我跟他走到外面路上，看见一长排军车。父亲说，他马上去兰州，军情紧急，安顿好之后就来接我们。他掏给我四个银元，抱了抱我，匆匆跳上吉普车，朝成都方向驶去。我记得车队扬起满天尘土，大得很，转眼就看不见父亲了。那时，我13岁。



高志长立功受奖 1953年

那一别，就是同父亲的永别，他后来去了台湾，我当了右派，天各一方，父亲去世也没见面。

1949年底，我在磁器口求精中学读初二。一天早上，起床一看，哇，学校坝子睡满了军人！晚上居然没有听见一点动静，这么冷的天气，睡坝子，这个军队纪律太好了！晚上，他们同我们搞联欢，表演节目，一个个和蔼可亲。我当场被他们吸引了，我要参军，要跟他们走！

学校里与我想一样的同学不少。我是北方人，虽然只有13岁，但个子高大，可以冒充高中生。同学劝我改年龄，还有，出身也得改。于是，我把年龄改为17岁，出身改为自耕农。

我顺顺当当加入了解放军，一直坚持到1954年。为什么叫“坚持”？因为一起参军的同学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集训时就跑了一大半。我上了朝鲜前线，在战场上立过功。

解放后一个接一个运动，几乎全是整人。1955年的肃反是抓反革命、特务、胡风分子。也许是根据我的出身（我在部队上坦白了我的出身），他们一口咬定我是国民党潜伏特务。

1955年我已经转业到重庆，搞退伍军人安置工作。那天，区里领导干部都来了，黑压压一屋子人，气势凶得很。他们脑瓜子里已经把我判定为特务。1949年才17岁，小了点，不太够潜伏特务的标准。因此，他们断定我隐瞒了年龄——天哪，这是真的！他们噼噼啪啪拍桌子，要我老实交待。我心头发慌，解放后我一切都交待了，只剩年龄，这一直是我的心病。当着那么多人一声声追问，我稳不起，只得承认。我承认时很羞愧，满脸通红。我说：“对不起组织，我的确撒了谎，1949年我实际年龄13岁。”

话音刚落，满堂大笑，有人挖苦：“老滑头！不老实，你该说1949年你刚刚出生，是婴儿！”

我已经说了实话，不再心慌，但他们不罢休，一连逼供我20多天，我拖不起了，这个时候我终于发觉，他们不需要事实，只需要战果，不承认怕是活不出来。在又一次审讯时，我大吼一声：“我是特务！”

四下马上安静下来。

接下来，审讯就容易了，我对他们有求必应，他们要什么我就是什么。

“你终于缴械了，承认是特务？”

“是的。”

“你的任务是什么？”

“任务？”我一时没转过弯。

“是不是想组织反共军队？”

“是。”

“你要组织多少队伍？”

“一个师，哦，不，一个军。”我往大处说。

“一个军就够了吗？”

“不，不够，”我看了一下那张脸，发现还没达到要求。“两个，唔，三个军。”

“那就是集团军了。你要组织几个？”

“前期我先组织一个，以后再壮大。”

“这么说你就是集团军司令了。”

“是的。”

“副司令是谁？”

“副司令？”我一时想不起，看他们又要骂，我急中生智说：“是我哥哥，不过我还没通知他。”

“你这支部队名字叫什么？”

“名字？”我脑子里临时冒出几个字，“忠义救国军。”

“只有一个名字？”

“哦，还有一个。”

“是啥？快说！”

“绿林军。”

“……”

……

审讯到后来，双方都有一种做游戏的感觉，我分明看见审讯人员有人忍不住想笑。

审完后，我被关押起来，派了一个军官出身的人来监管我，这可不是做游戏！

我认为共产党有一个很坏的作法，就是先认定你是一个坏人，如特务、反革命，然后再来搜集材料，甚至编造材料（罪证）。总之，一步步诱使你往里钻，逼你往里钻。

区里高兴得很哟，又破一个大案，有成绩。不过，没高兴多久。他们四方八面调查，找老师、找学校，很容易就查清了，我1949年的确只有13岁。13岁的初中生担不起那种重任，这个道理他们懂。

他们把我放出来，公开给我平了反。但是，我伤心了，我天天上班的地方就是斗我关我的地方，平日朝夕相处的同事就是斗我的人，我坚决要求调动。

一年后，1957年初，我调到市团校。

在团校干了几个月，遇上大鸣大放。校领导号召大家给党提意见。我们这个会场常常冷场，没人吭声。校领导很着急，说帮党整风是团员的职责，争取进步的表现。他一再动员，我觉得不说点什么实在过意不去，还有，我想表现，争取积极、进步，这是私心，所以我也该遭。但是，我刚到团校，情况不了解，没意见可提，我只好把肃反的事拿出来。我说：“肃反是绝对必要的，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个别地方没有实事求是，冤枉了好人，搞得一团糟。”

这一家伙，我“进步”没捞到，捞到一顶右派帽子，罪状是：攻击党的肃反运动，说肃反运动搞得一团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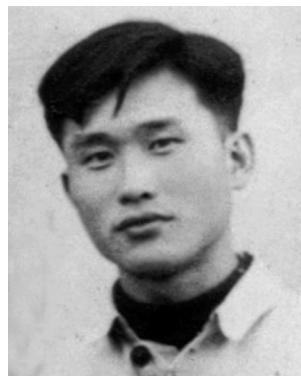
1955年我认识了“先定性、后求证”的逼供，1957年我又认识了断章取义、罗列罪名的行径。反正都是要把你整成敌人。

在团市委召开的批斗会上，一个叫曹贞干的右派不服，竭力想为自己辩解，他刚一开口，下面就是一阵怒吼、叫骂。我一看那阵式，太熟悉！我高志长两年前就锻炼过了，晓得该怎么办。点到我名字时，我大步走上台，中气十足地说：“我，高志长，右派，有罪。”

这一招大出他们意外，整个大会场顿时没有了声音。

我说这话时心里很坦然，并不觉得承认是右派有什么丢人，右派当时还是个新鲜词，我心想右派就右派，无非观点偏右了嘛，有什么不得了？！

那年我21岁，年轻。



高志长在团校时



当右派前高志长与夫人

1958年我到了长寿湖。刚到那时，我还没学会“如何当右派”，还不知道什么叫要像狗一样“夹着尾巴做人”。我觉得自己不应该消沉，也不应该表现出消沉。头应当像正常人一样的抬起来，不能低三下四。

不过，“第一课就让我明白，一旦当了右派，就再没有人的尊严。”

那天，我们在狮子滩集中，有各个地方来的人，大家相互都不认识。主持会的人说：



当右派后没人再理我，我去找石狮子，我想它不会嫌弃我

更加恭顺一点。那晓得这样做了一段时间，又批判我，又说我做出一付苦脸相，一天不说一句话，其实心里面鬼得很。

更利害的是你做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无济于事。比如，夏天你在坡上劳动，说：“唉呀今天这个太阳好热呀，把人都烤焦了。”这个话有什么呢？可是，你会因此被批斗，“你实际上不是说的天热，而是说的我们社会主义把人都烤焦了。假如你要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打他的态度，他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一套又来了，根本不容许你申辩。所以，随便你怎样夹着尾巴，你不经意的一些话都要遭。

我觉得给我印象最深的，最感觉得苦海无边的，就是一个接一个不断线、不断气的人整人，就是右派整右派，整得人哪，成天惊惶惶的。

还有，被斗、被整当然痛苦，可是，斗别人也不是个轻松事，因为你要违背良心说话，这对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也是一个很苦恼很痛苦的事。

1958年我到长寿湖，进了捕鱼队。捕鱼队是肥缺，劳动相对轻松，又可以偷鱼吃。我们团市委好几个人在捕鱼队。大家抱成一团，从不互相揭发，互相内讧。“以右治右”的招数毒得很，在农场整得鸡飞狗跳，人心惶惶，但在我们那个小团体里完全失灵。我们几个人中，宣传部的“反党分子”谭显殷点子最多。这个老兄解放前搞过地下斗争，脑瓜子灵，斗争策略多。还有，他有理论，认识清醒，放得开手脚。他怂恿我们偷鱼吃，偷能偷的公家的东西吃。他说，吃自己的劳动成果，怕啥？我们本来就是挨冤枉，还要守节？他也放得下面子，有一次我们一群右派被派到重庆九龙坡区修鱼池，想抽烟，买不到，你不晓得，那个年代，越苦闷越想抽烟。谭显殷跑电影院门口捡烟屁股，人来来往往，他钻来钻去，像鸡啄米。我说，咱们大小是个知识分子，前国家干部，不大好。他抬起头，



高志长在长寿湖渔船上

瞪了我一眼说：“把我们整到这个地步，是他们的耻辱，我们有啥丢脸的，捡！”

于是，我们一群右派跟着他“鸡啄米”，捡了起来。

有一次偷鱼，也是在九龙坡修鱼池的时候。谭显殷精心策划，一一分工，曹贞干（团市委前组织部副部长）手最巧，负责撒网捕捞，我负责运输，他本人负责放哨。所谓“运输”是要把鱼藏在衣袋里，走过一条街，放回屋里。我本来以为轻松，哪晓得鱼在衣袋里死劲蹦，街上人多，我做贼心虚，脚发抖，虚汗直流，斗我特务我都没这么怕。我慌慌张张回头一看，谭显殷悠哉游哉坐在坡上放哨！我想，亏了！曹贞干累点没风险，谭显殷又轻松又没风险。我要被抓住肯定是一顿好打。

不过，怕归怕，还得偷，饥荒年没法。我们还偷过麦子，方法也是谭显殷教的——藏在裤腿里。有一次正在吃饭，我裤子破了一条缝，麦子从里面流出来，我蹲不下去，裤子里装满了麦子，只得用手压，我饭碗都吓得差点落在地上，幸好没被发现。

不管怎么说，我们几个人抱成一团，又偷又吃，饥荒年没吃亏。其他右派没饿死的也偏偏倒倒，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们捕鱼队这一群，精精神神硬硬朗朗。当时被叫做长寿湖的“仗仗队”。

采访时间：2001年4月14日 地点：重庆市李家沱

采访后记

高志长是一个精力旺盛、活泼幽默的“年轻”老人。

他的家“淹没”在李家沱迷宫般房楼巷道中。电话中他说：“你肯定找不到，你在车站等，我出来接。”约20分钟后，一个人急急匆匆直奔我而来，他步履稳健有力，行动风风火火，像个小伙子。我正困惑他是不是高志长，他中气十足地朝我说：“你是小谭？长得像你老爸。”

高志长记忆特好，表情又生动，在他那间窄小的客厅里，他又侃又“演”——不时跳起来，用几副面孔，几种声音，几套动作扮演不同的角色，展示当年审讯、批斗他的精彩场景。

他的表演，引得我哈哈大笑，笑声中，我脑子里冒出一个书名：“敌人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如果把这几十年全国各地的“高志长”们汇编出来，一定十分精彩。

从高志长家出来，已经是晚上10点钟（他整整侃了8个小时），他说，他的故事还多，下次我去，再讲长寿湖的故事，三天三夜都讲不完。

2002年6月12日，在从狮子滩到飞龙岛的船上，高志长又侃又演，一路都是回忆。他指着一片地说，那是他大跃进开荒的地方。他说：“派我去开荒，我在湖边开一块地，那地是沙土，很好挖，我猛干一天，开了一亩多，晚上报产量，我有些得意，哪晓得我少得很，有人3亩，有人4亩，最多的开了6亩多。我受批评。第二天，我在坡上把一块荒地开出一个圈，中间胡乱挖几锄，做个样子。晚上报上去，今天开荒6亩5。咦，哪晓得又落后了，有人已经开荒12亩！管教人员批评我，说我人高马大不卖力。第三天

我选了一大片坡地，估计有 10 亩，我把 4 个角挖 4 个点，中间再挖几个点，报上去今天开荒 13 亩，有人来看了一下，说起码有 18 亩，于是当天报 18 亩，于是我当天受表扬。”

沿途不时遇上当年长寿湖难友遇难或自杀的地方，李普杰触景生情热泪盈眶，高志长说：“据说大象很灵，也很重情，大象只要发现了同类的尸骨，都要停下来，围着尸骨转，用鼻子触地，十分悲伤。长寿湖不同，同类死了，你要朝死者吐口水，骂他（她），恨他（她），甚至踢他（她）两脚，这样你会受到赞扬，说你立场鲜明，有觉悟，热爱党。”



高志长边讲边表演

我不想入党， 又说了一句俏皮话

黎民苏

1957年重庆市团市委干部
(少年宫负责人) 1932年生



我出生在长江小三峡中那个著名的古镇——大昌镇，1950年考入重庆大学，在学校担任了学生会的学习部长。我很喜欢读书学习，在中学时代有幸遇到了抗战内迁的教师，那些教师（有些是教授）一个个非常优秀，人品、学品都是一流的，我受益不小。我原本可以往学术的路上走下去，但是，1951年团市委书记曾德林发现了我，非要把我调到团市委，不走要受处分。原因嘛，是他看到了我发表的文章，又听到我的演说，觉得我是个人才。

我离开了重庆大学，到团市委一直干到1957年当右派。

我这个人喜欢搞点幽默，说点俏皮话。叫我积极申请入党，我说，我不入，我还年轻，大一点再说。他们问：“好大？”我说：“我学苏联画家格拉西莫夫，69岁加入共产党。”

这一家伙把他们惹翻了，说我是仇恨共产党。这成了我当右派的一大罪名。

那时，我对共产党完全说不上仇恨。但是，我心里有些怕它，这说来话就长了。1949年之前，我不了解它，只读到毛泽东的《论新民主主义》，毛泽东说我们要建设一个和平、民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毛先生慷慨激昂，让我热血沸腾，我认定毛泽东、共产党好得很。1950年考入重庆大学后，迎头撞上的就是——杀人！那天拖了30多个人来重大，一个个五花大绑，说他们是反革命。有的很年轻，才20来岁。其中，我认识的只有重大的教务长候风。那是我第一次目睹杀人，而且杀这么多，枪“砰、砰、砰”地响，人一排一排地倒下去。我平生第一次感到恐惧。不久，朝天门又要杀100多个人，还登了报，他们去看，我不去，不想看那个场面。那时候，大规模的镇压国民党的军、警、宪（兵）、特（务）、政，到处杀人。“政”就是国民党的政府人员，杀到乡长、保长，全国要杀光。我的亲哥哥黎定镐就被杀了。他初中回乡当了小学教师，由于当地找不出有文化的人，就把他拉出来当了个乡长。他既没有打人，更没杀过人，只因为当过乡长，就被枪杀，他死时才30来岁。

还有，那些斗争会也很恐怖，我看见沙坪坝区斗地主，抓出来一阵乱棒劈头盖脸地打，我看见这样野蛮地对待一个人，心里很不好受，同时也感到恐惧。解放后共产党说国民党杀人如麻，我在国民党时代，无论是在乡下我家乡，还是在奉节、万县读书，没看见杀一个人，也没看见那种乱棍齐下的斗争会。一进入“新社会”、“新中国”就耳闻目睹了一次又一次的血腥，这才是杀人如麻。

我不想入党，又说了一句俏皮话，于是，就让我当了右派。

你问我既然感到害怕，为什么还爱说俏皮话？问题出在我自以为历史清白，共产党要整我没得理由。哪晓得没得理由创造理由也要整。团市委一共整了几十个人下长寿湖，整得团市委几乎全军覆灭。我一看，可怕！所以我到长寿湖后不再说俏皮话，作老实状，一心一意劳动，同时钻研劳动技术，什么都学，织网、打鱼、种果树、木工、瓦工。很快，我就成了行家里手。

我们团市委一帮子右派很团结，从不你拱我、我拱你，而是互相帮助、互相支持。饥荒年高志长的老婆带着儿子来长寿湖，高志长一贫如洗，愁眉苦脸不晓得哪个办好。曹贞干二话不说，把手表取下来，拿去换了30多斤大米招待高志长妻儿，那个年代，很不容易呀。

1959年，大饥荒迅速蔓延开来，1959年底1960年初的那个冬天最难过，饥荒来得猛，右派们猝不及防，阵脚大乱，一些右派倒下就没再起来。我们变得像野人，抓到啥吃啥，比如吃老鼠。那时看见老鼠跑来跑去已经没有往日的厌恶感，眼睛里那是一团肉，一心想把它吞下去。顾大铭很有办法，他在一个布口袋里洒一点粮食，袋口系一根绳子，然后守株待鼠。老鼠钻进去，他一提绳子，布口袋便悬在半空。饿急了右派一拥而上，用火钳夹，老鼠吱吱乱蹦，越急越夹不住。又是顾大铭，他推开众人，提起口袋，往墙上抡，三五两下，老鼠不动了，于是掏出来剥皮剖肚，放在盅盅里炒。其中吃得最带劲的有女右派崔京生。

那年冬天，救了我和其他几个右派命的不是吃老鼠，而是抓团鱼。

有一天，副场长罗广斌找到我，说中央首长薄一波、李富春要来重庆开会，上面指示长寿湖为他们准备团鱼。罗广斌晓得我是个多面手，所以把这个艰巨的“政治任务”交给我。

团鱼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稀有鱼种，不好抓，尤其是在冬天，我也不晓得如何下手。我听说有个姓戴的农民是抓乌龟的好手，人称“戴乌龟。”我把他找来，他说，这好办，下药！这个“药”就是把巴豆、辣椒、和半夏磨成粉撒在小河沟中（冬天团鱼大都伏在小河沟里不动），团鱼受不了刺激，会浮出水面。但药不能下得太多，否则团鱼会丧命。

于是，专门成立了一个“特种捕捞组”，我当组长，成员有“戴乌龟”父子、右派李南力、李淦、孙静轩。当时孙静轩最苦，饿得接不上气，他听说我们要去捉鱼，哭兮兮地说：“把我带走嘛，我要饿死了。”孙是个诗人，激情、浪漫，长寿湖那个环境残酷，容不得浪漫诗人，两下就把他打趴了。他曾经托我给他买过一包饼干（因为我同供销社的人混得熟，可以买到一斤粮称四斤的粗粮饼干），哪晓得另一个“分子”张志荣也饿得要死，晚上把饼干偷吃了。孙静轩同他大干一场。

（廖亦武在他的《诗人孙静轩灵魂如虎》一文中有如下一段描写：

孙静轩当右派下放的时候，曾经因为私藏的乾面饼被人偷窃而斗狠。据他回忆，两个饿疯了家伙互相扭着在地下打滚，气喘如牛，他朝死里勒对方的脖子，却手颤心跳；对方也以同样的手法回敬，两人都翻了几下白眼，泪水和口水逆流。最后，两人都勒不动了，就侧卧在地相持半天，数一二三，一起放手。

“你为了什麼？”那厮发问。

“两块饼子。”孙静轩答。不觉心酸，于是两个文人抱头痛哭。）

孙静轩进了我们捕捞组，算他起死回生。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药团鱼，也要殃及其它鱼，下药后一条河沟的鱼虾赶尽杀绝。团鱼我们绝不敢动，但可以吃点死鱼虾，这就救命喽。

我们挑个担子，从汪家庙、人和、包家、护河、石堰、葛兰，一路“药”下去，也一路死鱼死虾吃下去。我们一直干了几个月，捉了几十个团鱼（专门有吉普车送走）。至于薄一波、李富春两个大员是否吃到这些团鱼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说他们要来开会，要吃团鱼这件事客观上救了我们几个右派的命。

我们沿着湖的河沟转转，一路也看到听到许多稀奇古怪而又令人心酸的事。比如，垫江县高洞搞“五大集体”：集体居住、集体伙食、集体劳动、集体牲畜（还有一个“集体”忘了），乡村分为营、连、排编制，起床、吃饭、出工等等全部用哨子吹。最“精彩”的是把男人和女人搞成两个集体分开住，那些结了婚的农民才惨了。高洞的打鱼子张启贤曾对我说：“我的老婆我碰不到，白长个鸡巴有啥子用？！”

（毛泽东、共产党的这种“精彩”发明在中国土地上只小试了一下，未广泛和长久的推行。但是，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从毛共手里得此真传，在柬埔寨青出于蓝地发扬光大。终于整出了一段血泪斑斑的千古奇史。）

还有，当时农村大搞什么“五统一”（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等等）、“三一运动”（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农民说，要我们同党一条心可以，搞社会主义一股劲也行，但是要把庄稼种得一个样（当时主要是密植）就害死人了。

中国的农村有史以来哪受过这种折腾？不饿死人才怪！

采访时间：2001年至2003先后十余次 地点：重庆市大坪

采访后记

黎民苏是伴随了我整个采访的长寿湖右派，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是这部采访录的共谋者。

我漫长的采访以他为开始，也以他为结束，几年里，我先先后后登他家门十多次，他为我提供右派的情况，联络的名单、电话，并还说服一些不愿接受采访的右派。由于他太投入，有关部门也盯上了他，据说他的电话也受到监控。

我从看守所出来后，第一个就去找他，我没打电话，突然叩门。他听见我的声音（黎民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双目失明），一怔，第一句话是“有没有人跟踪你？”第二句话是：“采访文稿被抄光了？”

我凑到他耳边悄声说：“我抢救了一份。”

黎民苏面部骤然一阵痉挛：激动？欣喜？感伤？庆幸？他双手抱拳，连连作揖，失明的眼睛里依稀泪光闪烁。

那一刻，泪水也涌上我的双眼。

在长寿湖右派中，黎民苏属于敢言敢怒而又颇有见解的右派之一。每每说起那些死

去的难友，黎民苏心情沉重，热泪盈眶；每每论及独裁暴君和专制极权，他则讥讽笑骂，刀刀见血。

他的一生是极其不幸的，漫长的21年右派生涯不说了，刚“改正”几年，突又遭遇双目失明。这个打击，对一个正又编又写干得火热，一心想弥补岁月损失的知识分子而言，是非常惨重的。但他又一次挺过来，活得比大多数长寿湖右派还要乐观、坚强。

他每天清晨四点起床，收听来自“自由世界”的声音；一听说有什么好书、禁书，一定要设法弄到手，请人读给他听。风声、雨声、读书声；国事、家事、天下事，黎民苏足不出户，然而心事浩然驰骋万里。

有位党员干部问起他失明的双眼，他嘻嘻一笑：“放心放心，我一定活到看见贵党垮台。”

我同他谈到国安局关注他的言行，他又嘻嘻一笑：“没事没事，抓我进去也无所谓，反正一党专政的天空下一样黑暗。”



长寿湖高峰队旧址

书到用时方恨少

曹贞干

1957年重庆市团委组织部副部长

1930年生



我当右派有好多条罪名。

1954年我到中央团校短训班（一年半）学习。1955年肃反时，每一个学习小组都要找一个人出来斗。找谁？从档案上去查，当时学员的档案带到团校，看谁有疤点。

我们这个小组抓出来的学员是杨非，他是自贡市团委书记，上海人，解放那年随西南服务团进川。人们在档案上发现，杨非抗战期间与几个同学从上海到苏北寻找新四军，途中迷了路，又返回上海。就这么一点事，把杨非抓来斗，说他有问题。

大家彼此都是同学，一斗起来就变了样，人人都要表现积极、进步、革命，一个个冲着杨非吼：“站起来！老实交待，到解放区是什么目的？！”

我觉得那根本不是个问题。不能因为必须要弄个人来斗就把不是问题的问题整成问题。我对那种一凶二恶的吼叫十分反感。斗杨时我声音很小。我的表现被记入档案，两年后反右，成了我的第一个罪名：在肃反中右倾。

顺便说个事，那次肃反，团校另一个班上死了一个人，自杀。他在宿舍的窗子上上吊。把他放下来时，身上还是热的，有人说，还有救。马上就有人吼：“救什么救？！反革命分子，不管他！”

当时人很多，我没挤上去，没看见他的脸。

第二个罪名是“反苏”。我在闲聊时说了一句话：乌苏里江以东，大兴安岭以北的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是中国的。组织部长刘XX说我造谣，破坏中苏团结。亲自给我定了“反苏”的罪名。

第三个罪名是：“攻击党的人事干部制度”。我说过，端“铁饭碗”之后大家工作积极性不高，应当实行合同制，双向选择。其实这也不是我的先见发明。刘少奇在参观了南斯拉夫实行合同制后，认为有道理。我也觉得有道理。刘XX批判我：你这是攻击党的人事干部制度。什么双向选择？实行双向选择将天下大乱！我这辈子，对整过我的所有人都是可以原谅，但对刘XX不可以原谅。他不仅仅是个“左”的问题，而是品质太恶劣。他整过很多人，但他没有对任何被他整的人道歉，而且，如果再有运动来他还要整人。

第四个罪名是“支持‘裙带关系’之说”。在开团代会上，黄石生代表团市委团支部向团市委领导提意见，其中就提到搞“裙带关系”。领导不准发言。我只说了一句：“按照团章，团员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在团代会上，副书记XXX到会场来观察表情，看谁支持“发言。”他看到我笑嘻嘻的——我这个模样天生一副笑嘻嘻——于是把

我划成另类，马上派人搜集我的材料。我到团校讲课，前面讲，后面就有人搜集我的话，想从中找出问题整人。在常委会上余XX批判我：“你看那个曹贞干，笑嘻嘻的，一副两面三刀的样子。余XX是南下来的工农干部，他对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看不顺眼。1957年被整成右派的团市委干部，个个都是文化人出身。（注：余XX在反右时很积极，划了不少右派。但在随后而来的大饥荒中，他冒着政治风险，同他人一道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四川饿死人的情况，他因此也挨整，受了不少苦。）

斗我时，强迫我把我的私人日记交出来，他们把日记中的内容印发出来发给大家供批判，任何人只要提出一条，你就必须承认这是你的罪行，绝不容许辩解，否则就是一阵喊打喊杀。这种恶劣作法我在中央团校作为旁观者已经体验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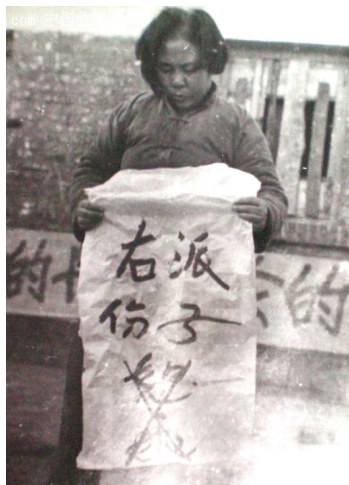
我下长寿湖，带了一大堆马列主义的书。我并没认为共产党有错，而是认为下面像刘XX、余XX这样的人太左，品质有问题。我打算认真改造。

刚到长寿湖，管教人员就当众呼叫：“曹贞干，站起来！”“谭显殷，站起来！”“高志长，站起来！”接着宣布这三个人是坏人，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我们三个立在那儿，失魂落魄，觉得奇耻大辱。（据高志长介绍，当时管教人员喝令他们三人从分成两排的人群中走过，勒令他们抬起头来让众人看清他们的“坏人”模样。）当然，这是暂时的，我们团市委这帮人，个个都有头有脑，懂政策，见过世面，在随后的改造中，我们抱成一团，互相探讨，互相支持，少吃了些苦头。

孙重这个管教干部是个整人不遗余力的人，他在“分子”中划分等级，用监狱里犯人打犯人，犯人管犯人的方式收拾这群右派，鼓励互相揭发，挑动相互斗，使右派们的劳改日子雪上加霜。

教师之间相互揭发的现象比较严重，他们对国家、对政策的整体认识不足，又急于解脱自己，所以，他们比我们活得更累。

在长寿湖，我那一堆马列主义的书也派上了用场。湖中岛荒纸少，大便之后急需用纸，一张接一张，还不够。一次便后，我长叹一声：“书到用时方恨少。”



人格侮辱（网络图片）

采访时间：2001年4月19日 地点：重庆市江北区

采访后记

曹贞干属于不情愿接受采访的“长寿湖分子”之一，电话上婉拒了两次。

我早听人说，曹先生是个心灵手巧之人。在长寿湖，任何把式他一上手就成为专家。撒网，撒得又圆又准；捕鱼，任何时候任何水域产量最高（曾派人向他取经，他嘻嘻一笑，秘而不宣）；晚年退休后学画画，转眼功夫，作品已经可以悬挂在朋友的客厅里而不失大雅……

他在他跃层楼的书房里“笑嘻嘻”地接见了我。

这是一套 150 多平米的典雅跃层，窗明几净，雕花扶栏，外面是湖波荡漾，垂柳拂地的花卉公园。坐在这疗养胜地般的环境里采访，不怕他倾吐沉甸甸的苦难。

可惜，待他叙说完当右派的过程，讲叙大致也就完了。长寿湖 16 年的月缺月圆，人生路上一长段悲欢离合，他淡淡一笔描过。

我知道他不愿翻动那早已尘封的不愉快的“旧书。”

他十分热情地留我吃中饭。

饭厅洁净，一尘不染。女佣摆开大碗小碟，荤荤素素，菜虽不多，做得十分精美，色彩尤其好看，红绿黄白，相衬相映，赏心悦目。

四月春风，拂动窗帘，飘飘逸逸，送来点点桃红，幽幽暗香。

我倏地想起四个月前我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和新西兰罗托鲁阿所体验的那种生存环境。

那种环境远离忧伤，那种环境拒绝苦难，那种环境读不懂“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三个代表。”

在那从未遭受过战争，也从未经历过“运动”的田园牧歌环境中，人们从心底发出“笑嘻嘻。”

曹先生以他的心灵手巧，营造了一个小环境。这个小环境似乎也远离忧伤，拒绝苦难。

“长寿湖”，已经是很遥远的过去了。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体验苦难，寻觅烦恼。

追求“田园牧歌”的生存环境，不是金发碧眼们的专利。

曹先生从不幸中走出来，晚年有了这么一个“小环境”，不愿多说，也自然。



长寿湖（谭松摄）

指标正好没用完

姚谷

1957年重庆市委办公厅干部



我是上海人，上海解放时刚21岁，那个年龄遇上一个崭新的社会，心里那个激动哇，没法形容，浑身充满献身精神，很神圣。我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支援大西南的西南服务团，同几千名与我一样的知识青年一道，向偏远的西南进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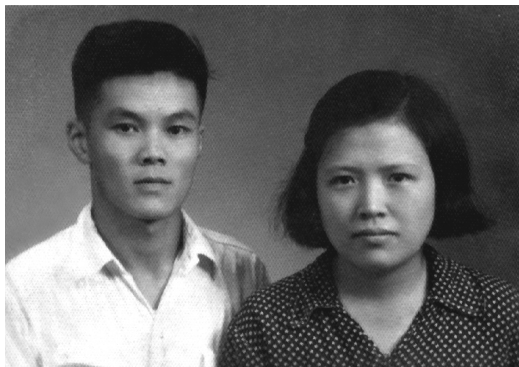
我们1949年10月出发，步行几千里，穿过湖北湖南，整整走了两个多月，年底才抵达重庆。一路上满目都是贫穷和荒凉，多年的战争动乱，老百姓很苦，好多地方的山民没有衣服，用棕树皮蔽体。我看到这些，暗暗下决心，要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祖国和人民。我认为，我们毕竟有了一个光明的新中国，我恰恰遇到了她。

不过，我也记得，一路上景色十分灰暗，入川后更是愁云惨雾，看来那也是一种预示。到重庆后，我分到团市委，负责在南开、树人等中学发展积极分子，组建团组织。一年后，我到西南革命大学学习。班上有一个非常活泼开朗的姑娘，叫李光仪，特别喜欢笑，同学们说她是“人身未到，笑声先闻。”她的性格和健美的体态深深吸引了我，我爱上了她。

从西南革大毕业后，我分到市委办公厅，不久，同李光仪结了婚。儿子出生之后，李光仪还想读书，她考入北京邮电学院学习，我独自带儿子住在重庆。

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我一如既往响应党的号召，全身心投入。我奔赴各个学校，审看报来的材料，参与划定右派。虽然我觉得材料上的一些“罪行”很牵强，但没有多想，骨子里觉得共产党不会错，毛主席不会错。

市委办公厅分得有右派指标，指标到1958年2月还没完成。我对这事很不理解，我说，市委办公厅年轻人多，而且都是经过选拔的优秀分子，哪来那么多坏人。这句话惹火烧身，指标正好没用完，就在我身上！



姚谷与妻子李光仪1956年合影

定了右派，才去找材料。有人回忆我以前闲聊时说过“学苏联不能盲目照搬，应当结合自己的国情，”这句话汇报上去，领导派人把它加工、提高、上纲上线，最后给我捏成一项“反苏”的罪行。

接下来是批斗，批斗时不准申辩，一申辩就喊口号，“死路一条”、“不老实”、“毒蛇”等等。好在当时还不打人，打人是文革时期。

这时我妻子刚刚毕业，分到成都邮电局。我实在不想告诉她，但三岁的儿子没人带，我不能把他带去长寿湖，只得写信叫妻子回来。

光仪高高兴兴从成都回来，一进门就笑，朗朗的。见她那个高兴劲快乐劲，逗儿子那么沉醉，我开不了口。

三天的探亲假转眼就完了，第二天一早她要走。晚上，我等儿子睡熟后，鼓起勇气说：“光仪，告诉你一件事。”

“啥事？”她眼睛还是笑眯眯的。

“我当了右派，马上要去长寿湖。”

她愣了一下，突然失声痛哭。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她的哭声。

第二天，光仪，当时她 28 岁，带上儿子登上开往成都的火车，我送到车站，儿子从车窗里探出头，活蹦乱跳地向我招手，光仪泪流满面说不出话。我心里痛苦极了，觉得对不起他们。

几天之后，我收拾起一点简单行李，上船去长寿湖。重庆这个家算是破了，这是 1958 年 3 月。

到长寿湖后，我很老实。记得临走前领导给我的最后赠言是：“下去后要夹着尾巴做人。”所以我不多说话，明知是错的也不吭声。例如，种胡豆和麦子，为了达到上面定的天文数，将成袋的种子倾倒在挖出的沟里，我晓得这是乱整，不敢说一句真话。

“大跃进”造成灾难性的大饥荒，我这个人最怕蛇，讨厌蛇，但是在饿急了的日子里，我学会了吃蛇！

1960 年，我们一群右派被派到重庆九龙坡区修鱼池，那是靠近曾经是我家的地方，一下子唤起了我对妻子儿子的狂热思念，那种思念很折磨人呐。一个星期天，我请假到市中区给儿子买玩具，为了省钱（我每月只有 20 元工资），我步行几十里，路上连一个糠饼都舍不得买，只吃了一些萝卜缨。我在商店买了一个小玩具汽车，在里面放了几颗糖，寄给成都的儿子，尽一点父爱。

1961 年初，他们母子生活拖不走了，政治上压力又大。妻子单位的一位老领导，不断压她与我离婚，还表示对她很有“意思。”妻子走投无路，又不敢得罪老领导，不得不下决心离开成都。

我得到这个消息，从狮子滩步行 60 里去县城接他们母子俩。当我赶到长寿，他们已迫不及待搭车去了长寿湖。我转身就回赶，连夜又走 60 里，要见到他们那种心情，无法形容。

第二天早上，我在长寿湖边见到妻儿，悲喜交集，真的悲喜交集！

我们在一间四处漏雨的茅草工棚里安了个家，每遇下雨，只能重点保护儿子，其他



长寿湖右派劳动

（图片来自光碟《长寿湖我们怀念你》）

右派给我们的茅棚取了个雅号叫“天波府。”妻子当了工具保管员，成天收拾锄头渔网，从此不敢再做工程师的梦。

她慢慢变了，不笑，成天沉默寡言。到1964年“四清”运动时，她萌生了死意。

那时，我又遭批斗，批斗不需要任何理由，只因为我是“摘帽右派分子”就行了。“四清”干部叱喝我：“姚谷，你给我听着！右派这顶帽子是抓在人民手里，随时可以给你戴上。”她也受到批斗，罪行是她两个姐姐在国外（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加拿大）。他们因此怀疑她是特务。当然还有一个永远都成立的罪名——“右派分子老婆。”

她越来越沉默，成天不说一句话。她把自己关在屋里不见人，连我也不见。一天，她躲在屋里坚决不准我进去，我觉得不妙，破门而入，看见她正捧着一大瓶农药。我一掌打掉药瓶，抱着她痛哭起来。

.....

1979年，我获得“改正”，回到市委办公厅。第二年，妻子儿子也回到重庆，1958年在重庆破碎的家，21年后得以重建。这时我们都年过半百，心灵上满是伤痕，妻子的活泼开朗早被改造成沉默寡言。

最不幸的是，1999年，我的独生子被人杀死！他跟我在农场吃尽苦头、突然一下没了！他的离去，给他母亲致命打击，她身体迅速垮了。几个月后，她一头栽下去，脸浸在浴池水中，再也没有起来。

她出事那天，我钓鱼去了，家里没有人，否则还可以救她。我为什么还要去钓鱼？长寿湖还没有够？！

短短几个月，我失去了两个亲人。有人见我孤苦，劝我找个老伴，我无法接受。光仪为我受了半辈子苦，从没埋怨过。她能与我共患难，在最苦的日子，也没想到要离开我。我对她充满了感激，充满了爱。

1958年，我是家破人未亡，现在相反。人老了，爱回想过去，有时想起当年从上海向重庆进发时的那种豪情，心头一阵一阵的揪心，感觉很复杂。

那个时候眼前好明亮！我庆幸自己正青春年华就遇到中国历史上的崭新时代。心中有团火在燃烧，崇高得很，再苦再累也不怕。共产党、毛主席代表真理、代表光明和未来。我毫不怀疑祖国要走向自由和富强，我当时充满了神圣的献身精神，真的很美。

1957，一切都改变了。

采访时间：2001年4月25日 地点：四川外语学院

采访后记

我在四川外语学院成教院的办公室里找到姚谷，我很惊奇，70多岁的老人了，还坐在办公室里“打工”。

他带我走进他山坡上的家。这是一套整洁宽敞的三室一厅，窗外，绿树成荫，阳光灿烂。

姚谷老人满面皱纹，声音细弱，眉宇间透出深深的无奈和哀伤，空荡荡的厅内只有

他孤独的身影和衰老的容颜。

他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房子，守着生命的黄昏暮色。

我于是明白他为什么这般年龄还要去“打工”。

采访中，从头到尾姚谷脸上没有出现过一丝笑容，结尾他提到当年的理想时，声音异常沉重，目光透出绝望，我觉得喘不过气，提议到阳台上去给他照张像。

姚谷木讷地站在阳台上。从镜头望出去，外面正是阳光明媚的春天，柔和温暖的春风从歌乐山上吹来，拂起他鬓角丝丝白发……

歌乐山的春风，年年依旧，生命里的笑声，不再回返。

补记：

姚谷先生于2004年3月中旬在重庆歌乐山下去世，他患了骨癌，去世前非常痛苦。

我得到消息时，正捧读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章女士写道：

“我拿起笔，是为继续生存寻找一个借口，拯救即将枯萎的心。我不怕死，那些纷纷离我而去的人，是那么地美丽。我愿意到天国和他们团聚……”

1=E $\frac{2}{4}$ **长寿湖呀好地方** 金子 莫城山作词曲
中速
3 2 3 | 1 2 | 6 6 1 7 6 | 5 - | 1 5 | 6 5 3 | 2 6 | 1 3 | 2 - |
长寿湖呀好地方，青山绿水好风光。
田间湖畔稻谷香。
3 3 2 3 | 5 5 | 6 1 5 3 | 6 6 0 | 2 3 1 6 | 6 5 3 2 3 | 5 - |
岛上桃李堤边柳呵水里鱼儿逐波浪。
珍贵鱼种蒲湖荡呵粮食瓜果堆满仓。
1 1 1 5 | 6 1 6 5 3 3 | 2 2 3 | 6 1 5 | 6 1 3 2 | 1 - :||
人人都说西湖美呀这里比西湖更漂亮。
人人都说江南好呀这里更比江南强。
(付歌) 稍快 混声二部
1 - | 1 1 1 1 | 2 1 7 6 | 5 5 3 5 | 6 - | 5 5 3 5 |
6 - | 3 3 3 6 6 | 5 6 5 4 | 3 2 1 2 | 3 - | 3 3 3 2 |
呵，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亲手创造，我们正在
6 1 7 | 6 5 6 1 | 5 - | 3 2 3 | 6 1 | 6 6 5 3 3 | 2 - |
1 6 5 | 3 2 1 3 | 2 - | 3 2 3 | 6 1 | 3 3 2 1 3 | 2 - |
劳动中锻炼成长，长寿湖呀我们的鱼场。
5 6 5 | 3 5 | 6 6 1 3 2 | 1 - |
3 2 3 | 1 6 < 5 | 3 3 2 1 2 | 3 - |
长寿湖呀我们的家乡，
6 6 1 5 3 5 6 | 1 - |
3 3 2 1 6 | 1 - |

歌颂长寿湖的歌曲

还有两个右派名额

陈忠笃

1957年重庆市团市委宣传部宣传科副科长



1956年我是共产党的红人，1957年帮共产党整人，1958年成了共产党的敌人，三年一步一个脚印，走向长寿湖，劳动改造20年。

其实，我遭噩运主要是到1958年单位还有两个右派指标没完成。

我是1951年直接从市一中调到团市委的，当时我还是高三学生，正要毕业考大学，一纸调令改变了我整个人生。进入团市委，我工作很积极，1956年我已经是宣传科副科长，入党也快了。57年我表现当然积极，反右、批判，我事事听党的话。（19）57年底，团市委已经打出了十来个右派、反党分子，但还缺两个名额。领导不由分说地将其中一个名额分配给我。随后再给我分配了一条“罪状”——“利用个别领导的作风问题伙同不满分子向党进攻。”这条罪状当然很无聊，也很无耻。这是我以前给一个早已调走的中干提的一点意见，把我打成右派后扯出来变成向党进攻。我当然不承认。

组织部长刘XX来处理我，他强迫我承认，说不承认加重处罚。我已经看见前面的例子了，晓得不是开玩笑。我只好承认。

我正在争取入党，一心想入党，已经要入党，我进什么攻？

1958年3月我到长寿湖，这年我23岁。在长寿湖我很老实，不多说也不多想。饿得要断气也不敢偷东西吃。好在我后来进了伙食团，一干多年，比其他右派少受许多苦。

1979年我回到团市委，我是当年那批右派中唯一回到原单位的。回来后没给我安排职务，建场初期劳动（图片来自画册《长寿湖》做点打杂的活。虽然平了反，但人们还是对我另眼相看，总觉得我有问题，是一个“改正右派。”我又递上入党申请书，想了20多年前的心愿。嗨，居然不批。我闷闷不乐干了几年，仍然受歧视。1986年我只好走人。

我调到市建材局，又递上入党申请，这次，咦，出乎我的意料，很快就批准了。算来我争取入党整整三十一年，1956年我还是个年轻小伙子，1987年入党时我已经快退休了。



采访时间：2001年5月23日 地点：重庆市江北区

采访后记

陈忠笃一看就是那种“忠笃”之人。言谈笑貌给人很真很实之感。他将我安排在卧室电脑旁——他正在密切关注股市行情。

“我买的XXXX明天要除权了，我得盯着点。”陈忠笃一边接受采访，一边说。

他轻描淡写地说了点往事，其间还有五、六次暂停——屏幕上，多空双方正在激烈厮杀。

“陈先生，您从五十年代起就一直申请入党，您对共产党怎么看？”我问。

“五十年代我一心热爱共产党，拥护共产党。八十年代我觉得共产党虽然有错误，但还是伟大的。”

“现在呢？”

“现在？现在不好说，有些政策不好，待遇不公平，不好说。”陈眼睛又转向屏幕——那上面红红绿绿曲曲折折，起起伏伏升升降降，变化莫测。



1957年反右漫画

敢仗义执言？劳改 20 年！

赵子生

1957 年重庆煤矿学校总务主任，基建科长



赵子生属于根红苗壮立场坚定的革命左派。首先他出身于贫农家庭，其次，他解放前就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共青团，第三，解放后他一心跟党走，思想左倾激进。他原本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沾不上边。

我在民治中学读初中时，教师中地下党员不少，教我们语文、历史、数学的都是中共党员。他们上课常常抛开课本，给我们讲鲁迅、讲民主、讲自由，还对现实社会进行批判。这些教育唤起了我对光明的追求，对真理的热爱，也使我对社会丑恶深恶痛绝。日本人打到贵州独山时，我们语文教师在课堂上慷慨激昂地说：“一旦日本人进入重庆，我就带领你们上山打游击。”这些教师的言传身教给了我很深的影响，所以，我进入四川省高级商业学校后，马上义无反顾地加入了新青社（共青团），我翻印马恩列的文章，传播新华社的文章，一直干到重庆解放。解放后，我很受重用，年纪轻轻就被派去审查国民党金融界的上层人士，并担任组长。后来专门干审查别人历史的工作。我从土改、肃反一直红红火火干到 1957 年，每次运动对我的鉴定都是：立场坚定，斗争性强，工作积极。说来不怕你笑，当时我最恨反革命，最恨特务，巴不得把他们全部清除干净。记得有一次我把一批材料送给陈孟汀，要他签字批准抓人。陈孟汀不同意，我同他大吵了一场。后来在长寿湖我与他不期而遇，陈先是一愣，接着微微一笑说：你这个左派怎么也到这地方来了？

1957 年我调到重庆市煤矿学校，担任总务主任、基建科长，同时，进入校肃反（后为反右）五人小组。

我去组织教师、职工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改进工作。我认为倾听群众意见是必要的，也是党所倡导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绝对正确。我是真心实意发动群众大鸣大放，也是真心实意倾听群众意见，我认为很多意见提得非常好。

我认认真真将意见收集起来，指望以左 XX 书记为首的校领导认真研究，认真对待，从而改进工作。左书记倒是认真对待了，只是不是为了改进工作。

在五人小组中，我是唯一“不和谐”的声音，对某些左书记一心要整的人，更是坚决不同意。其中最典型的便是为校图书馆馆长戴披星和他的“扣门事件”申辩。

左书记的夫人是图书馆阅览室的一名职工，1956 年的一个傍晚下班后，她还没离开阅览室，突然一股风刮来，“砰”地一声将门关得严严实实，她在里面怎么也打不开。

左书记左等右等不见老婆回来，找到阅览室，发现老婆被关在里面，左书记当场大怒，事后他专门召开一次会议批评戴披星，并要他作检查。戴馆长很委屈。鸣放时戴披星提了一条意见，认为左书记在“扣门事件”中错怪了他（应该怪那股风）。左书记懒得同他讲是非，把戴划成右派，开除党籍。我反对这样做，我了解戴馆长的为人和“扣门事件”的来龙去脉。

在一次批斗戴披星等人的职工大会上，我忍不住站起来作了一次完全不同于左书记等人的发言，我首先肯定教职员工的意见绝大部分是正确的，态度是好的，是为了学校的工作，改进工作作风。正垂头丧气挨斗的戴披星闻言，当众感动得哭起来，教职工一时议论纷纷，整个会场风向大变，组织者不得不草草收场。我为此得罪了左书记等人，他们说支持戴的反党小集团。

五人小组开会不再通知我，他们四个人把我排挤在外。接着就有人搜集我平时的言论，指责我有右倾情绪，我不服，争辩说，是我们去动员人家提意见，人家提了意见我们不总结，不表态，马上就反击，就根据所提意见整人，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这怎么算是右倾情绪？！好，不算右倾情绪就算右倾，我更不服，变成严重右倾，还不行，变成反党情绪，再不行，变成反党、疯狂反党、反党分子——一直到定为右派分子！

接下来要我写交待。交待从何谈起？我坚决不写，折腾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一个老同志的一句话让我投了降，他说：“赵子生，为了党的利益，你就是牺牲了自己也应该，何况认个错！”这句话让我无法反抗，我一下子泄气了。于是，在批斗会上，我拿着他们整我的材料，当作自己的认罪交待读了一通。最好笑的是，读完之后有人喝问，你自己的认罪态度呢？我一时没反应过来，竟回答：“这材料上没写。”

我当右派后戴披星非常内疚，认为是他连累了我。20年后，戴从峨边劳改回来，他是煤校10多名右派中判得最重的一一送监狱劳改，他紧紧握着我的手，哭着对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连累了你几十年。”我安慰他说：“你不要过意不去，我那样做是出于本能。”（这种本能，便是人性，是良知，也是共产党几十年所竭力要摧毁的东西。）

左书记用“扣门事件”整了一串人，图书馆的一个工人周世禄也被划为右派。

我当右派后只拿12元生活费，我有三个小孩，生活非常困难。去长寿湖前我先去的南桐农村，是在那儿我才真正变得“右倾”。

那时正在大跃进，我看到农民苦苦哀求队长：“队长嘞，这样点麦子要不得，要绝收。”队长也没办法，共产党要亩产万斤，十万斤，就得密植，农民不敢违抗，只好一筐筐麦种往地里倒。这样下种的后果可想而知。还有大肆破坏生态，把一坡一坡的树砍来炼土钢，

劳民伤财。还搞什么“原子爆炸”——把不识字的人都集中起来，规定在几天内脱盲，变成能读会写的人，如此等等，荒唐透顶！



周总理参观长寿湖规划。

1958年3月周恩来在长寿湖

但是，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没有人敢提半点意见，否则就是反对三面红旗，反对共产党。57年给党提意见的后果血淋淋摆在眼前，哪个还敢说话？这一切使我开始觉得，这个国家出了问题，这个政党也出了问题。知识分子不敢说话，农民一样不敢说话，工人农民虽然不划右派，但划反社会主义分子，整起来一样的凶。我这个时候终于明白，所谓的“知无不言、言者无罪”原来是“不准说话、言者有罪！”

1960年，我从南桐矿区转到长寿湖，我不再多说话。

采访时间：2001年6月13日 地点：四川外语学院

采访后记

长寿湖右派陈孟汀1979年“改正”后，担任了四川外语学院院长，陈院长“翻身”不忘长寿湖，“收留”了好几名难友，其中包括当年同他大吵大闹一场的赵子生。

他是不是看到赵子生在1957年展现的作为一个人的最宝贵的东西：良知。

在歌乐山下绿树掩映的川外宿舍里，我问赵子生，是否为1957年的“仗义”后悔。赵子生摇摇头说，他中学时从教师那儿接受了一种正义感，这奠定了他做人的基调。

在人类历史上，新王朝代替旧王朝，新政权摧毁旧政权，司空见惯。但如果有个新政权、有一场革命摧毁人的良知，摧毁人的正义感，摧毁人的善良、摧毁人的诚实，这个政权，这个革命会给这个民族带来怎样的后果？

步出川外，买得一份报纸，几个大黑字扑面而来：我市发现毒大米！



2002年6月赵子生（右二）重返
飞龙岛（谭松摄）

要推翻共产党，我愿意去干！

杨光瑜

1957年重庆新华书店会计

1930年生



听说你在采访，我是盼望你来，心里憋了话，想说！很多人已经吓怕了，长寿湖整死了100多人。没死的一个个精神上都受到摧残。话剧团的肖培禧是个很活跃的人，至今不敢参加长寿湖右派的聚会。团市委的曹贞干一心只想过平安的生活，不愿多说话。还有些人精神和人格已经被彻底扭曲，永远站不起了。我最大的胜利是在长寿湖17年精神没有被摧垮，更没有被扭曲，相反，我从迷蒙走向了清醒，从屈从走向了抗争。

我父亲1949年前是商务印书馆一名高级管理人员，曾在杭州、贵阳、重庆等地当过当地商务印书馆的经理。我子从父业，不到20岁便进了商务印书馆。由于书店的便利，我读到一些共产党的宣传品，你可能没读过，那上面民主自由喊得震天响，如果现在把那些语言拿来散发，共产党肯定要抓你，把你当民运分子。正是读了那些宣传品，我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身上。我年轻，热血冲动，私下组织了一个地下组织，有几十个青年人，宗旨是反抗国民党，宣传共产党。

共产党进了城，我欣喜若狂。可惜我是一厢情愿，共产党嫌我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

鸣放时我担任部门的工会主席，有人要求工会组织鸣放，我欣然同意，说：“好，要鸣就鸣。”我带头鸣，其中要命的是两句话。一句是：镇反时有些被镇压的人根本就不是反革命！另一句话是：胡风的私人信件是谁去拆开的，这样做对吗？这一个“！”和“？”各值10年劳改。

1957年重庆新华书店共计100来名职工，划了12名右派，60多个右倾和中右，打击面高达70%。为什么这么高？因为那时新华书店几乎没有贫下中农出身的人，上面认为新华书店是被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占据的地方，所以下手狠，1949年前的老职工几乎全部被整光。对我的处理算轻的，有的右派被直接送进监牢。我只是撤职降薪，下放劳动。这是因为我认罪认得好。我们12个右派中，有人死活不认罪，被连续批斗几十天，斗得死去活来，最后判为极右送去劳教。我见势不对，一上台就认罪，把吓人的大罪名往自己头上戴。例如，我说自己一贯反党，一贯仇恨新社会，还说自己企图推翻政府，让资产阶级当政等等。这些假话效果好得很，没人来追究我是如何企图推翻政府，反而认为我认罪服法态度好，我没挨多少斗，还保留30元工资——那是救命的钱哪，是我认罪认来的。

到长寿湖之后，天天说我们有罪，天天要认罪，搞久了，我真的认为自己有罪了。

我开始觉得自己对不起共产党，镇反杀人是必要的，不牺牲一些人国家搞不好。自己虽然主观上没有反党，但客观上起了反党的作用，错了。

我想，共产党是一心想把国家搞好，必须要发动一些运动。我虽然当了右派，但仍然相信共产党，大跃进亩产 10 万斤我都相信。有农民对我说，你晓不晓得 10 万斤堆起来是多少，我批评农民思想保守，说人民日报都登了，还有假？后来看见饿死了人我才有有些觉醒，不过这个时候我已经不敢吭声了，那个年代，一句话就可以判你的刑。长寿湖鼓动右派互相斗，互相揭发，连说梦话都要派人记录，我就被派去记录过右派周西平的梦话。

我彻底清醒归功于文革中大跳忠字舞。

每天，老老少少集中起来，排成一排、两排、三排，僵尸般地挥手，一边嘴里唱“敬爱的毛主席”，一边脸上要做出很幸福很虔诚的样子。我在一旁看，觉得像舞台上的小丑。还有，到处贴上红鲜鲜的大“忠”字，连死人的坟墓上都不放过。我私下想，这算那杆子社会主义？马列主义就是这个样子呀？！我解放前的追求就是这个样子呀？！封建王朝都没到这个地步，荒唐，荒唐透顶！我开始去认真读马列的书，包括《资本论》。我不读毛的书，我对他的书非常厌恶。每个人甲种本、乙种本、语录本一大堆。轮到煮饭我偷偷把他的书撕烂塞进柴灶，只剩下两本装点门面。我自己给自己宣判无罪，我大声唱国际歌，重点唱那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由于我坚持不参加表忠心，不跳那个愚昧丑陋的忠字舞，他们把我抓起来，跪在地上，用铁钎丝死命抽我的背，抽得我鲜血淋漓，死去活来。但我决不再说假话，不表那个根本就没有的“忠心。”

杨光瑜一旦清醒，从此就再没有“糊涂”过，他越到晚年越激昂。我采访他时，杨老先生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

这几十年哪里是我有罪，是他们有罪！有罪的人把无罪的人抓来关、打、骂、斗，还要进行认罪服法的思想改造。什么思想改造？思想改造就是要摧残你的精神，摧残你的人格，摧残你人之为本性。我在长寿湖最大的痛苦不是饿得偷了一碗饭被抓去关了半年，也不是三天三夜抬石头累得趴在地上起不来，而是没完没了的思想批判、思想汇报、思想评审、思想鉴定。开一句玩笑，可以上纲上线，斗你三天五天，说错一句话，可以罗列罪名判你五年十年。不仅如此，还非要你从思想深处深挖反动根源，痛哭流涕地向党、向毛主席认罪悔过。一个政权以强大的暴力为后盾，强行对一个人的精神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致使一些人人格分裂，甚至变态。长寿湖有一对夫妻右派，丈夫叫林柏力，妻子叫杨惠云，文革时杨惠云跳湖自杀。林柏力在湖边整整转了一天，一边哭一边呼喊妻子的名字，景象十分凄惨。嘿！两天后，农场举行批判杨惠云“畏罪自杀”的缺席审判大会（因为杨惠云“缺席”），会上，林柏力同大家一起批判他的亡妻，一面批她抗拒改造，一面表示要同她划清界线。整个批判会这位丈夫没掉一滴眼泪！政治高压和精神摧残让林柏力彻底垮了，直到现在他都害怕，不参加任何长寿湖右派的聚会。有一位文人右派叫 XXX，他已经被改造得彻底丧失了脊梁骨。本来他自己也被人揪辫子上纲上线批斗。例如有一次他写了一首诗，大意是：清风吹来，温柔美好，仿佛爱人抚摸我头发。

有人汇报给组长，他马上挨斗。反过来，他也最喜欢干这种事，一门心思去揭发、批斗他人。还有，重庆日报有个右派死了，他女儿来收尸，长寿湖把她父亲的遗物交给她，要她打个收条。她看见父亲的全部财产只是几件破烂衣物，悲伤得全身发抖，笔都握不稳，但就是不敢哭出来。她怕！

我活到70多岁了，现在是彻底看清了共产党的本质，共产党、毛泽东才是历史的千古罪人，他们对国家、民族、人民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过去的姑且不提，就说现在，共产党一方面要打社会主义招牌，以便坚持一党独裁和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方面要搞它领导下的市场经济，以便为自己捞钱。这两者共产党都要抓，而且抓得很有成效。你看看，现在腐败烂到什么程度！就在我住的这条街上，就有军官穿着军装戴着肩章嫖妓。我亲自去侦察过，亲眼看见有军官嫖妓后还开了发票。开发票干什么？拿回去报帐！我找老板要发票底根，他不给，要保护顾客（嫖客）。

现在同（19）57年完全不同了，那时真没有几个人真心攻击共产党，现在是凡有一点正义感的人都要骂。说共产党好的不是昧了良心说假话就是既得利益者。我最瞧不起郭沫若，这个人至死都在说假话。活了一辈子，从当年反封建的斗士变为媚颜奴骨的奴才。

一个人做人要有点良心，有点正义感。当个人就要说人话，所谓人话就是真话，我就要说真话。有人说，我现在这个样子又要当右派，我说我再当右派没关系，这已经不是我个人的灾难，再搞一次我个人完了，这个国家也肯定完了。我现在不光是想动动嘴骂几句，告诉你，我还愿意干点实事！如果要推翻共产党，我愿意去干！可惜现在找不到那种组织。共产党不允许除他以外的任何组织存在，连建立学习马列的组织都不允许。它对社会、民间的控制比国民党严密一百倍！我同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有接触，对共产党的不满、怨恨是普遍性的。共产党常用多行不义必自毙来说别人，现在该轮到它自己了。

采访时间：2001年5月30日 地点：重庆市渝中区

采访后记

在一间窄小的底层屋里，个头矮小，其貌不扬的杨光瑜慷慨激昂，目光炯炯有神，神态大义凛然，仿佛有一团火，在老人的心灵深处滚动，令人想起岳飞“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老人还渴望行动、渴望实实在在地“干点实事”。

现在，能“干”的只有70岁以上的老人了？（就像让一群群老太婆上街去“反饥饿”？）还有，找不到组织。

1949年前可以自行组织几十个人的“地下党”反抗国民党，50年后，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只能站在冰冻的王国里，一筹莫展地悲叹“失掉的好地狱”。

不知杨先生是否看到今天的新闻联播——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些男女学生们正在共产党的国旗下宣讲“三个代表”。

一样的慷慨激昂，一样的目光炯炯有神，神态大义凛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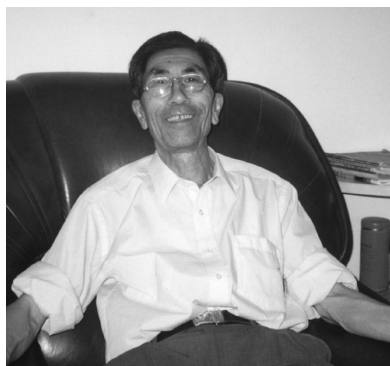
但愿他没看，否则，那种绝望更胜于“找不到组织”。（2001年5月30日）

“陈初蓉？打！”

陈初蓉

1957年重庆市委宣传部处级干部

1930年生



莫名其妙地获罪、遥遥无期地服役、无休无止地批斗，组成了我们这批人几十年人生。

我解放前在北京国立师范读书，参军后随军南下，参加了渡江和接管南京。1949年底成立西南服务团，我随团到了重庆，接管出版社。1954年，我调到市委宣传部报刊处，同时任宣传部团支部书记，负责新闻出版工作。1957年没我的事，我是在1958年2月反右继续“扩大”的惯性下被抛出来的。我负责报刊工作时，说过一句话：“新闻舆论要大胆干预生活。”他们说，这是鼓动舆论揭露党的阴暗面，是社会上右派分子的传声筒，向党进攻的内应。另外，我对划重庆日报副总编贾唯英为右派感到困惑，私下里曾说，贾唯英是延安时的老干部，她怎么是资产阶级右派？这成了另一条罪：与右派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我一直是被作为内部问题批斗，没当成右派分子整。两个多月后，1958年4月23日晚上，有人请示王若（王若，1957年市宣传部副部长，市反右小组五人成员之一，文革期间被斗，自杀于歌乐山山下烈士墓），陈初蓉的问题怎么解决？王若冲口而出：“陈初蓉？打！”

他一个字“打”，判了我20年零6个月长寿湖劳改。

4月23日，我永远记得这个日子，9年前我们就是在那一天攻占的南京。当时，也是一个字：“打。”

我们宣传部总共66个人，打了22个右派（见本章“简况”）。我离开宣传部时，支部书记对我说：你简单收拾下行李就行了，下去两三个月就回来。

说到这儿，我说两句共产党的“量刑。”即使我们是罪犯，判个三年、五年、十年，也有个刑满释放的盼头。我们到长寿湖服役，遥遥无期，不知何时是尽头，有些人正是因为看不到出头之日才自杀。莫名其妙地获罪、遥遥无期地服役、无休无止地批斗，组成了我们这批人几十年人生。

我下长寿湖后，一直不服罪，从1960年起，我每年10月1日给党中央写翻案书。这些翻案书全部被退回市委宣传部，我“改正”时，翻案书都在，全部退还给我，满满一大包！

1958年我还没结婚，有一个恋人，她是四川医学院的大学生，当右派后我们被迫断绝了关系。

1975年我45岁才结婚，妻子是我1972年回湖南老家探亲时认识的一个女知青。她没嫌我，她嫁给我的唯一要求是：不要告诉她家里她是同一个右派分子结婚。我当然巴心不得。咦，长寿湖农场给我开结婚证明，偏偏写：我单位右派分子陈初蓉回乡结婚……我气得一把将证明书撕得粉碎。闹了好几天，才终于把“右派分子陈初蓉”改为“宣传部下放人员陈初蓉”。

在长寿湖20年的苦难一言难尽，仅说劳动，曾经强迫我们48小时不下火线，累得死去活来，共产党用劳动这个手段折磨人，将人折磨死！完全不把我们当人看，连畜牲都不如。

长寿湖500多名右派分子，有专家、学者、教授、作家、诗人、教师、干部、工程师、大学生、归国华侨等等，每个人都有一部心酸史、血泪史，真的是一言难尽！

共产党千错万错，“左”祸是最大的错，国家、民族、人民深受其苦。“左”的根源又在提倡“阶级斗争”，提倡人与人斗，今天我斗你，明天你斗我，不仅同志间斗，朋友间斗，而且夫妻间、父子间、兄弟姊妹间都斗，斗得人人自危，斗得妻离子散，斗得冤魂遍野。斗斗斗，斗坏了一切，搞得国不像国，党不像党，整个国家和社会乱了套。毛泽东这个人，太残酷，太专制，是个典型的封建暴君。他的后半辈子，罪恶深重。多年来，没有民主、没有法制、没有人权，腐败越来越严重。这样搞下去，人民不会答应。工人、农民，什么国家的主人？！屁！他们对共产党曾经那么信任，那么支持，那么拥护，现在你去听听，一片骂声！

共产党不要这么害怕民主，害怕批评，应当赶快实行多党制。再这样搞下去，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我们现在是坐在火山口上呀！我是副局级待遇，本是共产党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但我看到眼下这一切，心急如焚！

采访时间：2001年6月15日 地点：重庆市渝中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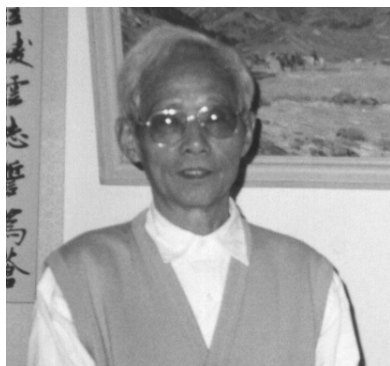
长寿湖老场部（图片来自画册《长寿湖》）

简直是法西斯专政！

詹一之

1957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1926年生



我是搞哲学研究的，1954年到1956年，我担任重庆市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1957年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1959年8月又被调回重庆。

这调来调去自然有人生的“趣闻”。

市党校副校长周X学问不高，但脾气很大，对教师态度十分粗暴，我经常给他提意见。他业务上要依靠我，我又是党委委员，他一时拿我没办法，但怀恨在心。1957年初我调到北京，市委组织部萧部长留我，我不干，坚决要走。萧很生气，说：“好，你走！你走！”这样又得罪了一个人。

1957年，周X组织人整我的材料，交给萧部长，并寄到中科院。萧得到材料，坚决要求把我调回。中科院很器重我，不同意我调回。一次，萧到北京开会，找到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要调我回重庆。安子文给中科院发了话，中科院顶不住了，我只得卷起铺盖回重庆。

我到市委宣传部报到，不安排我工作，让我参加一个农业检查团到綦江乡下检查大跃进，检查团的团长便是周X！

1959年10月，通知我去参加一个会。我一去就把我揪出来批斗，说我攻击三面红旗，攻击毛主席、共产党。那真正是突然袭击！事先没有一点预兆，距我从北京回来不到两个月，下手又快又突然。

李国音（詹一之的妻子）：他挨斗后第二天就来抄我们家，把一些书籍，他写的文章，甚至我们夫妻写的私人信件全部抄走。

詹一之：给我罗列了六条罪状，都很荒唐。举个例子，《哲学研究》上曾发表一篇文章，强调政治挂帅。该文把人的思想觉悟加在生产要素上，认为它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个观点就像李井泉（四川省委书记）说的“你想什么、要什么，就能达到什么标准。”也有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味道。我在中科院写文章批判这篇文章。我说，人的政治觉悟，思想觉悟是历史形成的，把它作为生产中起决定性的作用，那么唯心主义，唯物主义还有什么区别。——这就成了“恶毒攻击毛主席的政治挂帅。”还有，我汇报现在农村干群关系很紧张，便成了攻击三面红旗，等等。

不管怎么说我被揪出来了，到底怎样处置我还没有定论，有不同意见。几个月后，在市委一次常委会上，市委书记任白戈一锤定了音：“詹一之这种人划不划右派划谁？”

说起这个任白戈又是我得罪了的人。我在党校时，任白戈是市委宣传部长，也喜欢

搞哲学，他曾到党校来上课，讲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我作为哲学教研室主任，曾给他的讲课提过一些意见和建议，完全是善意的，就事论事。我没想到他从此对我印象不好，认为我这个人不知高低，很狂。

我只有走人，下长寿湖、劳动改造、离婚。

李国音：我本来一直顶着不离，他打成右派后，把我下放到农村一个公社当副主任，我原来是市妇联的秘书长。这是我第二次被下放，第一次是为罗成溶被打成胡风分子鸣不平下放长寿湖。1962年下半年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天天讲”之后，政治压力加大，任白戈在四千人会上不点名地说我顽固不化，还在同老虎睡觉。那次会后组织上同我摊牌是要共产党党籍还是要右派丈夫。我要了党籍。但是，离婚后，四清运动时，还是把我划为“四类分子。”文革时押我游街，揪我头发，要我自己喊：“我为右派分子翻案。”

詹一之：我下长寿湖后一直不服罪，主要是想不通，解放前一心一意跟共产党走，闹学潮，争民主，1947年为“沈崇事件”上街抗议美军暴行，被国民党抓进监狱关了半年，对共产党全心全意，牺牲生命都不在乎，解放后也一直热爱并歌颂毛主席、共产党，说我反毛、反党，觉得很委屈。委屈，便要翻案；翻案，便罪加一等；罪加一等，更委屈；更委屈，更要翻案。所以，我摘不了帽，也回不了城，在长寿湖一直呆到1978年底，算长寿湖的老右派。

那十八年的经历就太丰富了，都不知道从哪儿说起，长寿湖搞以右治右，搞劳动指标，搞精神折磨，肉体摧残。管教干部孙重就创造发明了不少办法整右派，把右派整得很惨。我目睹了李思强之死、余顺春之死、卢蕴伯之死、贾厚友之死……简直是法西斯专政！

长寿湖的深重苦难，并没有让我彻底清醒，我在长寿湖还写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文章，还认为马列、毛的思想体系没有错。我被整是因为同那几个领导的个人恩怨，还没有从共产主义的本质上来认识。正因为如此，1979年调回社科院我仍然宣称：我的信仰不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好的。别人叫我不再搞理论了，我不干，我埋头写列宁的论新经济政策的文章，发表论文，等等，等等。

“六四”的枪声，“六四”的鲜血把我惊呆了，也把我彻底改变！

一个执政党，为了自己的权力，自己的利益，居然可以对追求民主的学生和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进行如此血腥的镇压！

这就是我当年搞学生运动时追求的共产党？！

我认真反思1949年以来毛泽东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发现它搞的全是独裁、专制、暴力、个人崇拜那一套。毛泽东如此，邓小平如此，江泽民也如此。一个标榜自己代表和追求民主自由的政党执政后，不仅没有为人民创造一点民主自由的条件，反而把旧社会的一点民主自由清扫得干干净净，把人民应当享受的基本权利剥夺得彻彻底底，这个罪恶更大，必须进行揭露和控拆！过去共产党讲“不破不立”，现在对共产党首先就要“破”，这个党已经没有希望了。

除了“破”，还应当进行清算！

毛泽东就不用说了。至于邓小平，这么说吧，毛泽东挨一巴掌，邓小平应当挨两巴掌，因为他是在目睹了毛泽东独裁专制的暴行之后继续走这条路，甚至走得更远，把坦克机

枪都用上了，丝毫没有接受毛的教训。至于江泽民，既学毛泽东，又学邓小平，还有自己的几个令人好笑的空洞口号。

另一方面，对斯大林、列宁都要进行清算。马、恩的根子上就有问题，我是由中国惨烈的社会现实，反推回去找它的根源，发现共产主义的本质问题。“六四”之后到现在，我越来越清醒。70岁那年，我准备写一本书“半个世纪”，目的就是进行反思、揭露和清算。我认为我这一生，并没有违背自己青年时代的追求——对真理的追求，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用种种美好的东西欺骗了我，我上了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从此放弃对真理、对自由、对民主的追求。

可惜，正是那一年我得了食道癌，从此身体江河日下，力不从心。

李国音：“六四”之后老詹就不再写那些理论文章，转而研究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当年我同老詹都是乡村建设学院的学生。晏阳初一辈子实实在在的干，真正为人民谋幸福，不像毛泽东、江泽民尽说空话、假话、大话。他在农村开展四大教育：科学教育——增强农民知识力量；生计教育——培养生产力；卫生教育——增强健康；国民教育——培养农民团结的力量。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给农民带来好处的东西，不像那个空洞的“三个代表”。可惜，1949年共产党执政，晏阳初的事业半途而废。但是晏阳初在拉美搞四大教育却成功了，农民实实在在得到好处，他们挂晏阳初的像，十分崇敬。

（晏阳初在自己的祖国却一筹莫展，是讽刺，更是不幸——人民的不幸。）

詹一之：晏阳初不是从上层政治作改造工作，而是由下层基础改造做起。他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脚踏实地作基础工作。“六四”之后我也是这样，我已经出版了好几部研究晏阳初的专著。

采访时间：2001年10月27日 地点：成都市百花潭

采访后记

詹先生不仅仪表堂堂，而且颇有学者的儒雅。采访时，他不紧不慢，娓娓道来，有思想、有胆识，敢想敢说。更让人敬佩的是，到了晚年，他拖着病体，仍然在孜孜不倦地思考和追求，写出了一本又一本专著。

回到重庆后，翻开詹先生送我的一本他研究晏阳初的专著，想到他在血与火之后的不懈追求，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一个中了“毒”的北大才子

刘康

1957年重庆市党校政治经济教研室研究员

1926年生



我走上革命道路，加入共产党，是那个年代的一种必然。

我从小是一个一心一意读书的人，1945年以全年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成都树德中学。树德中学同重庆的南开中学一样，是全市第一流的学校。毕业后，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到昆明报考西南联大，联大由内迁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考下来，几个同学中只有我上线，我原本想学物理或地质学，我的一个同学说，要学就学经国济世的学问，要改造这个社会。我不大懂什么学问是“经国济世”，心想，经济学大概属于那个范畴，于是，我把第一志愿从物理改为经济学。

“一·二一”学生运动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我从一个埋头钻研学问的书生变成了一个关心国家大事的激进青年。记得那年费孝通等5个教授来演讲，他们说，八年抗战好不容易取得胜利，绝不能再打内战，中国要实行民主，成立联合政府。他们的话说到我们心坎上，我也是坚决反对打内战。

国民党派特务来干扰，还放枪进行恐吓。这一下激起了同学们的愤怒：要民主自由你居然进行威胁？！同学们罢课上街游行，我也去了。

那天，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在省政府旁看见一条大标语：“联合政府是共产党的主张！”我们一看，很生气，联合政府是我们的主张，怎么是共产党的？那时，我们对共产党一无所知。其中一个叫陈世夫的同学（他现在是陕西社会科学院的教授）说：“给它改了！”于是掏出粉笔，把那个巨大的“！”改为“？”。

转眼特务就围上来，一顿拳脚打得陈世夫落荒而逃，另一个同学因为手中有讽刺国民党的传单，也挨了打。

也是那天，我们得知，特务往校园扔手榴弹，南菁中学的青年教师于再为保护学生，在抢夺手榴弹时被炸死。这一系列事件让我怒火中烧，好哇你个国民党，与民主自由为敌！于是我思想开始转变，变得激进。在随后的游行示威中，我积极得很，嗓子都喊哑了。

当时，联大中有很多共产党员，建有他们的支部，我的一个树德中学校友庞邦镛就是中共党员。我在他的箱子里找书看，无意中读到了草纸印的毛泽东写的《论联合政府》和《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我这才明白联合政府果真是共产党的主张。毛泽东说得何等好啊！说到我心里去了，那的确是救国救民的好主张。

两相对比，我认定真理在共产党一边。

我不再埋头读书，我创办了一个《树德校友通讯》，宣传民主自由，反对国民党独

裁专制。我自刻自印，邮寄到树德在全国的校友。不少人就是受《通讯》的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

1946年6月，联大解散，同学们分别归到北大、清华、南开三个学校，我进了北大。6月27日从昆明动身，8月12日才到北平。国民党派了几十辆崭新的军车送我们，每个学生还发了16万法币作为伙食费。我们一路上吃得好哇，鸡鸭鱼肉都有，一顿饭才800元钱，16万根本用不完。在上海我还用这钱买了一些革命书籍，读后思想进一步发生变化，弄懂了什么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为什么无产阶级要革命。

你说国民党还舍得花钱？这倒是，我进校一分钱没有，学费、伙食费全免，到北平后读书也没花钱，像我这种情况的还不少，国民党是花钱在为共产党培养干部！培养了一大批坚定不移要革它命的优秀青年。想来也就是它要打内战，搞专制，把很多优秀学生逼到共产党一边。

我是1946年10月在北大加入的共产党，当时已经开始打内战，国民党比共产党强大，天下很可能是他国民党的。我偏要加入弱小的一方，我认为真理在共产党那儿。

多年后，在长寿湖，管教干部天天要我们学习毛泽东的两篇文章《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和《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好像我们是国民党南京政府，要赶快投降。我觉得好笑，当年我就是反南京政府，不顾一切加入共产党，到了共产党天下，我怎么成了国民党一伙？要我投降？这一辈子，想不到呀。

1948年，我是北大支部的总支委员，负责宣传的书记，离毕业也只差一年。这时，上级通知，重庆地下党被破坏，需要一批人回四川工作，于是，从北大、清华和燕京大学抽了30多名党员学生南下，其中北大的10多个人由我负责。

到重庆后，我专门从事学生工作，在学生中发展党员，一直干到解放。

解放后，我先后在团市委、市委宣传部工作，1954年调到市党校，在政治经济教研室当研究员。1956年，我到北京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学习期间，讨论一些理论问题，如谈到资产阶级民主，我说，它不应是哪一个阶级、哪一个党派的东西，而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成果。法国大革命，就有广大的工人、农民参加，选举权就是广大人民共同斗争取得的成果，不光是资产阶级的。再谈到无产阶级专政，我说，那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专政，如果最高领导人个人素质好，思想状况正确，就能给人民办很多好事，反之，则会带来灾难。

反右时，他们把我以往学习讨论时的话串在一起，送给我一个当右派的罪名：“欣赏资产阶级民主，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我1957年12月戴着右派帽子从北京回到市党校。党校给我一个结论：“刘康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我被放到伙食团干活，天天给领导端菜送饭。

几个月后，1958年3月23日，我下放长寿湖，这一去就是20年，从32岁到52岁。

在长寿湖头几年，我一声不吭，叫我干啥就干啥。记得有一次叫我往粪坑里跳，我二话不说就跳下去。我没有死在长寿湖，全靠在最危险时遇到几个好人，其中最值得提的就是洪修成医生。洪修成解放前是国民党孔祥熙的私人医生，医技高超，他两次救了我的命。可惜他后来在长寿湖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下放到农村，衣食无着，死在那儿。

在长寿湖我思想认识有一个变化过程。最初几年我不服，觉得自己的那套理论没有

错。1962年，我到县城，买到一些反右倾机会主义的书。我拿回来细细读，那上面有理论，有事实，条条分析，层层说理，我读了后，觉得自己错了，自己的思想认识落后了，也就是右了。我开始站在极左的立场上来否定自己1957年正确的东西。于是我真心实意地认错，这一下，很快就摘了帽。后来，我又用我学到的那一套极左理论去批判其他右派。在长寿湖，别人对我有意见，根源就在这儿。

你问我为什么轻而易举接受了极左理论？极左的东西，并不完全是一些口号，它有一整套完整的理论，就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一步一步的，发展得相当完善。文革时期，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受到那套理论的迷惑，甚至奋不顾身为它献出生命！共产党那一整套完整的错误路线，很迷人哪！

（刘康说到这儿，情绪异常激动，声调高亢，言辞急促，依稀让人猜想他当年在昆明街头的慷慨激昂。）

我们在长寿湖，与世隔绝，除了共产党的东西，除了听见党的声音，听不到任何其他声音，没有比较、鉴别，这也是接受极左思想的一个原因。

我虽然认识上“左”了，但我这个人骨子里天生对“极左”的东西反感，对那种强迫命令，横行霸道的行为非常反感。我看到把农民的茅草屋掀了，锅碗抢走，七、八十岁的农民老婆婆走几里路，像乞丐一样去公社食堂喝一碗清水粥，这哪里是“解放劳动人民”？长寿湖一些共产党干部作风坏得很，动辄骂人打人，捆人吊人，还骗吃骗喝。有的右派家里寄来点吃的，巧取豪夺弄到自己嘴里。我们党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不相信共产党是这个样子，我只看到长寿湖这一小块地方，我以为只是这一小块地方烂了，出了问题，上面是好的。这种认识，让我在文革时又吃了大苦头。

造反派进来打砸抢，把我们右派拖出来跪在地上，还动了刀子。我非常反感，怎么能这样辱损人、折磨人？当时我不知道全国的情况，长寿湖很闭塞。我决定向党中央写信反映问题，我相信党是正确的，绝不会这么污糟，绝不会容忍下面搞成这个混乱样子。

我根本没想到共产党是根子出了问题，我到老虎面前去告状，结果可想而知。

1969年，我又被重新专政，先关到先锋岛写两个月交待，然后放到飞龙，批斗会自然少不了。那些右派看我挨斗，高兴得很，说“刘康完全是假改造。”其实我不是假改造，我是真的相信了他们那一套。

这次“专政”，把我腰弄伤了，完全站不直，走路、劳动，腰弯成90度，痛得钻心，又是靠洪修成给我治好。

你提起后不后悔，怎么说呢？当年加入共产党，好像也是一种必然，也是应该的，后来看到它不为老百姓谋幸福，又歪又恶，和平年代饿死几千万人，公安局里是有数字记录的，我思想认识自然就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仍然在思考很多问题，其中也包括我从学生时代参加的这场革命。

想起来这一辈子真的好笑哇，说给别人也不懂。我外孙女就不懂，她问我为什么要去长寿湖，我说，我成了人民的敌人，被专政。她问为什么要专政，给她说了半天，她还是不懂，觉得听起来像个神话。

我觉得也像个神话。

采访时间：2001年5月、2003年9月 地点：重庆市党校

采访后记

刘康是北大毕业的才子，也是长寿湖一个思想比较“左”的右派（当年长寿湖有些人对他的“左”颇有微词）。现在回过头看，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

刘康的“左”不是个人品质问题，而是思想中了毒——共产党意识形态或曰理论体系的毒。正如他自己说的：“共产党那一整套完整的错误路线，很迷人哪！”

前些日子，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其中有这么一段：

“为什么许多人要等到林彪事件才开始怀疑文革，怀疑毛呢？毛的一贯正确的神话，难道只有林彪事件才能捅破吗？此前，毛犯过多少错误，造成多少严重的后果，让人们吃了多少苦头，为什么你不怀疑，为什么你还对毛那么迷信？

这就是意识形态或曰理论体系的作用了。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早就感受过这样或那样的困惑与不满。我们发现自己的很多愿望和想法被压制，自己的许多利益被损害。不论官方的意识形态宣传是何等的冠冕堂皇，美妙动听，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存在着大量的丑恶和污秽。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这些感觉经验，却并不足以帮助我们萌生怀疑与反叛的思想。我们对很多事情都‘想不通’，可是，我们不敢轻易地怀疑党、怀疑领袖，我们总是怀疑自己。我们怀疑自己理论水平不高，世界观没有改造好，革命立场不够坚定，因此对形势不能有正确的认识。我们总是力图用官方的理论去解释现实，解释经验，而不是根据现实，根据经验去批评理论。

这正是理论体系的妙用。一旦我们接受了某种理论体系，我们以后的观察和思考，就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推论。如果我们发现在推论和现实之间出现了矛盾，我们常常不是依据经验去调整理论；相反，我们往往是依据理论去调整经验。只要体系是足够的包罗万象，前后一致，从而能够自圆其说（哪怕很勉强、很生硬），我们进去之后就很难再走出来。

官方意识形态是一套封闭系统，它自身规定了真理与谬误的绝对标准，因此身处其中的人们，很难具有另一套评判是非的标准；更由于官方意识形态，具有超越个人利益的理想主义色彩，因而，一般人即使是蒙受了巨大的个人损害，也常常不能据此而理直气壮地表示反对。”（很对不起，忘了出处，在网上一时没能再找到全文。）

在共产党意识形态大厦尚未坍塌的那些日子里，有多少知识分子、工人、农民、红卫兵，同刘康一样，中了“很迷人”的毒？

我前后两次采访刘康（第一次的笔记尚未整理成章就被国安局抄走），感觉到，刘康是一个一辈子都在思考和追求的知识分子，虽然年近八旬，仍未放弃他青年时的那种执着，这让我感动。

补记：

刘康于2007年3月1日在重庆去世，终年81岁。2006年9月，我到医院看望他，他已说不出话，他认出了我，突然流出两行眼泪。那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30元补助与20年劳改

罗报群

1957年重庆市第二直属机关党委干部

1933年生



我是四川省渠县人，1950年初参军，参加过抗美援朝，1955年复员到煤矿基本建设局，后调到重庆市第二直属机关党委。

1957年鸣放时，我给我单位的党委副书记王晴提了个意见，认为她不当领取一笔补助金。王书记是16级干部，每月工资102元，她家只有三口人，每人平均34元，这在当时算是高收入了。她有一次生病，住了几天医院，便领取了30元补助金。我在会上提出，王身为书记，对自己要求不严。我话没说完，王书记就打断我，说发给她补助金她不知道。我反驳说：“就算不是你自己要求的，但你在领钱、签字时总该知道吧。”王书记一下子哑了，神色十分尴尬，而在座的人则都对我投来赞许的眼光。

我要为这次“胜利”付出代价，而这个代价是一生的惨痛。

反右运动时有一个口号：反对个人就是反党；反对地方一级组织就是反对党中央。

于是，我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说来好笑，在大鸣大放期间，我作为工作队员，还叮嘱我的表哥杨克远（他在西南第四建筑工程公司工作），叫他在鸣放时说话要谨慎，该说的话才说，不该说的一定不要说。他因为我这个国家干部的忠告而谨言慎行，一点事都没有。我则因“说话不慎”被打成右派。事发后他大惑不解地问我：“你是怎么回事？”

我1958年3月5号正式戴上右派“帽子”，第二天，3月6号，被押送长寿湖。

当右派前，我的月工资是42元，一打成右派，立马降到12元，中间刚好差30元！

从1958年3月到1978年10月，我共在长寿湖劳动改造20年零7个多月。工资在1962年1月增加到25元，后来一直领25元，直到我离开长寿湖之后。

“改正”之后，右派们的工资恢复到蒙冤时的水平，我便又开始领20年前的那个42元。那20年，不说赔偿，至少该把扣发的工资补发给右派吧？

不！右派一律不补发！

同属冤假错案，补发要分“文革”前与“文革”后。当时有个文件，文件规定，只补发“文革”中受冤者的工资，“文革”前的一律不补发。

“文革”前的不是受难时间更长久吗？

经济上惩罚只是一方面，株连九族是另一方面。我父母去世得早，我唯一的亲人是弟弟。我当右派后，当局把他从城市赶回农村，而且通知当地，他哥哥是右派，因此他属于“五类分子”（即地、富、反、坏、右）家属。这样，弟弟在农村受尽歧视，重活、

累活、脏活都派给他干。由于受我影响，弟弟当了一辈子农民，至今仍在农村。

1957年我还没结婚，但正同一个姑娘——西南水利学校的一位女学生——热恋。我当右派后，我们被迫分手，她后来去了云南。我理解她，她压力太大，别说还在恋爱，就是结了婚的，在那种政治高压下都要离婚。

有一件事我终生难忘。1961年，劳累和饥饿把我推到死亡的边缘。一天，场部一位姓杜的女医生看见我，吃了一惊，说：“你怎么这付模样？气色这么差。”她找了点葡萄糖液给我注射，但是找不到血管，她于是叫我喝下去。然后她找到支部书记娄云龙，对他说，罗报群不行了，快死了，得把他送到疗养院。娄云龙同意了。当时渔场办得有个疗养院，一些身体垮了的右派经领导同意就可以送到疗养院，在疗养院可以不干活或干一些轻活。这样我才从鬼门关上折了回来。我感激娄书记，他若不同意我也只有死路一条，但我尤其感激杜医生，她对我是救命之恩，我很想向她表示感谢。一次在场部门口，我走近她，对她说：“谢谢您，杜医生，我……”我话没说完，她很紧张地小声说：“赶快走开，离我远点！”

她害怕呀，怕人家说她同一个右派分子往来。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把人与人的关系就搞成这样。

我再不敢走近她，不敢向她表示谢意。没多久她就离开了长寿湖，去哪儿了我不知道，1979年“改正”后我到处打听她，一直没有她的消息，但我永远记住她的名字——杜梦朴。

我在长寿湖劳改20年，无家无室，除了远在渠县乡下的一个弟弟，再无别的亲人。每年春节，我都是与其他同我一样的右派呆在一起，烧起树疙瘩，围着火光，光棍对光棍，渡过一个又一个春节。我永远记得我们那种绝望，看不到希望在哪儿，不知道这种日子何时是尽头。有个叫XXX的离了婚的右派，实在忍不住，在一个春节时，提着鱼和鸡蛋回城去看望前妻和儿女，结果被家人将鱼和鸡蛋扔出门外，家里人也害怕呀，要同他彻底划清界限。从此XXX再不回城，每年春节同我们一起默默地烧树疙瘩。

想不想成家？当然想！但是不敢去想。压不压抑？当然压抑！但是不得不压抑。

右派是什么？是人人都要避而远之的“坏人”，是一个生活在最底层连小娃儿都可以欺压的对象。经济上一贫如洗，政治上臭不可闻，若生个孩子还是“狗崽子。”谁愿嫁给一个右派？我要是个女人，我就绝不会嫁给右派。

不过后来我还是成了家——经人介绍，一个农村妇女嫁给了我——那一年我42岁。

婚后不久，“改正”通知就下来了，说是20年前反右扩大化，把我整错了。

我没有回原单位，一是我对当年整我的那个机关党委心如死灰，不愿再回去。二是我妻子是农村户口，当时要转成重庆市区的城市户口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就到了位于长寿县的维尼纶厂，从此留在了长寿。

采访时间：2009年5月1日 地点：重庆市长寿湖

采访后记

2009年4月30日，应长寿湖右派李宁熙之邀，前往长寿湖边参加他的80大寿。在

寿会上，见到了几位李宁熙的长寿湖难友，其中之一就是也永远留在了长寿县的罗报群老人。

我抽空匆匆采访了他。至此，留在长寿的五位幸存右派老人（李宁熙、余洪洲、李长文、冉德玉、罗报群）我都一一采访到了。

这五位老人，除了李长文和冉德玉是“分子”加“分子”的结合，其余三位都是同农村妇女组成的家庭。

采访完罗报群，约几位长寿湖右派老人到湖边漫步。湖畔芳草青翠，老人步履蹒跚，春天的气息轻盈温润，生命的暮色沉郁滞重。李长文独自前来参加 80 大寿，以往与他行影不离的爱妻冉德玉此时已卧床不起。

望着雨雾蒙蒙的湖面，心中有种湿淋淋的感伤。

从 2001 年 4 月 6 日开始长寿湖幸存右派的采访，到 2009 年 5 月 1 日采访罗报群，整整 8 年过去了。其间，我采访过的不少右派都已永远走了。仅仅去年，就有范广受、陈英、向光棣、罗成容等六位右派与世长辞。

8 年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都打完了……



罗报群同妻子参加难友李宁熙的 80 大寿（谭松摄）

部分干部右派简况

1、贾厚友之死

贾厚友——重庆市劳动局右派，北碚乡村教育学院毕业，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才子。1957年画了一幅漫画，一个官员正在装烟斗，题目是《钻研？钻研？——装烟！装烟！》。贾因此被打成右派。下放长寿湖之后，其妻（重庆渝中区的一个小学教师）真心实意帮助他改造思想。她完全相信共产党的话，越是艰苦的劳动锻炼越能让人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因此，每月领了贾的工资后，她只给他15元生活费。贾厚友在饥荒年代，得不到家里的援助，1961年吃下大量鹅儿肠（一种喂猪的草）而死，死于长寿湖二工区，终年29岁。他妻子来到长寿湖，见到丈夫的尸体，哭得死去活来。旁边的右派说：“好，好，好呀，你已经帮助党把他改造进了天堂。”

2、陈遥之之死

陈遥之——重庆市劳动局右派。文革初期，在一次年终评审会上，管教干部认为陈表现不好，说了一些威胁的话，陈感到十分恐惧。一天晚上，约11点钟，陈提了一盏马灯，端了一个脸盆，里面放了几件衣服，对人说到湖边洗衣。

几天后，陈的尸体从湖中浮起。陈被埋在同心岛“灭资岗”（消灭资产阶级山岗）。

1979年右派改正后，陈的从台湾回来的女儿向劳动局讨要父亲，劳动局派了一名干部同李恩章下长寿湖，要李恩章随便指一个坟包打发陈的女儿，李恩章不干，坚持在“灭资岗”上找到陈的埋葬地，挖出几根骨头交给陈的女儿带走。（详见“李恩章”）

3、田际昌之死

田际昌——重庆市团市委行政科科长，历反，1957年被捕。1979年“改正”时田际昌在西藏劳动改造。得到“改正”通知后，他仰天大笑三声：“哈！哈！哈！有这种事？！”然后把手中的手杖一扔，向前踉踉跄跄奔走几步，倒地而死（脑溢血），终年50多岁。

4、李思强之死

李思强——曾任重庆市团市委宣传部长、市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因婚外恋（当时叫“生活作风败坏”）于1964年下放长寿湖，分管团山堡的“历史反革命。”1967年2月，李在同心岛被红卫兵揪斗，从晚上7点一直斗到半夜12点，挨跪、挨踢、打耳光。斗争会结束后的当夜，李思强在同心岛跳湖自杀。红卫兵以为李畏罪潜逃，张布告四下捉拿。四天之后李的尸体才浮起——李会游泳，为沉下去，在筒靴和衣袋里灌满沙石，终年约40岁。

李的父亲无依无靠，与李同住团山堡，儿子死后，他也病逝，埋在团山堡。

5、李受之之死

李授之——重庆市委宣传部干事，右派，下放长寿湖。1960年，在身体极其衰弱的

情况下，被迫去守工棚，饿死在工棚，尸体数天之后才发现，死时 30 岁。

6、康中清之死

康中清——重庆市团校教研室主任，一个刻苦研读马列学说、对毛泽东无限崇敬的理论工作者。1957 年鸣放时说：“毛主席不仅在中国，而且也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威望。但是我只看见他到机场迎接过赫鲁晓夫和胡志明。我觉得毛主席应当多亲自迎接一些兄弟党的领袖。”反右时，康中清因“攻击毛主席”被划为右派。他主动提出与妻子离婚，并说：“我不摘帽绝不来见你和孩子。”（他孩子刚刚出生）下长寿湖之后，康精神力极大，他拼命劳动，想早日摘帽。一年多后，康身体垮了，于 1959 年在长寿湖去世，终年 30 多岁。



团市委幸存右派李普杰、高志长、曹贞干在杨惠云投湖的地方（先锋岛）致哀。2002 年 6 月（谭松摄）

7、杨惠云之死

杨惠云（女）——重庆市团市委右派。杨在长寿湖小心翼翼做人，不多言语。文革初期批斗她，杨在恐惧中于半夜划船到湖中，在身上系上石头、靴子里灌满沙子（杨会游泳）投湖自尽。杨死后仍被批斗——“缺席审判大会”（详见杨光瑜的讲述）。

8、黄静瑜之死

黄静瑜（女）——重庆市委机关党委右派（也是长寿湖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右派）。1960 年的一个夜晚，她从高峰岛对面的万鸡山上跌入湖中淹死，终年约 30 岁。

9、庄湛之死

庄湛——西南公安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前身）干部。他爱上一位老干部家的女保姆（资本家的女儿），写信约在“五一”劳动节见面。不料那天街上人多，两人被挤散，庄湛很沮丧，回来后在日记上写“讨厌的人群挤散了我们。”日记被人发现并汇报，庄湛因“攻击五一劳动节”，并且是与资本家的女儿约会而被划为右派，下放长寿湖，于 1958 年 6 月遇难。

《重庆市长寿湖联合企业公司大事记》第 4 页记载：“6 月 25 日上午 9 时 20 分，渔业队队员周登云（原市委办公厅收发员），庄湛（原西南公安学院干部）在新滩渡河时翻船落水身亡，27 日葬于新滩山坡。”

10、张光育之死

张光育——重庆市委某机关右派。1960 年，张因饿、病交加，身体极其虚弱。在一次劳动时，他支持不住，一屁股坐下去。组长顾 XX（市委摘帽右派）冲着他一阵臭骂，强迫他继续干活，张只得站起来继续干。当天回去后，张倒下去再没有站起来，终年 30

多岁。

11、孙毓澄之死

孙毓澄——重庆市劳动局右派，因说曾给康心如（1949年前四川美丰银行总经理，陪都参议会会议长。）当过秘书而划成右派。1961年的一个夜晚，他从狮子滩划船运粮回高峰岛，在桃花荡时小船漏水，孙随船沉入湖底。几天后尸体浮出水面，人们把他埋在人头山湖边。孙遇难时30多岁，留下三个孩子。后来其子女到人头山反复寻找父亲的坟，一无所获。

12、谢予之死

谢予——原綦江县宣传部部长，后任重庆市宣传部理论教员，右派。文革初看了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极度惊恐，上吊自杀。死在市35中，年龄不详。

13、童铸——重庆市委宣传部右派，1959年因病未得到医治而死。

14、徐和——重庆市委宣传部右派，发配峨边劳教而死。

15、肖扬军——重庆市委宣传部右派，“改正”前死于长寿湖，死因不详。

16、卢光特——巫溪人，1921年6月生。重庆市委宣传部党教处处长，右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去世。

17、赖恒国——重庆人，1934年11月生，初中文化，重庆市委宣传部右派。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去世。

18、尹平宗——重庆市委宣传部右派，文革前去世。

19、恭平——重庆市委宣传部右派。

20、张文澄——重庆市委宣传部部长，右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去世。张未到长寿湖。

21、陈孟汀——重庆市委宣传部文教部部长，右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去世。

22、王匡时——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右派，发配峨边劳改。2003年去世，王未到长寿湖。

23、顾玉玲（女）——重庆市委宣传部右派，已去世。

24、邢传俊——河南人，1931年1月生，高中文化（二野军大入川）。重庆市委文教部右派。独身。

25、陈正英（女）——重庆市委宣传部右派。

26、郑大同——杭州人，1930年5月生，高中文化，重庆市委文教部右派。

27、何子超——犍为人，1924年9月生，大学文化，重庆市委宣传部右派。

28、赵万仞——重庆人，1921年生，大学文化，1960年在重庆市委宣传部生产办公室（副主任）打成漏划右派，妻离异。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去世。

（重庆市委宣传部共划了22名右派，目前尚有三名不知情况）

30、杨正木——重庆市团市委右派。因带病劳动，身体衰竭而死（约1963年），终年30多岁。

31、郑永康——四川灌县人，1920年7月生，大学文化。1958年3月在重庆市团市委打成右派。1979死于长寿湖。郑无家无室，终生孤身一人。

32、陈 璉（女）——重庆市团市委右派，文革前病逝于长寿湖，终年30岁。

33、肖莲蓉（女）——重庆市妇联干部，1957年时20多岁（长寿湖另一右派余薇野之妻）。她在鸣放会上讲：我们国家不必什么都跟苏联学。例如，有些幼儿园买不起风琴，就不一定非学苏联，每个幼儿园都配。另外，她还说，福利部的部长很少上班，一切事都是她在干。肖莲蓉因“反苏”和“企图篡党夺权”被划为右派。

34、陈思贤（女）——重庆市妇联干部，1957年时20多岁。鸣放期间，陈正在医院生小孩，妇联党组织派人去医院征求意见，她提出自己一直参加党组会，但没有正式进入党组，希望能成为党组的正式成员。陈以“篡党夺权”罪划为右派。

35、杨映雪（女）——重庆市妇联干部，1957年时20多岁。杨是由街道积极分子调入市妇联工作的干部，她只有初中文化，工作非常积极，开会时喜欢读报纸。一次，她读西师董时光的文章，声音很大。董时光被打成右派之后，杨便被说成是赞成大右派观点，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杨因此被划为右派。

36、唐尚灵——重庆市劳动局右派，1928年生。北碚乡村教育学院毕业。“改正”时他说：“我不要‘改正’，我当年提的意见是正确的。”唐已去世。

37、欧洲如（儒）——重庆人，1919年10月生。高小文化。重庆市劳动局右派，下放长寿湖后又放回农村。欧已去世。

38、罗仁俊——重庆市劳动局右派，北碚乡村教育学院毕业，劳动时手致残，2000年去世。

39、廖品云（女）——成都人，1928年2月生。大学文化，重庆市劳动局右派。与丈夫刘宗钦为同场右派。

40、顾学义——浙江人，1930年5月生，参加西南服务团入川，高中文化。1958年在中共重庆市监委打成右派。顾学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去世。

41、付 涛——重庆市委组织部右派（未到长寿湖）。

42、陈 宇——广东人，1930年9月生，参加西南服务团入川，高中文化。1958年3月在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党群干部处（干事）打成右派。已去世。

43、王锡雯（女）——重庆市委组织部右派。

44、聂承奎——重庆市委办公厅右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去世。

45、成世忠——重庆市财经委右派，饥荒年死于长寿湖。

46、郝永吉——抗战时期的老干部，曾任重庆市北碚区区委副书记，右派，去世时间不详。

47、胡道成——重庆市工交部右派，死于南桐矿区，具体时间不详。

48、龚明谦——重庆市轻工局右派，2000年去世。

49、李达白——重庆市公用事业局右派。

50、苏朝纲——湖北人，1928年11月生，大学文化，重庆市委直属党委右派。

51、陈朝芳（女）——重庆市委机关干部，右派。

52、余华光——重庆市工业部右派。

53、朱丰衍——浙江人，1928年4月生，大学肄业文化，参加西南服务团入川，重庆市委直属党委右派。

54、林伯力——遂宁人，1922年2月1日生。重庆市委办公厅右派。

55、周远照——湖南人，1919年3月生，大学专科文化，重庆市图书馆右派。

56、徐显镛——女，贵州人，1918年12月生，大学专科文化。1957年在重庆市体委打成右派。独身一人。2007年去世。

57、陈本华——大竹人，1920年11月生，大学文化，1958年3月在中共重庆市委干部文化学校（即党校，教师）打成右派。工资33元。有妻、三子、四女。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去世。

58、杨建——重庆公安系统右派

59、陈适情——重庆南岸区委宣传部科长，右派，估计1958年投江自杀。

60、梁耿法——上海人，1930年11月生，大学一年级文化，重庆市委党校右派。妻离异，有一女。

61、刘守荃（女）——政法系统右派，具体情况不详。

62、王孝社——重庆市农业局工程师，右派。

63、张骏——情况不详，死因不详。

64、萧思辉——重庆人，1928年5月生。大学肄业文化。1958年在重庆市九龙坡区法院打成右派。

65、张健——市委党校右派。

据《重庆市长寿湖联合企业公司大事记》记载，到1964年4月，长寿湖还先后接受了1030名下放干部。他们中也有人永远“留”在了长寿湖。如该“大事记”记载：“1960年6月19日下午6时，三台生产队队员乘木船返队途中，船漏下沉，淹死下放干部左文和（女）、华长灿、陈在荣、卢圻章、刘运杰等五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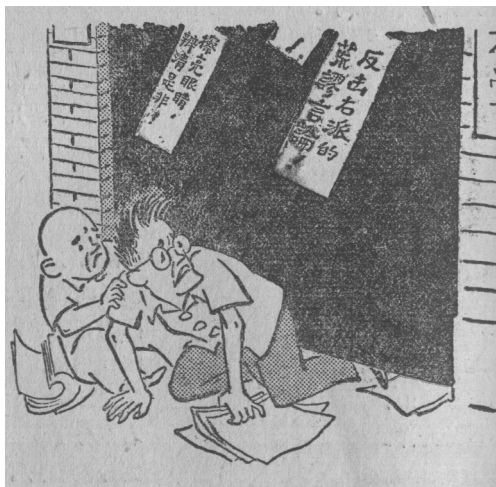


长寿湖幸存右派李正、李长文、罗报群、郑大同、顾大鸣
2009年5月1日在长寿湖（谭松摄）

十一、唉，教师

在长寿湖的“分子”中，教师群体人数众多，死亡人数也众多，今天，幸存者中心有余悸的也众多。这似乎是一块最重的灾区。

- | | | |
|--------|--------|--------|
| 1、宋节文 | 2、刘 晶 | 3、李 铮 |
| 4、黄伽佛 | 5、李太璞 | 6、李国元 |
| 7、李 淦 | 8、邬绪昌 | 9、白永康 |
| 10、陈祖翼 | 11、向光棣 | 12、曾永臧 |
| 13、余洪洲 | 14、陈 英 | 15、汤儒君 |
| 16、常 青 | 17、刘淑明 | 18、杨和钰 |
| 19、黄 涛 | | |



1957年反右漫画

这辈子完了，下辈子还教书

宋节文

1957年重庆教师进修学院地理教师

1920年生



宋节文不同意照像，这是她放在冰箱上的她丈夫的遗像和她献的鲜花

1946年我从四川大学地理系毕业，毕业后一直教书。

1957年，我在重庆教师进修学院。鸣放时，上面再三动员给领导提意见，我拗不过，提了两条：一，希望分管文教卫生的副市长邓垦（邓小平的胞弟）不要用小轿车送孩子上学，本来也没几步路。二，请领导多关心职工。我说了一句：“不要高高在上，下来吧，了解人间疾苦，不要在人们心里留下阴影。”后来，说我“放毒”，污蔑共产党，说党在人们心中留下阴影。我急忙申辩：“我的原话还有‘不要’两个字。”但没有用，给我定性为反革命言论。好在我出身好，解放前是贫苦孤儿，又加入过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参加过反对国民党的学生运动。因此，一直没有给我戴右派帽子，只是说我中间偏右。

运动中还强迫我揭发另一位教师宋兰馨反党，领导说，这是向党组织靠拢的实际表现。我说我不能无中生有，不能为了入党出卖良心。为这事又挨了一通斗。

1957年那一幕让我觉得很丑恶，我决心不问天下事，埋头去读书。我打定主意报考研究生，一头扎进书堆里，亡命复习，志在必得。咳，领导说我走白专道路，把我抓来关在教室里，整整关了两个多月，彻底断了我的考研之路。

1959年5月，学校突然通知我到法院受审。原来，学校已将我告到法院，说我隐瞒反革命历史。我站在法院被告席上，听见法官指控我1938年参加了国民党外围组织“反共铁血团”。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摸不着头脑。

我有些恍恍惚惚了，心想，这是不是梦？我怎么会站在被告席上，这肯定不是真的，一定是梦！但梦怎么老不醒，我用手指掐我的手膀，觉得痛。

法官逼我交待，我争辩说：我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反共铁血团”。法官气汹汹喝道：“这正是你最狡猾的地方。”我解释说：1938年我才17岁，刚刚读高一。只在班上加入过三青团，当时是抗日期间，抗日活动我都参加，三青团也抗日，里面有许多积极抗日的热血青年。

法官宣称他们掌握了人证物证，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性定案，判我“管制三年”。

我不懂什么叫“管制”，我是个书生，一直和教室书桌为伍，不懂法，也不懂社会，以为“管制”是一个什么纪律处分，不晓得那就是判刑。判我时，没人帮我说话，进修

学院凡是有良心的领导都被反右运动扫荡干净了。我一个弱女子，没办法，只得卷起铺盖卷去缙云山劳改农场接受“管制”。

劳改也要填表，有人认为“反共铁血团”属于国民党军统，于是我就承认是军统，另外的人认为属于“中统”，我就只好填“中统”。解放前国民党说我是共产党，要抓，我跑脱了；解放后共产党说我是国民党，也要抓。

我丈夫齐东野是进修学院的总务主任，他先在北京清华大学，后在山东青岛大学读书，毕业后教了多年英语。他受我影响，被迫辞职，前往市六中教书。他叫我安心去接受“管制”，两个孩子由他带。他一点没埋怨我，他坚信我是无辜的。

我在缙云山“管制”了四年，为啥多一年我也不晓得。释放后，我被发配到北碚文兴场。派出所的所长看我档案，一头雾水，他问：“你到底是‘军统’还是‘中统’？”我说：“我也不晓得，我是个傻乎乎的饭桶。”他说：“我看你也是，17岁的中学生了，加入特务组织，军统、中统都分不清。”

我怎么分得清？！“反共铁血团”是个啥，我一辈子都不晓得！

我被释放时，丈夫已经被贬到北碚文兴中学，原因是六中作了一个硬性规定：凡是家属有问题的教师一律不准在六中教书，他只好到乡镇中学。

我释放没几天，学校突然宣布我属于“压缩”人员，把我一脚踢了出来，我没钱，没工作，成了靠丈夫养活的家庭妇女。

我说几句我丈夫齐东野。老齐是安徽人，高中加入中共地下党，曾经担任安徽桐城县共青团书记。在一次转移武器弹药中子弹爆炸暴露了身份，被迫逃亡。他隐姓埋名，躲过了国民党的通缉，最后在北京和山东完成了学业。抗战期间他流亡到四川成都，迫于生计，到国民党空军通讯学院当教员，教英语。我是通过我的一位老师认识他的，他帮我补习英语。他爱上了我，我也爱上了他，我觉得他有才学，人正直，而且还长得很帅。抗战胜利那一年，我们结了婚，婚后，我俩感情一直很好。解放后我把他拖得惨，他从没怪我。

抗战期间那段历史，老齐对党组织交待得清清楚楚，解放后一次次政治运动，他都安然无恙。“文革”一来，有人找出他在通讯学院教书那段历史，认定他是叛徒，是国民党特务。天！无休无止的斗呀打呀抄呀！红卫兵进我们家就像进茶馆，随便得很，东西也是随便拿，看上什么拿什么。我家所有的钱和值钱的东西全被抄走，连厨房的菜刀、房里的灯泡都不剩。他们骂：“你们一家坏蛋只配呆在黑暗中，还想要光明？还想拿菜刀造反？”

我们全家在黑暗中过了几个月，做饭用水果刀切菜。

老齐是个硬汉子，不管怎么斗，坚决不认罪。那个年代，老师和学生都疯狂。学生打老师，老师也互相斗。有一位姓杨的老师常来找老齐补习英语，文革一来，他首先出来揭发，说老齐对毛主席像不尊敬，煽动红卫兵用石头把老齐打得鲜血长流。还有一位教地理的袁老师，是老齐的朋友，他家经济困难，时不时找老齐借点钱，文革中，斗老齐最狠的人就是他，你说怎么回事？

有一天老齐回来情绪非常激动。那天，学生逼他去打其他“牛鬼蛇神”的耳光，逼

他的人是他亲自教的学生！老齐坚决拒绝。学生便逼一位体育教师逐一打他们的耳光，然后又令他们每人打体育教师两耳光。学生们在一旁欣赏噼噼啪啪的耳光声，开怀大笑。老齐回来后气得在屋里乱转，连连说：“这是为啥？！这是为啥？！”

1967年10月16日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那天半夜，一群人风风火火闯进来，把老齐从床上抓走，我追出去，看见来人都提着枪。我浑身一震，大叫：“齐东野没有犯死罪！齐东野没有犯死罪哟……”我话没说完，两只枪把我逼回屋里。我从窗口望出去，看见外面操场上人来人往，一片杀气。我急得在房间里来来回回乱走，像陷阱里的野兽。我全身绷得紧紧的，心乱跳，生怕听到枪声，每一秒钟都可能传来枪声！那是我丈夫啊！我完全束手无策，我一个劳改释放犯，一个弱女子，不晓得怎么才能救他。老齐被打成叛徒后，朋友们都不往来了，不落井下石就算好的了。在那个夜晚，我刻骨铭心地体会到什么叫绝望，什么叫走投无路。最无助的时刻，我突然觉得，只有求冥冥之中的神灵了，只有上帝能保佑我了。我“咚”的一声跪倒在地板上，一瞬间变成了个信仰神的信徒。你看我冰箱上供得有一个神像，我就是从那一晚上变成一个有神论者的。

世界上为什么会有宗教？那是人在最无助最孤苦最凄凉时的唯一依托。这个道理，我也是在那天晚上明白的。

那一夜我不停祈祷，没有听见枪声。

下半夜，门外有响动，我打开门，见地上爬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没有电灯泡，我看不清，以为是条狗。突然，“狗”朝我扬起手，“节文，拉我一把。”我吃了一惊：“你怎么了？”“摔了一跤。”他镇定地说。我慌忙把他拖到床上，问他伤在哪儿，是不是腿被打断了。他一声不吭。老齐这个人很倔，他在红卫兵面前一直坚守知识分子骨气，在我面前也一直保持男子汉大丈夫的形象。他下不了床，痛得浑身是汗，绝不哼一声。我们俩都是“坏人”、“反革命”，不敢去任何医院，没有任何人表示同情，没人愿意来抬老齐。其实，去医院也没用，那时，哪个医生敢给一个反革命分子治病？最后只有一个私人医生来看了一下，发现是股骨打脱臼了。但他没有接骨技术，也没药，所以，老齐直到死，股骨都没有接上。

接下来的几个月是最悲惨的日子。家被抄得一贫如洗。本来我手中还有一个存折，上面有300元钱。那是在抄家时，老齐的一个学生悄悄摔还给我们的，我一辈子都记得。我不敢去取，怕被发现后说我隐瞒财产，又要挨打。

没有药，没有营养，老齐身体垮得很快。我把抄家后剩下的所有书籍全部卖给废品站。

说起这些书，又是一把伤心事，我和丈夫都是嗜书如命的人，文革前搬家，共8个箱子，其中6个都是装的书。老齐的外语书很贵，有些很精美，红卫兵看见好的就拿，或者把一些漂亮插图撕下来带走。老齐为此气得长吁短叹。现在，剩下的全当废纸卖。

书卖了几十元钱，我给老齐买点鸡蛋，他舍不得吃，一个鸡蛋分成两半，一顿吃一半。

还有，我们房子很小，灶和水缸等都在门外，有些人欺侮我们是“牛鬼蛇神”，晓得我们不敢吭声，经常在我煮的饭中撒沙子，撒虫子，往水缸里撒尿，恶作剧。

一天，北碚军管会来通知，要老齐到北碚交待“国民党特务”问题。老齐站不起——那天晚上回来后他就再也下不了床。但他坚持要去，他说要到那儿去说清问题。没有人

愿意抬他，他只好趴在儿子身上，一步步往外挪。儿子只有14岁，体弱，十分吃力，老齐不忍心，尽量支撑，在离公路只有几米的地方，他倒在地上，再也起不来……

军管会的解放军马上通知学校，学校叫了几个“牛鬼神蛇”把老齐的尸体抬回来。就是这个时候，最令我发疯的一幕发生了。

学校一些人不准尸体放在家里，他们说：“不准放家里，你们搬走了，哪个敢住停过死人的房子。”按规定，老齐死后我们一家人再没有权利住学校的房子。

我只好提出将他停放在操场上的台子上，又不准。那几个抬尸的“牛鬼神蛇”不耐烦了，将老齐的尸体往操场上的沙坑里一抛便撒手离去。

我不知如何是好，赶紧跑去找人。这时，一群十多岁的娃儿跑来，一边大叫：“国民党特务”、“国民党特务”，一边将粪便和石块往老齐身上扔。有一个娃儿掏出一把小刀，割老齐的耳朵。有位认识我的当地农民看不下去，跑来叫我：“宋师母，宋师母，他们在割齐老师的耳朵。”

我一听，“轰”的一声，头炸了。我从家里抓一根竹棍，朝那群学生娃冲去。我一边挥杆乱打，一边声嘶力竭地大叫：“我和你们拼了！拼了！我拿我的命换你们的命。我的命不值钱，来！来！我们来拼命！”

那时，我觉得一切都无所谓了。

那群学生娃退了，远远朝我掷石头。

（宋节文眼中闪烁泪光，但泪水没有流下来）

我丈夫生前仪表堂堂，真的一表人才，一表人才呐。

还没完！学校转眼间贴出的一幅大标语：“叛徒、国民党特务齐东野畏罪自杀！”

“畏罪自杀”又是一个罪，要罪加一等。

我赶紧找到老齐断气时在场的解放军，求他们证明老齐不是自杀。那几个解放军还不错，马上就派医生来做尸检。尸检的结果，发现老齐身上共有32处伤痕！那条断腿可以旋转360度！

老齐去世后，我断绝了唯一的经济来源，学校赶我走。那时，正遇到国家安排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快50岁了，也安排下乡。我和儿子一起下到与陕西交界的南江县，大巴山深处一个荒凉闭塞的山村。

老齐去世前头一天曾经对我说：“如果我不在了，组织上肯定会关照你，估计每月至少会给你40元，节约一点，也拖得走。我们的事一定会水落石出。”

他说这话，大概感到自己不行了，他认为学校会给我生活费，共产党不会不管。

在大巴山我呆了整整10年，老齐预言的40元钱一点影子都没有，我穷得一塌糊涂。有一年，我六个多月没沾过一滴油，心中发慌，平白无故流口水。我去找大队赤脚医生，他断定我肚子里有蛔虫，给我一剂打虫药，结果蛔虫没打下来一条，把我打倒在床上睡了三天三夜，差点把命除脱。

在大山里，我也属于被管制分子，不准“乱说乱动”。我成天不说一句话，没有人知道我有文化，没人知道我是大学毕业生。

那一带山区文化教育非常落后，教师乱教，学生乱读。“惭愧”读作“见鬼”、“淳

谆教导”读作“哼哼教导”，我不敢吭声。

由于教师奇缺，大队小学校长非要我儿子去教书。我儿子吓得跑，他初中是混出来的，哪里敢上讲台。我对他说，怕啥，我在背后教你，这样我儿子才答应了。一个多月下来，儿子教得很好。校长高兴得很，儿子告诉他，这全靠我妈，这一下暴露了我有文化，校长缠上我，非要我出来教书。我不敢，怕挨斗。校长反复说，不得整你。我还是害怕，最后我要求，要我教书必须全队贫下中农表态同意，保证不揪斗我。

校长果然把贫下中农找来，他们一致表示同意，这样，我又登上了讲台。

我当时好高兴好幸福，我这个人最喜欢教书，下辈子我还愿意教书。

大巴山的农民朴实，红白喜事都请我这个老师，还要我坐上席。我不敢，农民说，怕啥子，我们不懂啥子“分子”，只晓得天地君亲师，你该坐上席，坐！

我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教学上，我所教的小学从公社最后一名一举跃为除公社小学外成绩最好的。人们这才晓得我是大学生毕业生，而且是全公社唯一的大学生，全县唯一的地理本科生。

我一直教到1980年。

一天，负责管制我的特派员从公社给我带来一卷报纸。他叫我看，如果有话要说可以到公社去找他。

读了报纸，我才知道外面已经发生了大变化，在搞平反冤假错案！

我本来已经认命了，打定主意老死山里。儿子劝我去问一问。

第二天，我走了几十里山路赶到公社，我对特派员详细讲了我当年被判管制三年的原因，然后请教他：“你看我这种情况可不可以回去申诉，如果你觉得可以，我就去，不可以，我就回生产队，绝不翻案。”

他认为可以，于是，我十年来第一次回城，找有关部门上访。

（注：“找有关部门上访”又是一个长长的、曲折而心酸的故事，宋老师又讲了近一个小时。这段经历简单地说就是：当初三言两语把一个人打入地狱的法庭和官员们，不肯为她平反，他们以未明确将宋划为右派为名，认定她不在平反改正之列。宋老师上上下下奔波、申诉了整整两年，一家人的冤案才得到平反。

这时，宋老师已经62岁，重返讲台是下一辈子的事了。）

采访时间：2001年4月28日 地点：重庆市渝中区

采访后记

宋节文不是“长寿湖分子”，而是“长寿湖分子”刘淑明的好朋友。

刘给我推荐了她的两个苦难朋友：宋节文、宋兰馨。后者身体已经很差，表示不愿提过去的伤心事，因此拒绝采访。

开门的是一位满面皱纹的老妇人，81岁的高龄使她身子收缩成10来岁儿童的高度。

她背微驼，衣服陈旧灰暗，但那目光和表情十分活泼生动，举手投足也麻利，尤其是她的声音，非常清晰，非常流畅，我惊奇不已。

她的家是我所采访的“分子”中除白永康外最小最差最穷的。几平方米的一个小客厅既不通风，又不透光，白天也得点灯，空气沉闷，十分压抑。唯一的一间卧室隔成两半，外面住她孙儿，里面（又是不通风，不透光）归她住。

宋老师最神圣的两件东西只能放在一个破旧的冰箱上，一是她丈夫的遗像，二是一个瓷做的菩萨。遗像后面插着一支艳丽黄花，那是这狭窄而灰暗客厅里唯一的鲜活亮色。

“我一直坚持每天给我丈夫送一朵鲜花。”宋老师一边说一边深情地望着冰箱上的像。

照片上，她丈夫齐东野仪表堂堂，儒雅而又帅气。

她讲起往事，语言清晰而流畅。我有些喘不过气，全身僵硬一动不动，然而宋婆婆却能以一种超然而轻松的语气来讲叙，有时甚至还发出幽默的笑声。除了讲到丈夫去世时她声调激昂泪光闪烁之外，她仿佛是在讲一个别人的故事。

是苦难太多太重太久以至不觉得太痛，还是她早已皈依佛主，获得了一种超越苦难的力量和心境。

她告诉我，她很喜欢说话，但从大巴山回来后好长一段时间，她都不会说话，也害怕说话了。现在她又能滔滔不绝地说，也不怕说，但是却没有人听了。她还说，她最喜欢教书，这辈子被耽误了，下辈子她还当教师。

她说这些话时，神情坦然，毫无惆怅、失落之感。我想起前两天采访重庆日报的詹光和四川外语学院的姚谷时，他们露出的那种感叹和感伤。

我被这位 81 岁的老妇深深吸引。

还能再找到这种女性吗？她们拥有才华而不自傲，她们遭受苦难而不沉沦，她们一生贫穷而不抱怨，她们面对诱惑而不动摇，她们惨遭迫害而不忘奉献……

善良、温柔、勤俭、质朴、爱心、奉献这些中华民族传统女性的美德将会随着宋婆婆一同衰老，走向死亡？

告别前，我提出想看看她过去的老照片。她说，老照片在“文革”时都被毁了，只剩下一两张。

一张是她在四川大学读书时照的。她站在锦江边，亭亭玉立，丰满而漂亮，整个人散发出强烈的青春气息和书卷味。她向河的上方望去，目光和神情清纯而恬静，仿佛带着少女对未来玫瑰般的梦幻。

她知道前面等待着她的是什么？

我目光从照片上的青春少女转向身边的衰弱老妇，与这两者相连的，是刚才听的那一段历史。

宋老师送我出门，我低头望着这位缩小为 10 来岁儿童般高的老妇，心中充满了敬意和爱意。她在我眼中蓦地变得高大，变得丰满而美丽。

宋老师说过，下辈子她还教书。

下辈子？如果有下辈子的话，我一定会爱上——一个像宋老师一样的女人。

（2001 年 5 月 1 日）

补记一：

2003年9月21日，我去参加长寿湖幸存右派一年一度的聚会，遇见刘淑明，她告诉我，宋节文因肺病于2002年7月去世，刘说，宋老师长期住在那间昏暗沉闷不透气的房间里，健康受到很大影响。

我永远失去了再一次去看望这位可敬老人、这位伟大女性的机会。她在我被关押的日子里走了，一去不复返。

2002年春节，我打电话给她拜年，她的声音依然那样的清脆、那样悦耳、那样充满了活力，她热情地邀我去她家，并答应把她丈夫和她毕业的那张照片借给我。谁想到，仅仅几个月，她就走了。

她心爱的丈夫齐东野会在另一个世界里迎候她吗？她捧一束花，沐浴在圣洁的光辉里，金风四起，圣歌低回……

（2003年9月25日）

补记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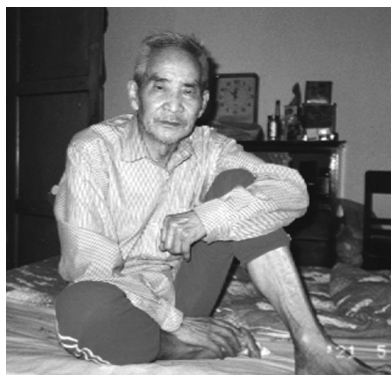
我录下了宋节文老师的整个讲述，她的声音和情感非常饱满、非常感人，可惜录音（连同所有70余人的录音）被重庆市国家安全局抄家时搜缴。

生命是文化的载体。在共产党建政以来的半个世纪中，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迫害和思想整肃运动延续至今，在这连绵不断的政治迫害和思想整肃运动中，那些承载着中国文化之魂的高贵的生命被摧残殆尽，随着他们死去的，正是中华的文化之魂。 ——袁红冰

吃饱饭比什么都重要

刘晶

1957年重庆市42中语文教师



1979年我从监狱里出来，就打定主意不提过去的事。我这一辈子够麻烦的了，家破人亡。我很少跟人来往，长寿湖那些人聚会，每次约我，我都不去。当年那些右派，天天汇报，你整我，我整你，右派也不是一个单纯的群体，你要多加小心。你搞这事，可能给我惹麻烦，也给你和你家人惹麻烦。还有一年多我就满80，人老了，感到悲哀，什么都完了，无能为力。出狱后我新建了个家，我要替她们着想。我一辈子过点安宁日子，尤其是还能吃饱饭的日子不容易。不怕你笑，我这辈子是饿怕了，直到现在我都觉得吃是最重要的，比爱情、自由都重要。

我在上海读的中学，1949年我在重庆大学法律系读最后一年。解放后，由于我家同张澜的关系深厚（张澜时任“新中国”第一届中央政府副主席），他为我担保，证明我政治上没问题，这样我进入了北京新闻学院学习，在那儿学了点马列主义，换换脑子。毕业后我分回重庆，先在川东报任编辑，一年多后同另一个编辑颜白岩一起调入新华日报。

别人很羡慕我们，说我们俩是幸运儿，前途远大。其实，我正是在那儿尝到了共产党等级制和阶级偏见的厉害。新华日报是共产党的一个缩影。我们两个“幸运儿”后来都成了右派。

在新华日报社，只要是延安来的、老区来的，不管会不会写作，都高人一等。出身好的，受重用，出身不好的，受歧视、受排挤。还有，小学文化比中学文化受重用、中学文化比大学文化受重用、解放后毕业的知识分子比解放前毕业的知识分子受重用，最底层的是那些历史上有“问题”的“留用人员”。之所以留用，是因为这些人很有才学，一时离不开。

我出身不好，全靠张澜的政治担保。我不是党员，日子不好过，出去采访，人家材料都不给你看。“留用人员”比我还难过，又要用他们，又要打压他们。

我很想当记者外出采访，我向领导提出，领导冲我一瞪眼：“你想要的事情就是不满足你，哪一天你非常热爱编辑工作，不想当记者了，我就调你去采访。”你看看，偏偏跟你反起来。

在我这个等级上，不仅工作上不受领导重用，生活小事上也受影响。例如，聚会时领导发烟，就不发给我和那些“留用人员”。我觉得很压抑。

有一天，单位一个叫卢XX的女职工在办公室哭，我问她哭啥子，她说，人事处通知她，

叫她过两天到北京外交学院学外语。她不想去，她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字母都认不得，肯定学不走。还有，她孩子小，不想远走，但领导非要她去，说要培养自己的可靠人才。

我真的绝望了。报社那么多外语人才，只因为是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就认为不可靠，打发去干杂活，清理资料、发放报纸。这样的报社还有啥意思？

一气之下我决定出家当和尚！

我先跑到市中区的罗汉寺打听出家的规则，然后选择了峨眉山，最后正式向领导提出。

我也太天真了，领导既然可以不要我当记者，当然也可以不准我当和尚。

我去意已决。1955年，我调到四十二中当了语文教师，我以为当教师单纯些。

哪晓得学校照样讲出身、讲等级！

教师中排在最底层的，仍然是那些有点历史问题的人，那些啥子历史问题嘛，现在看来好笑。但那时他们话都不敢多说。

有一件事对我刺激很大。我是一个毕业班的班主任，毕业前，校长专门来对我说，哪些学生考得起，哪些学生肯定不行。我很奇怪，校长说考得起的学生中有的成绩很差，其中一个已连留了两级，而校长说肯定不行的学生中有两个是班上最优秀的，成绩好，又是学生会副主席。校长说，这不取决于成绩，那两个学生的家庭有历史问题。

我不信。

后来的结果完全如校长所言！那两个落榜的优秀生跑来找我，当着我的面放声痛哭。一边哭，一边说：“刘老师，刘老师，这是为什么？！”

作为一个教师，看到自己所教的优秀学生遭遇这种不公正，心里又气愤又难受。我忘不了那两个学生哭红了的眼睛。从那一刻起，我就变了，这个革命我受不了，这个新社会我理解不了。出身不好，没前途，学生老师都一样。

从此，我也同那些出身不好的教师一样——变得沉默寡言。

1957年我并没有鸣放，是一个意外断送了我。

那一天我上了三节课，下课后在食堂打了一份姜爆鸭子，准备找个地方享用。正巧，校长瞿XX在一旁吃饭，他招呼我：“刘老师，来，来，来，一起吃。”平时我同他没多少话说。瞿校长虽然还不到30岁，但很有政治资本，其中最显耀的是他曾经在北京见过毛主席，这使他在学校很有些飞扬拔扈。

我坐到他身边，他问我：“刘老师，这段时间读报没有？”

“读呀，再忙我都坚持读报。”

“那你读到西师董时光的那篇文章没有？”

“读过。”

“你觉得怎样？”

“写得不错。”

“具体一点。”

“董时光是抱着满腔爱国热情从美国回来的，那边物质生活好得多，他之所以回来，就是要报效祖国。他回来后觉得发挥不出来，课都不让他开，支部书记对他爱理不理，他有些牢骚，很正常。”

“还有没有？”瞿校长追问。

“哦，对了，文章写得漂亮，文采飞扬，连标点符号都用得十分准确。”

我哪晓得董时光刚刚被打成右派！但瞿校长晓得！

第二天，批判我的大字报就出来了，接下来我就成右派了。

党组织一旦把某人宣布为坏人，他的一切都完了。还没有停我的课，学校就规定，我上课学生不起立，不准叫我老师，有问题直接叫“刘晶”。课间十分钟休息，还要求学生唱首歌“右派是个大坏蛋”，你说叫我哪个上课？还有，同事们像避瘟神一样避我。有一个晚上我睡不着，看见我朋友张伯良的窗户还亮着灯，便推门进去。张伯良两弟兄都在学校，教美术的，他哥俩以前是故宫博物馆专家，因为有点啥历史问题被贬到四十二中。张老师一看是我，脸都白了，连连说：“刘晶，你不要来好不好，做点好事。我给你作两个揖，你赶快出去，你要啥子我都给你。”

他怕得很，也难怪他，一举一动都有人向党组织汇报，积极分子多，党的耳目多。但他们哥俩还是没躲过，双双被打成“反革命”，驱逐出学校，死在哪儿我就不晓得了。

后来我干脆不在学校食堂吃饭，自个去外面的小食店。在家里也难过，老婆埋怨我，说我给全家带来灾难。女儿进幼儿园，人家一听是刘晶的女儿就不收，只得把她的姓改了。直到现在她都不姓刘。我妻子是国民党政治大学新闻系毕业的，我同她结婚就是偏不相信那个“阶级斗争”。我们1956年结婚，1959年离婚，唯一的女儿跟她走了，至今没有往来。

有一天突然把我们右派分子集中，弄到郊外白市驿去劳动，几天后回来才明白，毛主席来了重庆，为了保障纯净，右派不准呆在市内。还有一次到南开中学集中学习，市委宣传部长张文澄劈头给我一顿臭骂，骂我忘恩负义，党送我去学习，我竟然认贼（右派董世光）作父。嘿嘿，仅仅几天，张文澄自己就当了右派。共产党真的笑人得很，像演戏一样。

最使我难过的是我的一个学生因我而失去自由。其实那个学生同我并没有任何特殊关系，我连他的名字都想起。他说了一句“刘老师没啥错，只不过乱说了几句。”就为这话，他被开除送去劳教。当时他才14岁，14岁呀！

（整个采访中，刘晶只有此时眼中依稀闪出泪光）

去长寿湖之前，我的手表等物品已经在南桐变卖换了吃的。说是转到长寿湖吃得饱饭，屁！照样饿得要死，还多了一个“汇报”，汇报不多说，讲几个挨饿的经历，1961年，重庆市委的几个领导来长寿湖了解右派的改造情况，场部备了一桌酒席款待。市领导酒足饭饱后到隔壁房间休息，桌上还有些残汤剩水。我们一群右派分子，早就守候在门外，市领导刚离席，轰的一声，我们一窝蜂扑上去，叮叮当当呼呼噜噜，桌上桌下都在抢。有的抢了一个馒头，塞在嘴里哽得满面通红，有的捧起一碗残汤咕咚咕咚喝得两眼翻白，还有的一只手抓一把剩菜往口中塞，另一只抓一根骨头往怀里揣……

我体弱，好不容易抢到一根骨头，不晓得是哪个，混乱中又把骨头抢走了。那个场面，就像电视上的《动物世界》。

声音惊动了市领导，他们走出来，很不理解地说：“你们都是知识分子呀，XXX，你以前还是个副部长，怎么到了这种地步？”

他们要检查“改造效果”，这就是“改造效果”。说什么屁话：劳动改造重新做人，劳动改造整死人！

1960年中秋节前两天，我们收工回来路过一个生产队的队长家。不一会，队长跑来找找到指导员江渭滨（江渭滨下放前任重庆某中学总务主任），说他打的糍粑少了一块，一定是右派偷了。

江指导当即将全部右派集中，在地坝上站成一排。

“是哪个偷的，站出来！”江指导喝问。

右派们都不承认。

“好！不说今天不准吃饭，全体站在地坝晒太阳！”

右派们沉不住气了，七嘴八舌地说：“是哪个偷的，坦白嘛，不要害得大家吃不成饭。”“好汉做事好汉当，站出来嘛！”

磨了一阵，顾祖鏢走了出来，顾是重庆20中的教师右派。

“糍粑呢？”江渭滨问。

“吃了。”

顾祖鏢挨了顿打，不过打得不狠，要命的是不准他吃饭。

第二天早上，顾祖鏢躺在床上不起来，我问他：“你今天不出工？”

“我没得力。”他说。

“你请假没得？”我问。

“没有。麻烦你帮我把我的糖从床头上那个包里取出来。”

“你各人取。”

“帮一下嘛，我没得力。”

我帮他取出糖，一粒一粒的数到他手头。“看好，一共四颗，当面点清，免得少了怪我。”

中午，我收工回来，他还躺在床上，我走上去摇他：“你睡一上午，也该起来了。”

没有反应，我又摇。

还是不应，我定睛一看，发现他的身子都冰冷了！

顾死后还开了一个“缺席审判大会”。“缺席”，是本人已死；“审判”，是还要受批判。

我们聚集在地坝批判顾祖鏢，一个接一个发言：

“右派分子顾祖鏢是想以死来向共产党示威，想证明共产党不好，饿死人，其用心何其险恶！”

“顾祖鏢是有意同共产党作对。毛主席认为每人每月15斤粮够吃了，顾祖鏢一个人偏偏不够。他不仅偷糍粑，更为恶劣的是，他还以死来给共产党抹黑。”

“顾祖鏢以死抗拒改造，死了，我们也要批判他，不能让他险恶用心得逞……”

（1961年的中秋月亮，照见地球上这种奇怪动物。）

你采访（19）57年的右派要多加小心呐，右派中也有很危险的人，说不定哪天你就被汇报了，给你和你家人带来不幸。告诉你吧，我进了监狱反而轻松一些，主要是精神上轻松，在长寿湖成天如履薄冰，到处都是汇报，右派整右派，动辄得咎。

说到动辄得咎，我给你讲一个“笑话”。有个右派，饿慌了，把卫生员发给他抹手的油膏吃了。卫生员把这事儿汇报给江指导员，我碰巧在一旁听见了，忍不住咧了咧嘴，他们说我是在笑，这下又闯祸，给我定个罪：刘晶胆敢嘲笑共产党，嘲笑共产党没让人吃饱饭。斗我一通倒没关系，最它妈混帐的是罚我每顿饭前站在凳子上唱首歌——“社会主义好”。

我每顿饭打了饭，胃里伸出爪爪，还得先唱“社会主义好”、“共产党好”。我一边唱，一边在心里骂：“好它妈个鬼！”

我被判为现行反革命，也是因为饿。

那是1962年。我有个好朋友叫邓祜曾，他是重庆四女中的教师右派。有一天，他找到我：“刘晶，你不是在上海读过书吗？”

“是呀，怎样？”

“海边是不是停得有很多船？”

“那当然。”

“是不是还有外国船？”

“有哇，怎样？想去找你妈？”邓祜曾是个混血儿，他妈是比利时人。

“是呀，看样子活不出来，逃出去吃口饱饭。”

“不可能，”我说。“别的不说，人还没走到上海，路上就把你饿死了！”

我们就这么闲聊了一下，没外人，哪晓得邓祜曾在悄悄记日记！他也不看看那是啥环境。他把这事儿记在日记上，上厕所时，笔记本掉出来，他没发现，不晓得哪个捡到本子，交给了监管人员。

我突然被抓去审问。

“刘晶，你胆子大呀，老实交待！”

我完全不晓得怎么回事。

“你不争取主动，要罪加一等！”

我根本没想到邓记了日记。

“刘晶！你企图投敌叛国！”

“没有哇，我哪里敢。”

“没有？！你同邓祜曾密谋的，他已经交待了。”

他们用同样的方式审邓祜曾，说我已经交待了，我们俩都没想到是日记本惹的祸。

这下跑不脱，我们两个双双成了现行反革命，罪名是“企图投敌叛国”。

我是重庆大学法律系毕业的，从来没学过可以因“企图”而判人徒刑。当然，我是国民党时代读的大学，共产党可以不管那一套。我的体会是，国民党还要顾一下脸面，讲点规矩，共产党连遮羞布都不要。

我们1962年被捕入狱，我被押到大凉山修铁路，后来在盐源县大山里的一个劳改农场。那十多年的故事就长了，又是一道风景，你看，我的脚就是在那里面致残的。我能出狱全仗邓祜曾的母亲，那位比利时老太太天天跑到中国大使馆去闹，要共产党还她儿子。大使馆说：“你说你儿子在哪点？”老太太答不出来，只晓得以前在四川。后来

这事传到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那里，赵紫阳过问了我们的案子，说了一句：没大问题，放人。

我1979年被放出来，出来前，法院找我谈话，我那时已经万念俱灰，早已不把自己的命当命。在监狱和劳改农场（盐源农牧农场），死人的事见得多了，今天还在同你说话，明天拖出去就枪毙了。每次杀人，都要把我们全体弄去看，叫“接受教育”。被杀的人也坦然得很，说：“我们死了有个好棺材——狼的肚皮！”山上狼多，枪毙了的人草草埋点土，都被狼掏出来吃了。这些事见多了，生死就无所谓。所以我敢指着法官的鼻子说：“还要到哪儿去找刽子手，你们！你们这些法官就是刽子手！”

采访时间：2001年5月15日、2003年11月17日

地点：重庆市第35中学

采访后记

经过长寿湖右派黎民苏的一番忙碌，打听到了刘晶的电话，又经过他的一番“动员”，刘晶勉强同意我去采访。

进35中校门，穿过操场，往后面的家属院走。

前面立着一位瘦骨嶙嶙的老人，背对着我，我走上前去。

“请问，刘晶老师家……”

老人浑身一震，倏地转身，满面惊恐瞪着我。

我吓了一跳。

半晌，他才说：“我是刘晶。”

刘晶的家在底楼，进门就感到拥挤、阴湿和一种压抑。他把我带到卧室，他盘坐在床上，那只监狱里扭残的脚直冲着我。

他劈头就说，我来搞这事可能要给他惹麻烦，他过点能吃饱饭的日子不容易，所以他不愿意多说，甚至不愿同长寿湖的难友往来。

然而，慢慢谈开，刘晶情绪变得激动，时不时有些压抑不住。可是，一见我拿笔记录，他马上有些吞吞吐吐，甚至嘎然而止，眼睛里又满是那种担忧和戒备。我感觉到，还有很多东西很多感想他没有说。

中午12点，刘晶送我出门，初夏的阳光暖洋洋地照在身上。刘晶看了一眼我的采访包，又看着我，那双眼睛郁郁阴阴。

后悔？担忧？

“你一定要小心哪，共产党越到要灭亡越是疯狂……”

我逃也似地挤上公共汽车，在热气腾腾的挤压中感到夜的寒凉。

（后来，我被抓后在看守所里老想起刘晶，想起他的提醒、想起他那双郁郁阴阴的眼睛。出狱后我又去看望了他，这次，我专门倾听了他在狱中的经历。）

这是劫难，没办法

李铮

1958年重庆三中物理教师



什么叫“在劫难逃”？

我这辈子的经历就叫在劫难逃。

我师范毕业后，进了国民党的教育局，还加入了国民党。解放后被整，不奇怪，不遭整，才是怪事。

1950年，我到学校去教书，在复旦中学担任理化科的教研组长，教高三物理，后调到市三中。刚解放时，我比较单纯，看到街上换旧币，秩序井然，而且很快就换完了。我认为这个新政府是个廉洁高效的政府。我一五一十向共产党交待了在教育局那段历史，共产党经过审查，作了结论：李铮1949年前是国民党一般党员，没什么问题，不予追究。

后来开展肃反，反胡风，反右，我觉得不对劲，自己是有点“疤子”的人，可能要挨整。我夹紧尾巴小心翼翼做人，不多说半句。1957年我平平安安过了，1958年眼看要过完。12月底的一个星期天，我正在家准备教改，突然来了一个人，把我叫出门，说：“由于你是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思想没改造好，要继续改造，组织决定你下放农村劳动改造，今天下午就走。”我说“好嘛”，没有表示一点异议。他走后，我赶紧把三个孩子叫回来，叫他们呆在家里不要动，然后立马爬上歌乐山把妻子找回来。那时我妻子已经是右派，被送到歌乐山上劳动，三个孩子都是由我带。

说起妻子当右派，也是活天冤枉。我妻子是个美术教师，根本不懂政治，她学校离家比较远，家里三个小孩，最小的三岁，又没请保姆，每天往返很累。她看见学校校长的保姆，日子过得比她还轻松，优哉游哉，就发了一声感叹，说自己还不如校长的保姆，为这句话她成了右派。

我把她叫回来后，把三个小孩推给她，还没来得及作安排，学校就催我上路。是一个军事教官把我押走的，当天我到了市中区凯旋路，在那儿集中，宣布我是反革命，但给了一个希望：改正好了让我回来。那天晚上，妻子带着三个小孩赶到凯旋路，我们最后见了一面。我的户口当天就下了，工资从90元减到50元，1962年又减到18元。

在南桐农村，最难受的是挨饿。我们分散住在农民家，农民本身很穷，我们每天只有5两毛谷子，做成米饭只有了3两多。劳动重，每天走四、五十里翻山越岭去背煤。路上饿得慌，看见挖小煤窑的农民煮饭，情不自禁围上去，向他们讨米汤喝，那样子跟叫花子差不多，说起都是知识分子，几个月前还在教室上课。最惨的是那些年龄大一些，

身体弱一些的教师，这样恶劣的条件下他们无法生存。南桐死人相当多，我所熟悉并亲眼见到的就有 20 多个教师，例如，十二中教英语的冯书光（音）老师和一中的教导主任都是那时饿死的。

他们子女来痛哭的那个场景才叫惨，但是无可奈何，死的都是“阶级敌人”，也就是说，不是人。

我之所以活下来，全靠我还年轻。南桐死人的具体情况，你最好找当时的管教干部江渭滨了解，他最清楚。

（注：我曾向与江渭滨一个学校的汤儒君打听过，汤也不知江现在在哪儿）

由于教师们南桐死得太多，那个整教师不遗余力的重庆市教育局终于发文，让幸存的教师全体转到条件较好（吃 25 斤粮）的长寿湖。这样，才有了 200 多名教师进入长寿湖的大行动。

长寿湖的定量粮比南桐多一点，但是蔬菜粗粮不及南桐农村。所以，长寿湖也饿死不少人。长寿湖最可怕的是精神压力，在南桐，劳动就劳动，住在农民家，没人来天天训你斗你，可以吹牛闲聊，农民还喜欢听。长寿湖有一批下放干部来当队长，当管理人员，这些人自身也有点什么问题，只是没戴帽子。他们要表现积极、进步，就死劲整右派和我们这种分子。劳动量一层层加码，搞高定额，还押我们晚上打火把走十几里路去“夜战”。稍不小心就挨训，如：“某某某，你给我站好，脑壳啄起！”“晚上不准睡觉，要开会。”“开会”是训话、批斗、揭发、你拱我、我拱你（互相斗）的代名词。每周要写思想汇报，要互相揭发，某人私下谈下了什么。话剧团右派金辉在摆龙门阵（闲聊）时说了几句有关苏联的话，被人汇报，管教干部李思强揪住不放，最后把金辉打成现行反革命，判 3 年徒刑。李思强后来也惨，文革时被造反派斗打，跳湖自杀。

1962 年市教育局把我们召回去，我还以为会回校教书，因为下放时给了我一个希望：改造好了就能回去。没料到教育局把我们全部除名，有的被打发回农村老家，一无所有，例如教师进修学院的尹从华、四十二中的郭绪昌。我留在农场，工资从 50 元减到 18 元。市教育局很左，那个林局长很左，他整了不少人。1979 年搞平反他仍然顶着不办，所以，教育系统有不少“分子”直到（19）82 年、（19）83 年才回到原单位，而且还全靠市委书记王谦鼎力相救。

文革时说我们是阶级敌人，没有权力过问文革的事，我们躲在岛上不出去，少了很多麻烦。那个时候我们去赶场，叫站倒不敢坐倒，造反派可以任意收拾我们，可以随便搜我们的身，看中我们身上的任何东西，一句话就得交给他，不给不行，要打你，抓起来斗。所以，我们这群“牛鬼蛇神”只好躲在岛子里。当时我们有个说法：在鬼的世界里还有一点人的味道，在鬼和人的世界里就毫无人味。

我们这批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历史上有那么一点斑点，在新社会里根本不敢乱说乱动，胆子小得很，只想规规矩矩做个老百姓，过点平安日子。如果我们有新的犯罪，可以惩罚。但共产党抓住我们解放前那点问题，反反复重整，几十年整个不歇气，每次都是因为那么点问题。本来，1952 年共产党审查后作了结论：没大的问题，不予追究。可是几十年都在追究！几十年整个不歇气！共产党说话不算话，说的、做的，两回事。这个党整人，古今中外历史上少有。还有，我的工资被克扣了二十多年，改正之后不补还，

我生活困难，劳动报酬极低，本来就不合理，单位给点补助，还要千声万声说：感激党呀，给我关怀呀……

话说多了！知识分子就是这样，感觉不对头，就要说几句话。说几句话，并不就是要造反，要推翻政权。就算想造反，中国有句老话：“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况且解放后中国知识分子哪里想造反，只不过说几句话嘛。政权、枪杆子都在你共产党手头，怕啥子嘛。我当年一句话没说，也挨整几十年，这是劫难，没办法，躲不脱的。

采访时间：2001年5月22日 地点：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

采访后记

李铮既认命，又想不通。

认命——谁叫他师范毕业后要进教育局，还加入国民党呢。（毛泽东也加入过国民党，任过国民党宣传部长，但那是毛泽东啊。）

想不通——已经把心掏给共产党看了，为什么要反反复复整几十年？

李铮想不通是因为他脑子中还装有人类文明的游戏规则，并用这种文明规则去对待一个中国文明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新事物。他如果认认真真读一下伟大领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痞子流氓的革命礼赞，就想得通了。

真正的冤枉可能是1958年12月的那一个星期天。一个代表学校“组织”的人来说一句话，就判了一个公民、一个教师不是徒刑的徒刑。

还有一个精彩的手法：上午突然宣布，下午立马走人。

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发动清除富农运动，手法一样精彩：一个人物（或几个人物）闯进“富农”家，说一句话，“富农”们立马上路。西伯利亚的冰雪狂风，替斯大林把猝不及防的“富农”们收拾得干干净净。

世界上很多东西可学，我们唯独挑选了斯大林和他的苏联社会主义。

不过，毛泽东与斯大林，本是具有相同“遗传基因”和“特殊材料”的伟大人物，即便没有斯大林这个老师，自称“我就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的毛泽东，也会发明出无数精彩。

“改造好了就可以回来”。

毛泽东给了一个希望，这是他比斯大林仁慈的地方。只是，怎样才算改造得好，标准是什么，没人知道。

当然，现在知道了，它取决于大救星的“龙体”是否健在。

补记：2007年1月15日，李铮因癌症被推上手术台。但是，他再也没有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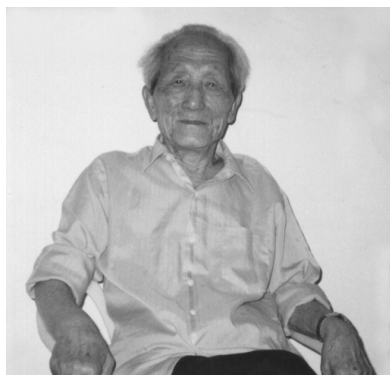


长寿湖部分右派重返劳改地团山堡
（第三排右二是李铮）

沉默是金

黄伽佛

1958年重庆市南开中学历史教师



我解放前是农工民主党的党员，在国民党的公安局干过。解放后因为我是民主党派，让我在共产党的公安局干了一年多。1951年我被清理出来，安排到南开教书，教历史。我原本是学师范的。

1952年开展向党交心的忠诚老实运动，全市中学教师集中在南开交待问题。我没有大问题，顺利过了关，共产党给我作了结论。我以为这辈子没事了，便安安心心教书。1958年清理阶级队伍，学校突然通知我下去劳动改造，说最多一年左右就回来。我信以为真。

重返南开，是20年之后，1978年，我已经是个退休老头子。

我是1917年出生的人，这一辈子风风雨雨起起伏伏生生死死，咋说才好？我的方式是什么都不说。这几十年，人与人之间不是反映正常的人性，到处是假话，上下左右互相欺骗，两夫妻床上的话都可以做告密的材料。假话我不想说，真话我不敢说，所以我只好什么都不说。

请原谅我就说这些。你大老远跑来，就在我这儿吃中饭，有鱼，只是不是长寿湖的鱼。

采访时间：2001年5月22日 地点：重庆市沙坪坝区

采访后记

黄老先生今年已84岁，但头脑清晰、口辞清楚，耳朵也好使，本是一次不费力的采访。但是，说了不到10分钟，就无可奉告了，是我采访中最简短的。

在长寿湖当“历史反革命”的那些年，黄先生自觉遵守对“阶级敌人”的行为规定：“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走到今日人生暮年，他是不是也一如既往地坚守这条准则？

这想必是教历史的黄老先生在读透历史之后的“历史性选择”——沉默是金。

我哪里敢说话？

李太璞

1958年重庆一中数学教师

1926年生



我注定跑不脱。解放前我在重庆大学法律系读书时，参加过国民党的一个组织。

1950年我毕业，晓得共产党不会放过我，法律越早甩掉越好，颈子缩得越短越好。我拿定主意当个普通教员，安安分分教书过日子。有人劝我教语文，我认为语文容易扯到阶级斗争上去，少惹为妙。我到教师进修学院，进修数学，后来成了市一中的数学教师。

1952年搞忠诚老实运动，我把所有问题都作了交待，党组织经过审查，认为我没什么大问题，可以教书。我从此老老实实教书，不多说话。1957年我根本就没说话，我哪里敢说话？

1958年12月20日，这一天我忘不了。学校副校长刘西昆很随便地对我说：“体力劳动对思想改造很有好处，组织决定你下放农村劳动，何时毕业根据你的表现”。就这么一句话，我失去了工作和一大半工资。

我们在凯旋路集中时，宣布我们是监督劳动，这意味着要把我们当坏人对待。第二天去南桐，我们中有一个叫刘淑明的女教师，带着四个孩子全家下放（她老公陈祚璜已经当右派放下了）。那四个孩子一路上很兴奋，齐声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唱了一遍又一遍，一直唱到南桐。

在南桐，不少教师饿死，1960年1月，3天之内就倒下12个教师。重庆市教育局的领导怕死得太多影响不好，于是把我们转到了长寿湖。

长寿湖分几个等级。先锋岛住有问题的下放干部，属第一等级；同心岛住右派分子，属第二等级；团山堡住历史反革命等四类分子，属最低等级。最低等级待遇最差，劳动最重。监管干部实际上也分等级，派来管团山堡的，一定最不受重用。管我们的下放干部陈锡元，来之前是同心岛的管理干部，后来他受排挤，被贬到团山堡。陈锡元用整我们来表示积极，表示对敌人仇恨，对党热爱。他规定我们每天劳动9个小时，还不算路上的时间。每两个星期休息半天，即使冬天下雨下雪也要出工。后来附近的农民都看不过去了，对他说：“陈指导，就是牲口也要爱惜，你把这些分子整垮了，整病了对你有啥好处”？农民这番话对他还起了作用，从那以后他把我们放松了一马。

（注：陈锡元后来一直不好意思参加长寿湖“分子”的聚会，直到2000年，才第一次与当年他管教的人相聚，双方相逢一笑泯恩仇。此时，大家都是近80岁的老人了。）

我下去时不像右派那样想不通，到长寿湖也不像右派那样情绪抵触。自己解放前沾

上了国民党，该倒霉。唯一的委屈是觉得处罚太重，自己已经作了交待，党组织也作过结论，还是丢了工作。我老婆是小学教师，每月30元，三个小孩，我走时最小的才一岁。

几年后我可以探亲了，每次回家我心里都很难过。妻子陪我在树人小学旁的街道上散步，当时，我觉得只要能经常同妻子散步，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在长寿湖最困难的时候，我想到过死，因为看不到任何希望。右派还盼望平反，共产党可能把他们整错了。我是历史问题，共产党整我们这种人是天经地义，这个无期徒刑判定了。与其没有希望劳累而死，饥饿而死，孤独而死，还不如痛痛快快投湖而死。好几个夜晚，我半夜起来走到湖边，想一了百了。可我又实在放心不下家庭，我怕我的死更给他们带来灾难。那时凡是自杀的人都要戴上“抗拒改造”、“自绝于人民”、“畏罪自杀”的帽子，让家属子女更抬不起头。正是顾忌这一点，我才没有跳下去。

现在我都无法想象当初是怎样活下来的，我们有些同伴说断气就断气了，比如一中同我一块下去的语文老师姚述隐。他为了争取早日摘帽，拼命劳动，他本来年龄偏大，50岁，又有病，一天晚上他带病同大家一起猛干，结果一头栽下去断了气。姚老师说来很冤枉，他以前同陈独秀一起呆过，因陈独秀是老右派而把他打成新右派，在长寿湖送了命。

请你原谅，我实在不想多谈过去的苦难，那是一场恶梦，而且这场恶梦很可能再落到我们这种人身。1982年放我回来时没有给我平反，上面说1958年并没有划我为反革命，不承认我是属于冤假错案，不恢复工资。所以，我是莫名其妙地去劳改，又莫名其妙地放回来。现在仍然是共产党当权，说不定哪天共产党又要收拾我，不需要任何理由。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很多事我不敢说，权在人家手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死里逃生，好不容易吃了碗安稳饭，很珍惜今天的平安，不想再惹事，如果再整我一次，我必死无疑。现在我还经常做恶梦，梦见又被押到长寿湖，醒来一身冷汗。

采访时间：2001年5月18日 地点：重庆市一中

采访后记

李太璞先生在电话上勉强同意我去采访，一见面就说：“如果不看你爸爸也是长寿湖难友，我一句话都不愿意说，你年轻，没吃过那种苦，我是被整怕了。”

在我采访的“分子”中，教师右派胆子很小，像李太璞这种1949年前加入过国民党组织的“历史反革命”更是如此。他们认为，共产党天然的要把他们当敌人，往死里整，不需要任何理由。



长寿湖农场职工俱乐部印制

1963年的贺年卡（陈华绘制）

李太璞仅仅谈了一个多小时，便把他的一生，包括长寿湖的23年讲完了。也许是有些歉然，他坚持要留我吃中饭，并且不辞辛劳跑到大街上去买回一大袋卤菜。

李先生可能早已忘记他是学法律的大学生了。从1950年毕业起，他就主动把自己放到“小羊”的位置上，“狼”要吃“小羊”，天经地义，除了接受这个血红的现实，难道还可以求助重庆大学课堂上的法律？

“阶级斗争”、“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成了这文明古国的铁血法律，就像大自然的天然律令——狼要吃小羊。这是不是炎黄子孙的悲哀姑且不论，看得见的，是无奈中对这“铁血法律”的认同。

文明的王国，注定不容“狼吃小羊”的丛林法则。敢于愤怒和抗争，是获得“免于恐惧的自由”的前提。



李太璞在长寿湖的劳改地——团山堡（谭松摄）

那4斤8两四川省粮票

李国元

1957年重庆煤矿学校力学教师



1957年的公案没有了！经济上就没有补，更不用说赔偿。不补，不赔，意味着这个案子还正确。事实上如此，共产党对文革彻底否定，反右基本肯定。邓小平说，1957年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55万多知识分子，99.9%的人都整错了，还正确？！1979年为什么要给我们平反？那是一种手段，一种权宜之计，当时如果不给知识分子平反就无法调动积极性。

1957年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不择手段践踏人权。给我安的罪名是“攻击工农干部，反对党的领导”。

这个荒唐事我把来龙去脉说给你听。

1956年我从合肥工业学院毕业，分到重庆煤矿学校教力学。学校有我一个校友，机电的教师刘凡庆。他同一个学生恋爱上了，当时煤校有个规定，不准师生间谈恋爱。学校警告他。刘凡庆同那个女学生正恋得热，不听。学校勒令他退职，把他赶出了学校。他后来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我很为他惋惜，但学校有规定，我也无话可说。

没多久，又有人同女学生好上了，不仅好上了，而且把她肚子搞大了。这次是一个老区（解放区）来的工农干部，校总务主任，党总支委员。搞大了就得结婚，但总务主任是有老婆的人，老婆在北方农村，你一听就明白他的性质比刘凡庆严重得多。但是，由于他是党员，是老革命，学校只给了他一个内部警告，而且给他遮羞，不让大家知道。对刘凡庆是在全校大会上公开宣布，公开批判。对年轻知识分子一种标准，对党员老干部另一种标准，我看在眼里，心中不平。

1957年鸣放，学校要求我们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提吧，知无不言，言者无罪。我认为说得很正确，鸣放很及时，三大主义该反。包庇总务主任就是宗派主义。学校的党总支书记兼校长左XX是个工农干部，文化不高，他重用提拔的都是文化不高的工农干部，学校的中层干部文化之低近乎于文盲。例如，人事科长就只有小学扫盲生的文化水平。叫我提意见反三大主义，我指名反宗派主义，具体的例子就是处理刘凡庆和总务主任的双重标准。

鸣放转眼变成反右，我立马被打成右派，罪名是我刚才说的“攻击工农干部，反对党的领导。”

鸣放——反右，真是个绝活呵！有根有据的让你按照他设计的框框来提意见，你一钻进去就把你脖子卡住，往死里整。斗我的声音我记得清楚：“李国元不缴械投降，我

们绝不收兵！”最初我还顽抗，后来遭不住了，连连说：“好，好，好，我投降，我投降。”

但是晚了，因为顽抗过，所以处分重，只发8块钱生活费。

党号召我们反宗派主义，结果宗派主义大胜利，煤校打出十六个右派、反革命，全部是知识分子，其中包括两名知识分子副校长廖石诚和杨鹏翥。工农干部彻底胜利了，学校完全被他们统治。

划我右派时我23岁，正在同一个姑娘热恋。姑娘叫万XX，在中梁山煤矿工作。我主动给她写信，说自己成了右派，断绝关系。

她不干，坚决不干。

（注：李国元1.75米的个头，浓眉大眼，可以想象23岁时的风采。）

但是我们不敢公开往来，她提出每周周末在华岩寺（位于重庆沙坪坝区上桥）约会。于是，一到周末，我们悄悄从各自单位溜出来，在佛门的红墙绿树下幽会。我最记得1957年的中秋夜，我们在华岩寺，月色、夜风，很美。我望着她，心中很感伤。算了，不提它。1958年1月，万XX突然不来了，音讯杳无，写信也不回，我连续几个周末在华岩寺等，等。三个月后，我被发配到南桐农村劳动改造。多年后，我才偶然从一位老师处打听到，这是煤校党总支作的怪。不晓得是哪个发现我们在约会，汇报上去，学校党总支以组织的名义给万XX的单位去了封公函，说我是右派分子，要万XX的单位挽救她，同我划清界线，断绝关系。那位老师告诉我，他看到铺天盖地的批判万XX的大字报。她压力太大，我不怪她，党组织说得对，的确是挽救她，她要是坚决同我结婚，后面几十年日子难过，政治上压迫不说，我8块钱生活费（1961年后加到18元），有个家，怎么活？党组织其实也挽救了我，我在长寿湖看到那些有家有子女的右派精神压力大，对妻子儿女内疚，经济紧巴巴，日子苦得很。

我们煤校教数学的吕声拯，就是家里人口多，精神和经济紧张，1961年死在长寿湖。

阶级斗争是个绞肉机，一旦宣布你是坏人，就要强迫所有人同你划清界线断绝往来，彻底孤立你。国民党时代要人道一些，还可以表示同情，还可以去营救。

我先到南桐，后转到长寿湖，说是长寿湖比南桐好，吃得饱饭。到了长寿湖，才觉得比南桐恼火。南桐可以搞到些杂粮吃，农民对我们好，称粮食农民家是好多就好多，给我们称，秤杆翘到天上去了，他们说，你们没得家，恼火。还有，他们不拿我们当坏人，他们说，只有你们读书人才那么傻，共产党的话都当真？对共产党说话，老实话都说得嗦？只有你们知识分子才恁个相信？



李国元1965年春节摄于狮子滩

到长寿湖，完全是一种恐怖环境了，听不到真话，更不敢乱说话，唱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都要挨批斗，说是别有用心。

我到长寿湖后，他们看我人高马大，分配到狮子滩打铁。打铁就打铁，没啥，问题是要吃得饱。

我只打了一个多月，人就变了形。三天两头有人饿死，包括我们学校的吕声拯。我见势不对，赶紧向外地的哥哥求救。我哥哥经常出差，在火车上吃饭不要粮票，他省下粮票，每个月给我寄5斤全国粮票。莫小看5斤，那个年月，一粒米都要起作用，多几斤米就可以救一个人。我活出来，那5斤粮票起了关键作用。

1960年，大概是8月底，发生了一件让我痛不欲生的事。那天，我收到哥哥的5斤全国粮票。当天晚上，我拿粮票打了二两饭，食堂找给我4斤8两四川粮票。记得是晚上9点多钟，突然听食堂说，刚刚接到通知，四川省粮票全部作废，明天使用新粮票。我一听，头“轰”地一声炸了！我跑到食堂，声音发抖，问为啥子事先不通知，搞突然袭击。食堂很委屈，说他们也是突如其来。

当天夜里我彻夜不眠，翻来覆去想，决定第二天一早往偏僻的乡场跑，也许那些地方还没有接到通知，赶快把粮票用出去。第二天早上，我5点钟就起来赶路，到了回龙一问，不行了，头天晚上已经通知了。我翻身又往更偏远的乡场赶，赶拢问，还是不行。又跑，连跑三个场，场场落空，这个伤天害理的事做得彻底呀！！粮票不能换，让我吃一顿也好啊！又不是发现了假粮票，又不是流通领域出现了混乱，事先又不通知，突然宣布作废，这实际上是对全省老百姓口中那点救命粮的血腥掠夺。如果现在突然宣布人民币全部作废，明天用新票子，你怎么想？我当时那个绝望难以形容，我一屁股坐到地上，双手抱着头，手指狠狠地抓头发，一个多小时起不来，现在就是一把火把我家烧光，我都不会那么伤心，那么心痛。缺了那个4斤8两，当月我脚就肿了，像灌了铅，一个小坎坎都迈不上去。



李国元义愤填膺

[注：饥荒年，四川省省委书记李井泉谎报四川粮食产量，中央于是从四川大量往外调粮，造成了四川居民定量口粮的严重短缺，为了弥补这个短缺，李井泉采取了突然宣布四川省粮票作废，重发新粮票的作法。四川省饿死那么多人——据廖伯康统计为一千万，详见本章后面对廖伯康的采访录——与李井泉的谎报产量和突然宣布粮票作废有直接的关系。这个后果比前苏联梁赞省省委书记弄虚作假造成该省经济大衰退更严重、更恶劣。但是，李井泉并未为此受到丝毫惩罚，他反而将后来（1962年）揭发他的萧泽宽（时任市委组织部长）、李止舟（时任重庆市委办公厅主任）、廖伯康（时任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打成了重庆市著名的“萧李廖反党集团”]

由国际港澳出版社出版、右派李才义著的《天府悲歌》210页中有这么一段描写：1959年至1961年四川连续三年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1960年和1961年的产量相当于解放前夕（1949年）的89.6%和77.3%。但三年间国家征购占产量的比重反而由1958年的30%左右提高到48.9%，46.2%和38.8%。三年间农村人均留粮分别为139公斤、130公斤和129公斤。粮食征购率之高和农村人均留粮水平之低，为全国仅见。（同期，全国平均粮食征购率分别为41.7%、35.5%、29.6%，全国平均留粮分别为188公斤、176公斤和184公斤。）城市人口的口粮定量标准也一再降低，1960年城镇居民每月只有8.5公斤。当年夏季，全国粮食进一步紧张，中央于5月份起一再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包括四

川在内的粮食调出省，抓紧突击抢运，确保北京等大城市和各灾区的供应。四川为此千方百计筹集粮食，并于9月1日突然宣布正在流通的“四川省地方粮票”作废，总额为4800万公斤，严重地失信于民。据统计，就在四川人民忍饥挨饿，水肿病蔓延，人口负增长的三年里，四川向中央上交了587万吨粮食……有生产队“减员”1/3的，也有全家老小都饿死的。

蔡咏梅在《李井泉害死无数四川人》（《开放》杂志2005年9月）写道：

一九六〇年八月二十三日（日期与李才义有出入）这一天可能那一代四川人都不会忘记。大饥荒已很严重，许多人营养不良全身浮肿……就在这样一个绝望的时候，这一天清晨饥肠辘辘的人们醒来，骇然听说四川省当局宣布四川省粮票全部作废。远在青白江的母亲气得跺脚，欲哭无泪。要知她身上已变成废纸的十多斤省粮票是她饿着肚子一口口省下来的，是要救她年幼的儿女的！

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这一黑心命令不知把多少已在饥饿中的人赶向了绝路。我知有一家人从外州县调工作到成都安家带着省粮票上路，粮票作废，全家断了粮源，结果是靠卖光所有衣物到黑市买高价食品才挣扎着渡过难关。李井泉此人一贯极左，紧跟毛泽东，因此四川大饥荒最严重。

李国元：除了饥饿，长寿湖还有可怕的精神和性压抑。

长寿湖有个叫卢仲秋的权利派（新华书店右派，已去世）有一次说，蛊惑人心的“蛊”繁体字是“蠱”——三个“虫”字加一个“皿”字，这就是把一群虫子关进器皿里，让他们互相斗，长寿湖对于右派就是“蛊”。

这话说得很形象，也很正确。共产党把我们集中在一个封闭的地方，远离文明，远离亲友，远离信息，然后挑动我们互相斗、洗脑。日本人搞以华治华，慈禧太后搞以夷治夷，共产党搞以右治右。梅吾圈点一首宋词，有人（右派）汇报，组织批斗他的是摘帽右派。把右派欧文定整进监狱的就有当了组长的摘帽右派。白天坡上说一句话，有人记下来汇报，晚上斗你。有时甚至无中生有，非要你对号入座，认错，把自己骂个狗血淋头，还要问，“你口服了，心服没有？”把你自尊、人格、尊严、灵魂翻来覆去地强奸。把你变成一条哈巴狗，变成一个十足的奴才，这就叫“思想改造，重新做人。”

某些当了组长、队长的摘帽右派，比国民党的监工还厉害，他们虽然也是受害者，但一旦当上组长、队长，立马就有了生杀予夺的大权，可以随意批斗人，可以整材料把其他右派送进监狱，可以用劳动量、扣饭等置人于死地。这是长寿湖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一方面被整，有满腹冤屈，一方面象像公安一样握有对其他人的专政大权。所以，“改正”后有的右派说，那些当了组长、队长的、能管人的右派可能还感到失落，因为再也没有那种管几十个人生死的大权了。

在长寿湖，我们没有任何尊严，管教干部可以对我们任意呵斥，我们就是奴隶，组长就是奴隶总管。右派们虽然彼此是平等的，但相互间要防止别人告密，精神十分紧张。还有，一年到头不断的批斗会，在会上要被批判同类，又要被同类批斗。批斗会上，有良心的要绞尽脑汁思索怎样说才能不伤害对方——即既应付了批判又不真正伤害对方。没良心的就是一阵乱说，只讨领导欢心，不管对方死活。我每次回去探亲，都很感伤，

为什么？因为长年累月在岛子里被呵斥、被批斗，已经习惯了没有尊严的生活。回去探亲，周围的人不知道你是右派，不把你当坏人看待，人的尊严回来了，一下子受宠若惊！

可是，探亲毕竟只有那么短短的几天，探亲回来，人反而更加难受。有一次我回安徽探亲，梅吾回河北探亲，返回时我们在狮子滩相遇，当晚住在狮子滩。晚上我们摊开信纸给家里写信，写着写着，我们不约而同地哭起来……

（李国元讲述至此泪流满面）

几十年，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没有做人的起码尊严的环境里！



说起这段往事，李国元热泪盈眶

1976年，我回安徽看望母亲。母亲有个邻居，一个老太婆，没文化。她来母亲家，请我帮她给她儿子写封信。写完信，她问我，在四川结婚没有，我说没有，她很诧异，因为我那时都是40出头的人了。她说，你这么有文化，又是教书的，怎么会没结婚呢？不要紧，我给你介绍一个女的，是师范大学毕业的，也是年龄比较大了，没有结婚。我给你介绍。

我怎么敢同意呢？！她不知道我是一个右派（我妈没对任何人说）、一个贱民、一个毫无尊严的人。



李国元与母亲

我妈只好说：“不用，不用，他在那边耍得有女朋友。”

一个母亲看到儿子40岁了，还没成家，别人来介绍对象，不敢接受，这是一种什么感觉？！我又是什麼感觉？！

所以，那一年我同梅吾在狮子滩给家里写信时，不约而同地都是泪流满面，心想，我们又要回到那个毫无尊严的地方去了。

在同心岛汪家庙，有很长一段时间，大约六、七年吧，只有五、六十个男右派，没有女人。有右派说，汪家庙啊汪家庙，耗子都是公的。有一天，詹光看见一个小孩子登上岛，非常感动，晚上对我们说：“我今天感到了一点人间烟火气。”有一个叫徐树德的人（邮

电局右派，90年代去世），从1966年到1972年，一直不准他探亲，1973年，终于放他回云南探妻子。临走前，我们说：“老徐，你回去嘛要先磨磨刀哟。”他去药店开了一大包中药——壮阳药，惶惶不安地回去了。探亲回来后，我们问：“老徐，刀磨得怎样？”他垂头丧气地说，“还是不行，不行。我看到她就担心，害怕。”另一个叫蔡容的右派（四川三台县人，重庆水利学校右派），娶了个农村老婆。多年后她来岛上看他。第二天我们问：“战果如何？”他长叹一声：“莫说，莫说，不行了！不行了！”

我当右派时 23 岁，到长寿湖时 25 岁，正是风流倜傥的年华。但是，我是右派，我就是贱民，不敢去奢望谈恋爱。紧接着大饥荒到来，人在死亡线上挣扎，还谈什么性渴求？大饥荒过了之后，我们身体逐渐恢复，年龄也才二十多三十岁，正是很英俊的时候。右派虽是政治贱民，但其中不乏才貌双全的人才，也有渔场的年青姑娘爱上了他们。

长寿湖有一群像我一样的单身汉，有的人熬不住，想找女朋友。郑光全同渔场的一个女青年相爱了，他给她写信，“你像夜空中的一颗流星。”信被交上去，郑光全马上被抓出来斗，“你一个坏人，还妄想革命女青年。”

就是在 1963 年，身体恢复之后，集中学习，进行所谓的评查，评论你、审查你，改造得如何了。检查思想，认罪伏罪。写评查，一个是自己写检查，写认识；还有一个就是互相揭发，然后再把揭发的有典型的材料拿来通报。当时，通报的有一条就是针对年青右派的，叫什么呢？就是“不准腐蚀青少年”。

右派怎么腐蚀青少年？简单说，就是不能同年青的女人谈恋爱。当然，克制能力强的，就（把性欲）压下去了，每天用劳动来把自己青春的精力消耗掉。

可是，也有右派没能成功克制，重庆交通学院右派欧文定就心理变态了。他是个年青人嘛，在同心那个孤岛上改造，都是些男右派，他处于青春期，难免不想女人。他经常幻想渔场那些女职工，幻想她们在后面追他，幻想！性幻想！在长寿湖，他不说你不准谈恋爱，但只要你接触女人，马上就斗你，说你腐蚀革命群众。右派是人人都要仇恨的对象，怎么能够去爱。除非你像电影《芙蓉镇》里那一对“坏人”，结合的时候自己说自己“一对狗男女。”

在针对年青右派的评查中，欧文定被迫交待了他的“罪行”，他说，他曾经在电影院看电影时，摸过旁边女职工的大腿。他被打成“坏分子”，右派加坏分子。斗哟，斗争他哟。在文革初期， he 被抓入监狱，判刑 10 年。右派改正时把他放出来，他已经被关傻了。我听到交通学院的熟人说，他像有神经病一样。他一辈子都是单身，他在交通学院死了都没人知道，后来尸体都发臭了，才把门撬开。

在长寿湖，我看得清楚，所以我不去找麻烦。卢仲秋回老家悄悄找了个农村姑娘，一直不敢吭声，“改正”以后我们才晓得。我 1979 年“改正”后才同一个丈夫病逝了的女人结婚，这年我已经 44 岁。我没有自己的孩子。

（注：在我所采访的长寿湖右派中，还有另外几个人与李国元的情况相同，都绝了后。他们是李正、顾大铭、周家元、金践之、张天授、汤儒君、李某某——因为特殊原因，不能说出他的名字。）



李国元探亲留影

“改正”后，回到煤校，学校还是那帮人，校党委书记在全校会上，称我左一个“改正右派”，右一个“改正右派”，仍然歧视我。调工资，必须接受党的领导——也就是说必须接受本单位党的领导。我不情愿，就不给我调。我只好走人，调到了城建校。

1980年，我同分别22年的万XX又见了一次面。我想起同她共度的那个中秋节，1957年在华岩寺的中秋节，她那种眼神，为我担心，充满感情……

（李国元很健谈，滔滔不绝，但说到这段往事，嘎然而止，显得很凝重。我没有追问。一年后，我打电话核实几个细节，又问到此事，他只说了一句：“是的，1980年我们又见过一面”便不再吭声。）

采访时间：2002年5月28日 地点：重庆市城建校

采访后记

长寿湖右派们的性压抑，也许没有饥饿、死亡那么血腥恐怖，但是，这种折磨的时间长达20年，在某种程度上说，性欲的折磨不亚于饥饿的痛苦。采访中，受访的上百名长寿湖幸存右派，很少有人谈到性压抑，他们谈饥饿、谈批斗、谈劳累，谈屈辱，但对长达20余年的性禁锢却避而不谈。其实，性压抑和性恐惧对他们造成的伤害不亚于饥饿和批斗。1979年右派改正后，有的右派已经丧失了性功能，有的绝了后，有的一辈子单身。李国元是第一个主动谈到这一点的人，虽淡淡几语，也足以让人想象。

1987年，长寿湖右派诗人孙静轩在《诗刊》发表了一首长诗《这里，没有女人》。现抄附于后：

不是我的诗荒唐
生活本来就荒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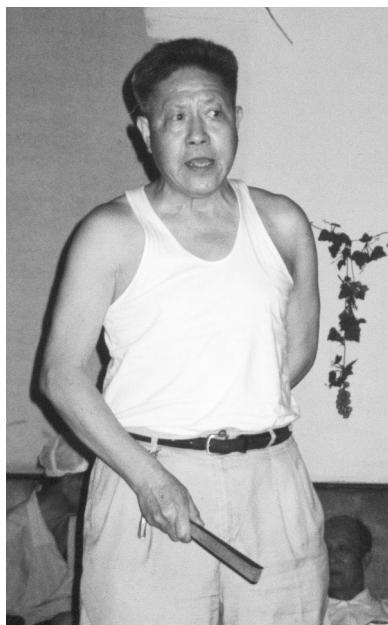
荒唐，荒唐
荒唐的世界，荒唐的年代
曾发生过一个荒唐的故事
竟然有一个没有女人的地方
没有令人颤栗的爱的抚摸
没有女人的长散发出的气味
没有浪漫，也没有缠绵
只有男人，粗野的男人
脸上烙有金印的男人
他们一半是人
另一半是魔鬼
上帝也许太仁慈了
竟没有把他们打入地狱

只是驱逐出伊甸园
囚禁在一个孤岛上
囚禁在一个没有女人
只有石头和死水的世界

这孤岛
这死地
早已被上帝遗忘
连死神也不屑一顾
它没有名字
它不配也不需要有个名字
这鬼也不愿呆的地方
属于另一个世界
一个被太阳的火焰烤焦的
被月亮的死光冷却的
被沉默的大山窒息了的世界
在山与山的对峙中
在岩与岩的夹缝里
在着了火的沙滩上
在密密麻麻落满了蚊虫与牛虻的芦苇丛中
生命却顽强得发野
野得疯狂
竹叶蛇穿梭于苇叶已有一千个世纪
这个讨厌的软体家族
却始终没有绝迹
狼颓丧地徘徊在夜色中
徒自望着半弯月亮嗥叫
难得捕获一次猎物
饥肠辘辘却不曾绝种
悬岩上饥火烧红了眼的兀鹰
竟等待不到一个倒霉的男囚
在它之前更早地死去
真他妈的怪事
这些男人，这些犯了罪的男人
这些头发蓬松得像杂草
衣着褴褛得像乞丐
命贱得如铁蒺藜如狗尾巴草的男人
这些露出锋利的牙齿

一半是人一半是狼的男人
只须嚼几条草根
只须嚼几团叫作“观音土”的白泥巴
或者吞一口乌鞘蛇的冷血
却活得撒野，野得发疯
饥饿折磨不死
疾病纠缠不死
真他妈怪
连死神也怕他们三分
这些男人，这些半人半兽的男人
这些被钉上十字架的男人
怎么也想不起触犯了哪一条戒律
他们曾自由自在地嬉戏于伊甸园的丛林
沉醉于维纳斯酥软的胸怀
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段罗曼史
每个人都算得上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而今这一切没剩下一点记忆的碎片
是的，连梦也忘却了
剩下的只是人的外壳
——一具活尸
即使天塌地陷，世界末日来临
也跟他们毫不相干
要紧的是在草丛与蛇同眠时不被咬伤
与狼为邻而不被吃掉
在同别的囚犯交往中保持缄默不被告密
在人与兽的界线上不被兽性同化
而最要紧的是在没有女人的地方
别像个白痴，别蜕化成中性人
别忘了男人的本性男人的伟岸
别让那一团男人的火熄灭
然而，在这孤岛
保持一个男人的本性可真不易
没有女人，男人会渐渐迟钝，变得愚蠢
会失去对性别的敏感
像灼热的沙滩上
一条被干渴而死的鱼
尽管也有暖烘烘的太阳
尽管也有弹性的沙滩和柔软的草地

但却没有女人，没有羞耻，也没有文明
这些男人像原始人一丝不挂
赤条条地直挺挺地仰卧
让那阳物显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却怎么也唤不起清晰的性别的记忆
甚至想不起自己的妻子是个什么模样
朦胧的月光是最能思乡怀旧的
再试试作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吧
然而徒自具有男人的标志
却怎么也打不开那把棕色的伞
啊，一把失去弹性的伞
于是恐惧和悲哀笼罩着整个孤岛
于是全体男囚都在月光下围坐
一面用大碗喝着劣等的烧酒
一面用猥亵的语言大谈女人
再一次点燃火种
试一试试男人的本性
然而，旗杆突然被飓风折断
始终也悬挂不起那面男人的旗
这时候，也只有这时候
这些半人半兽的男人
这些饿不死病不死生命野得发疯的男人
第一次被悲哀压垮
一滴滴淌着男人的无声的眼泪……



2002年6月11日，李国元在长寿湖猪儿岛愤怒地说：“长寿湖不是性压抑而是性禁锢！”

补记：

2004年2月，我到成都采访了廖伯康（他平反后担任过重庆市委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廖谈到了当年向中央反应四川省饿死人的情况及遭遇。

廖伯康：饥荒年，由于李井泉（四川省委书记）虚报产量，外调粮食，造成四川大量饿死人，我看到情况十分严重，决定向毛主席、党中央反应四川的真实情况。我们团市委几个书记在一起讨论，由副书记于克书执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由我们团市委的打字员李国全（音）打出。李国全是哑巴，找他打就是怕走漏风声。信打好后我们不敢在重庆寄，托人带到武汉才寄出。为啥？怕邮政检查呀。这是1962年上半年的事，不久，我到团中央开会，单独同胡耀邦谈了一次。随后，胡耀邦又安排我同杨尚昆见面，专题谈四川饿死人的情况。这次谈话之后，中央组织了一个18人的调查组，到四川进行调查。这18人全是司局级干部，为什么安排司局级是有讲究的。部长级下来公安要陪同保护，不利于调查，处长级级别又低了点，很多事接触不到。

调查组的人来后曾找了市委组织部长萧泽宽、市委办公厅主任李止舟，他们两人如实反应了情况。

我们给毛主席的那封信杨尚昆把它打印出来（去掉了头尾），只分发给在京的政治局委员，这样做是为了避开两个人：上海的柯庆施和四川的李井泉。

贺龙看到信，给李井泉打电话，说四川有人告他，但不知是谁。李井泉叫贺龙把信转给他。贺龙于是托廖苏华（女，西南妇女联合会主任）把打印件带到了李井泉手中。

李井泉动用一切手段大肆追查，最后终于把我查出来。

我和萧泽宽、李止舟三人被打成“萧李廖反党集团”，我名字排在最后是因为三人中我职务最低。但是，处分我挨得最重，因为我是“始作俑者”。我被撤销一切职务，下放到建筑工地干最重的体力活。

文革期间我被抓出来斗，重点就是围绕饿死人的事。我坚持说四川饿死了大量的人，具体多少我说不上。李井泉后来曾向中央承认饿死了700万，有人说，不对，是800万。我这次根据共产党自己的资料进行计算，得出比较准确的数字是1000万。其实，700万也好，800万也好，1000万也好，都是冷冰冰的数字，但是，它若表示生命就不一样了，那怕是一个“1”，也意味着一条鲜活的人命！

李锐为我书写的序在《炎黄春秋》发表后，不少人打来电话，索要书。但我现在是有序无书，因为书还没有出版，眼下看来还无法出版，再等几个月看看吧，实在不行我就自费把它印出来。

（我问到饥荒年突然宣布粮票作废一事，廖伯康的答复是：“当时是电话通知的，我没有看到文件，也许当年一些搞财会的人看到过有关文件。”）

采访时间：2004年2月25日；地点：成都市省委大院

《龙门阵》杂志2006年第1期刊登了一篇“访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的文章，其中有这么一段文字：

“廖伯康说：1958年四川人均占有粮食630多斤（包括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到1961年，这个数字下降到373斤。三年之内下降了将近一半！情况已经如此严峻，他（李井泉）还是继续欺上瞒下，硬绷面子，狠心克扣群众的口粮。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粮是21斤，干部只有19斤，农村社员每天的口粮由公共食堂控制，只有1到2两米，城里居民每月供应2两肉和糕点，农民根本就没有。这么低的标准，有的地方还不落实，



廖伯康在那人人自危自保的日子里，拍案而起，为民“鼓与呼”，坚守了的良知，如今又在耄耋之年，怀忧国忧民之心，奋笔疾书，把一段真实的历史，留给后人。
（谭松摄于2004年2月）

只有空指标没有粮食。1960年7月1日（日期与前又有出入），省委突然一道命令宣布粮票作废，把老百姓苦苦积攒下的4800万斤粮食化为乌有，这种做法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

下面是李锐为廖伯康《回忆四川“萧李廖案件”》一书写的序《从一个案件看一段历史》的部分内容（原载《炎黄春秋》2004年1期）：

“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全国饿死了多少人，我没有看过精确的统计数字，只看到几个推算数字，有说三千万，有说四千万的（我的有关文章引用过这个数字），各有各的推算根据。如果不说全国只说一个地区，号称天府之国历来富裕的四川省（那时还包括重庆），却有颇为精确的数字，即1960年底比1957年减少1000万。

这个数字是伯康在回忆录中提供的。他说明了这个数字的文件根据：1957年的《户籍年报》上，四川全省人口是7215.7万。而1962年5月，省委批转的有关附件中所列1960年底全省人口总数是6236万，相差正好1000万。统计数字中一条人命只不过是1。这太抽象。回忆录中还提供了很多具体的例证，如雅安地区荥经县县委书记说的：“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有一个村子死得一个不剩，连埋尸的人也没有了，只得找另一个村的人来埋，这些人挨着饿挖坑，是重劳动，也死在坑边了，只好再找其他的村来埋这些埋人的人。”这是一页怎样的腥风血雨令人战栗的历史呀！

问题的严重还不只是饿死了这样多的人，而在于当时四川省委的个别领导人封锁饿死人的消息，继续调动粮食“支援兄弟省市”，以至到了1961年、1962年还在饿死人……

这一场遍及全国的巨大灾难中，四川（还有河南等省）是全国最突出的重灾区。所以如此，就不能不谈到当时四川省和中央西南局的那个主要负责同志了。1958年、1959年那两年参加中央的会议我是有亲身感受的。“抬轿子”抬的最起劲的是长江上中下游的三个人，（注：即四川的李井泉，武汉的王守道，上海的柯庆施）尤其是上游的这位，跟得最紧，对推行极左政策措施，特别卖力，对农业的破坏也就特别严重，实际造成农业减产。在农业大放“高产卫星”，虚报产量的时候，他也不怕把牛皮吹得大。1959年4月上海会议时，田家英在四川农村作了调查，就同我谈过他在乡下挨饿的情况。可是，四川省委的那位主要负责同志就批评他，不同意他的调查，后来硬是充好汉，根据虚报的增产数从四川调出粮食，使广大农民失去赖以维持生命的口粮，这就是四川饿死上千万人的直接原因。出了这样大的可怕问题后，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负责同志的对策仍是向中央封锁消息，不准谈饿死人的情况。谁要谈，就是小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动摇性的表现。一些人对此忧心如焚，为了使事态不再恶化，为了把众多的饥民从死亡上救出来，他们想方设法向毛主席写信，向党中央反映真实情况。

下面是欧阳也写的《说一说四川第一任省委书记李井泉》中的部分内容：

在四川的历届省委书记当中，名声最好的是赵紫阳，名声最差的是李井泉。

李井泉主政四川十七年（1949—1966），一贯极左。通常是在中央已经过左的政策上再加倍偏左。对此，白桦的评语是比较贴切的：“李井泉不仅不折不扣，而且变本加厉地执行极左的方针，硬是把一个天府之国治理成一个饥饿之乡，在四川，有口皆骂，实在是很难不容易！”（白桦：《我所见到的胡耀邦》）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全国的“右派分子”人数是55万多人，占知识分子总数的百分之十一，而四川被打成“右派分子”人数是5万余人，四川的知识分子人口比例低于全国，“右派分子”的人口比例则远高于全国。另外还有6万多人被打成“中右分子”。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李井泉是围攻彭德怀的最卖力者之一。其间有派系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因素。派系的因素是李井泉属贺龙一派，贺龙因为与彭德怀有历史恩怨，在“庐山会议”上被老毛挑起攻彭，李井泉当然也得卖力。现实的因素则因李井泉治下的四川在“大跃进”中属“人祸”最重的几个省，出于自保也非得斗倒彭德怀不可。

“大跃进”时期，李井泉在四川为祸尤甚，从1958年到1962年，官方的死亡统计数字是812万余人。（按：纠正一下：岂止饿死812万？据官方统计1960年底减去1957年的人口就至少少了1000万。实际数字要高得多。）在中央已经开始纠正左的政策的时候，李井泉出于打击反对者的需要，还扣住老毛的《党内通信》不下发，致使四川的经济复苏晚于全国其他省份。丁抒的《从“大跃进”到大饥荒》、《人祸》，东夫的《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对此有较详细的描述。

“七千人大会”上，中央收到了四川干部的检举信，检举李井泉欺瞒中央。同时，李井泉受到众多与会代表的非难，还有人要求中央将李井泉调出四川。李井泉在邓小平的保护下过了关，回川以后不是认真改过，反而动用公安机关追查检举人，图谋打击报复。

李井泉最为人痛恨的事是在1959（注：应是1960年）年宣布四川省粮票作废，使得许多人勒紧裤腰带积攒的一点存粮化为乌有。直到今日，四川的还有人提起此事就愤愤不平。（见愚人：《大饥荒遗事》、何蜀：《为民请命的“萧李廖反党事件”》）

李井泉最为人痛恨的话是当有人谈起“大跃进”饿死人的时候，李井泉说：“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完全没有把饿死人这件事当回事。（见丁抒：《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在贵州安顺天龙屯，有一座四合院，它是抗日英雄国民革命军102师304团团团长陈蕴瑜的旧居。陈在1938年的台儿庄大战中，与五倍于己的日寇展开血战，英勇殉职，忠骨无收，国民政府感其忠烈追赠为陆军少将。在其故居的大门上，蒋中正题写的“忠烈可风”高悬。在题词下的左边墙上，残留着“打倒李井泉”的墨迹。同是军人，前者必将流芳千古，后者注定遗臭万年。（谭松摄）

我仍然害怕

李 淦

1957年重庆市政治学校干部

1925年生



长寿湖是一段非常悲惨的回忆，这些年来，我一直不愿去触动它，所以我不想参加长寿湖难友的聚会。麻木一点我好过些，清醒反而难受。我现在都还经常梦见把我又押回长寿湖。做梦出现打、杀、跳岩，地点一定是在长寿湖。我甚至在梦中大叫，滚下床来，妻子不得不把床加上围栏，就象幼儿园的小孩。

长寿湖，是一座没有铁门的大监狱！

解放前我毕业于晏阳初创办的乡村建设学院。1957年我在市政协办的政治学校工作，专门搞资本家的思想改造工作。鸣放期间我既没鸣又没放，只是在同好友的闲聊中谈点读书感想。

以前我在杂志上读过不少储安平反对国民党的文章，聊天时我说储这个人有功，有一定的进步性。另外，我还提到，流沙河的《草木篇》文字技巧不错。储安平和流沙河都被打成了大右派。有人把我闲聊时的话汇报上去，说我赞同右派，于是我就成了右派。

我没有申辩，我看得清楚，没有用，申辩反而会被重判为极右，一旦判极右，工资没了，还要进监狱。

我当右派时，大儿子刚刚初中毕业，他在班上成绩最好，学校马上不准他考高中。，儿子很伤心，后来到一个小卖部去卖酱油。妻子受我影响，从市农委下放到井口农场劳动，一干也是20年。我私下摆两句无关痛痒的龙门阵（闲聊），把我本人整去劳改不说，儿子妻子一齐整。共产党，哪个说它呢？太缺乏人性！！

我下去后，非常悲观，前途茫茫，看不到希望。我骨子里认定历史一定会作出公正结论，但我看不到了，因为毛泽东说过“右派不准翻案。”

长寿湖基本上是按监牢的方式来管理的，痛苦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劳动时间每天12个小时以上，定额高得离奇，完不成就要加班，每天晚上还要接受批判。没事也要找些人来斗。管理人员大多是有点问题的下放干部，这种人为了证明自己清白、自己革命，下起手来凶得狠，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孙重。

我1961年摘了帽，我以为自己会好过点，呸，又变成“摘帽右派”，一样的劳动改造。最气人的是1962年，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突然给我加一顶帽子——地主！

我从小在外面读书，父母在我很小时就去世了，家里原来有点土地，但与我毫不相关，我哪里当过一天“地主”？

在长寿湖，地主、历史反革命等比右派还惨，更看不到出头的日子。这类分子集中在团山堡。我当地主后，工资降得更低，并且从捕鱼队调到团山堡劳动。

当右派时，妻子一直没同我离婚，现在我又成了地主，她受不了了，当年同我分了手。但她也被下放到井口郊外。

离婚后，为了不影响她和孩子，我连信都不写，更不能见他们。我呆在一个孤岛上，非常苦闷，有时也想找个农民结婚，成个家，但又担心有了家负担重，这点钱养不起。在最最苦闷压抑的日子，我放声唱歌，唱抗日战争的老歌：“同胞们，向前走，别退后，我们再也无法忍受，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我的同学贾厚友在长寿湖饿死，这大家都知道。我更了解他，其实，他也死于巨大的精神压力。

1979年“改正”时我一点不激动，以为同当年摘帽是一回事。让我激动的是统战部干管处那个张志遥处长，就是他让我戴上地主帽子的。1962年他在看材料时弄错了，没有核实就认定我是地主。平反后他向我道歉：“对不起，老李，弄错了。”

既然弄错了，我妻子也没有压力了，她想同我复婚，但这时她已同一个工人结了婚。那个工人了解情况后，主动退出，把她又还给了我，我们于是在1979年复了婚。

回想这一辈子，心中不是个滋味，1949年前我反国民党的腐败，争自由民主，认定共产党代表一个新时代新希望。现在看看，共产党在腐败上远胜于国民党，自由民主远不及国民党。在国民党时代，还有民营报纸，学校图书馆里还有马列的书，更不会私下闲聊几句话就整得你家破人亡。算了，人到这个年龄，看不惯，想不通又怎样？我从长寿湖回来后写了首打油诗：

人生事事有偶然，长寿湖畔学种田，
凄风苦雨二十载，潇洒淡泊度晚年。

采访时间：2001年4月21日 地点：重庆市南岸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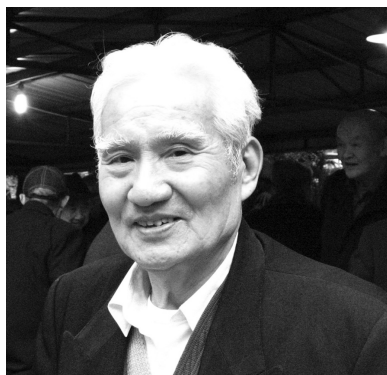


2002年6月，78岁的李淦在长寿湖三台岛“重操旧业”（谭松摄）

她死于“改正”前夜

邬绪昌

1957年重庆42中教师



78岁的邬绪昌老人，还保存有22年前中共重庆市市中区委员会致中共重庆市42中支部关于改正邬绪昌划为右派的公函。另外，还有一份42中党支部“关于改正邬绪昌同志错划为右派问题的复查报告”。这份报告简述了邬的经历，也大体说清了邬绪昌是如何被划为右派的。

下面是该报告中关于邬的简历部分：

邬绪昌，男，1923年11月生，四川云阳人，出身地主。学生成份，大学文化程度，1950年3月参加工作，历任西南军区第一速成中学文化教员，西南军区第二速成中学文化教员，大竹中学教员，大竹师范教员，重庆42中学教员。1958年2月12日划为一般右派分子，送农村监督劳动改造，给予生活费。同年4月28日去南桐矿区两河公社一大队劳动，1960年2月在长寿湖农场劳动，1963年回校后被精减退职送回原籍云阳县双江区双江公社东风大队7生产队劳动至今，1978年5月27日摘掉右派帽子。

对此简历，邬绪昌补充了几点：一、他在上海辅成华学院（抗战时迁到万县）读书时，就参加了地下革命活动，1948年加入了地下党。二、他被迫从部队转业是因为父亲在土改时被共产党枪杀。三、他作为一般右派，而又受到监督劳动的重罚是因为他不服，为自己辩解了几句。四、1963年重庆市教育局将教师右派从长寿湖召回学校，紧接着又将他们开除，罚下农村，是市教育局对他们的欺骗和又一次迫害。

下面是关于邬绪昌被划右派的罪行复查：

一、关于诽谤党组织，公开挑拨党群关系的问题。

原结论说邬绪昌攻击党的干部政策说：“党员提拔快，照顾周到，党对非党群众就采取宗派主义态度对待。”还说：“地方党没有军队党那样关心知识分子，大竹的党和政府都不了解我。”经复查，邬当时说这些话，是从部队刚转业下来，对其工资要重新起薪（本人系转业军人，而工资按复员军人对待），心里想不通，有不满情绪，不属于右派言论。至于“学校万事都由党支部包办，正校长（群众）没有权力……”等，根据当时党员反映情况属实。邬对此提意见，不能说是反党。

二、关于与右派分子一个鼻孔出气，咒骂新社会的问题。

原结论说邬在大竹师范一次鸣放座谈会上讲：“报上的大人物（指章××、罗××、潘××等）说出了我这个无名小卒的内心话，现在才出现了真正的马列主义，前一时期尽是教条主义”和邬说他父亲是“在杀鸡吓猴的情况下，作了祭刀绵羊”，现查无实据，应予否定。三、关于说邬把新社会描绘成一团漆黑的问题。

经复查，有天晚上，邬在教研组备课，电灯突然熄灭，而对面的大竹中学却灯光明亮，他脱口而出说：“大竹师范一片黑暗”。这主要是针对电灯熄灭而言，不是攻击社会主义。

四、关于对学校办二部制、粮食定量、漫骂行政领导的问题。

这是邬自高自大看不起校领导干部，对由大竹师范敞开吃粮到42中定量吃粮有不满情绪。

对此复查，邬绪昌作了几点说明：一、关于第一条，当时还给他定了一条罪：“分裂党的统一”（地方党与军队党）。二、关于第二条，他说过，解放前他很喜欢读储安平办的《观察》杂志，那里面对民主自由的论述很对他的胃口。这成了“与右派分子一个鼻孔出气”。三、他只说过42中党支部书记讲话罗嗦，这就是“谩骂行政领导”，后来上升到“丑化党员干部”，最后定罪为“攻击党的领导”。他之所以被加重处罚，判为“监督劳动”，就是对这条不服。

下面是中共重庆市第四十二中学支部的处理意见：

根据中共中央（1978）11号、55号文件精神和中共中央一九五七年关于“划右派分子的标准”中不应划为右派分子的第一条规定，邬绪昌同志没有右派言论，应予以改正。我们的意见：否定原划为右派分子的决定，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工资，收回安排适当工作。子女和亲友档案中涉及这一问题的材料应予抽出并销毁。

中共重庆市第四十二中学支部（章）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邬绪昌讲述的婚姻故事

我妻子叫高长春，北方人，抗战时流亡到内地，成了我的大学同学。毕业后好些年我们都没在一起，但这并没有影响我们的感情。后来我在大竹县师范教书，她在重庆市市中区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我父亲是地主，被共产党镇压，她出身比我好，但这些没影响她的选择。1956年元旦，她专门跑到大竹县来同我结婚。

我1957年6月调到重庆42中，夫妻团聚。几个月之后，我就当了右派。下放农村劳改时，她已经怀孕6个月。我对她说，你受不住压力，我们就离婚，她不干，说要等我。分别前，她流着泪，让我给孩子取个名字。我取的是“邬渝进”。渝，指重庆，进，代表“大跃进”。

女儿出生时，我正在南桐农村，没见着。妻子因为不离婚，被法院清除，调到沙坪坝百货公司。这样支撑了两年，1960年4月，我们被迫分手。

1963年，女儿已经5岁，一直没见到过爸爸。她在外面玩耍，其他小孩嘲笑她，说她是没爹的娃儿。她回到家找妈妈闹，哭哭啼啼非要爸爸。妻子本来就是被迫离的婚，女儿一闹，她受不了，这样，她提出复婚。

（注：正是在高长春提出复婚的1963年，重庆市教育局在毛泽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指示下，把大量教师右派开除公职，遣送到农村。长寿湖的一些教师右派因此离开了长寿湖。邬锡昌将下放到云阳县农村。）

复婚前，我原学校已按教育局的指示，将我精减退回云阳农村，这就意味着我可能要当一辈子农民。我最初不同意。为啥呢？我说我现在连每月25元钱都没有了。要送回农村监督劳动，你看你受不受得了。她说：“我们还是要复婚。你当一辈子农民我都没有意见，只当爸爸妈妈给我找了个农民。”这句话把我感动了，我听到这句话后才同意复婚。

女儿进小学读书时，妻子娘家的人要求把女儿的名字改了。他们说，我是犯了错误的人，女儿开始读书了，要奔前程，要把高家的家“正”过来。于是，我女儿改名叫“高正家”。

我到云阳后，妻子每个月给我寄5块钱，我每年回重庆探一次亲（64年和65年），1966年6月份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她的压力就更大了，单位上社会上都让她抬不起头。左邻右舍也歧视她，开口一个“你这个右派家属”，闭口一个“右派分子婆娘”，很伤人。女儿日子也不好过，处处受欺。1970年中央清算“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罪恶之后，妻子感到来自政治上、社会上的压力更大，她受不了了。这样，1970年我们第二次离婚。离婚后她仍然给我寄钱，但我不能再回重庆，一个人在云阳农村呆了九年。

1978年5月27日，我在农村摘了右派帽子，我马上写信告诉妻子。妻子非常高兴，马上给我回信，希望再复婚。接下来几个月，我们信件来来往往，商讨春节复婚。

当年12月底，42中突然把我妻子叫到学校，校领导告诉她，根据中央文件精神，正在进行右派分子的“改正”工作，邬绪昌不仅可以“改正”，而且还会调回学校任教。

她陡然得知这个喜讯，高兴得发疯。20年，终于熬到头！她回到家里，极度亢奋，通宵不眠。第二天她上厕所，往下一蹲，脑血管突然破裂。她叫了一声：“妈，妈妈！”一头栽倒在地上，嘴角流出一丝血。她当天就在医院里去世了。

女儿给我拍来电报，我立即从云阳乡下动身，赶到重庆已经是元月7号，妻子早已火化，分别九年，迎接我的是一盒骨灰。

安葬了妻子后两个月，上面那张“改正”公函下来了。

采访时间：2001年6月15日 地点：重庆市渝中区

采访后记

据说，1949年之后，中国主要有两类人的妻子在刹那间遭受了沧海桑田的巨变，在巨变后经历了漫长的苦难，在苦难中展示了感人泪下的凄美。

一类，是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妻子；一类，是右派分子的妻子。

十九世纪，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大义凛然，慷慨赴难，与丈夫并肩走向风雪弥漫的西伯利亚，世界历史画廊中，留下了她们亮丽的身影。

二十世纪，中国“分子”们的妻子，看似没有那么英勇豪迈，然而她们集聚中国数千年传统美德，以一种忍辱负重的坚韧，作了忠贞不渝的坚守。其生离死别的斑斑血泪、其寂寞长夜的孤苦荒寒，不亚于遭受西伯利亚呼啸冬风。

高长春，这位大学毕业生（上述两类妻子，大多有文化、或出身于含“知”量较高的家庭），仅仅过了半年多的夫妻生活，家便破了，但她始终守候着、等待着、支持着她的丈夫。

她最后的呼喊为什么是“妈妈”？是多年孤苦无助中撕心裂肺的渴盼，还是在坟墓边缘对生命的悲切呼唤？

高长春走了，不少“分子”们的妻子也走了。随之而去的，是不是一道“最后的风景”——凄凉而美丽的风景？

邬绪昌的诗及说明

2002年4月3日，在向邬绪昌核实女右派曾容的情况时，邬读了他近日写的一首诗：

左祸灾难乱九州，急风暴雨数十秋；
无辜生灵被涂炭，冤魂饿殍几万千。

他说：“我1958年在南桐矿区看见一个50多岁的农民婆婆坐在空荡荡的屋里，伤心心地说：“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农民祖祖辈辈盼了多年的土地，你给我们了，才几年，你初级社、高级社又拿回去了，现在人民公社连锅瓢农具都收走了，我们几年的辛苦什么都没有了。”当时，那个农妇的表情给我很深的印象，后来听说她也饿死了，所以我说‘无辜生灵被涂炭，冤魂饿殍几万千。’”

邬绪昌（2009年3月30日）

（毛主席在三年饥荒时期，听说人民挨饿非常伤心，据说是不能吃肉了，这点广为传颂，那么毛主席到底吃什么呢？这里转贴一段报纸文章）：

毛泽东一生喜欢吃中国菜，尤其以爱吃红烧肉名闻遐迩。只是到了60年代才对西餐发生了一点兴趣。毛泽东吃西菜，特别喜欢吃鱼虾。汪东兴担任顾问的《毛泽东遗物事典》收了一份1961年4月厨师为毛泽东制订的西餐菜谱，其中各式风味的鱼虾共有十七种，这里不妨抄录一下：

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波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

摘自2000年5月24日《中华读书报》，作者：顾钧